

●珍藏图片 生动史实 可歌可泣

●再现民族精神 呼唤祖国统一 敦促战争索赔

國民黨：1937

——惨烈悲壮的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作者：苏冀鲁



国防大学出版社

(京) 新登字120号

國民黨：1937

苏冀鲁 著

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红山口甲 3号)

邮编：100091

国防大学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第九七〇八工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 32开 8 印张150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 20000 册

ISBN 7 - 5626 - 0489 - 4 / K·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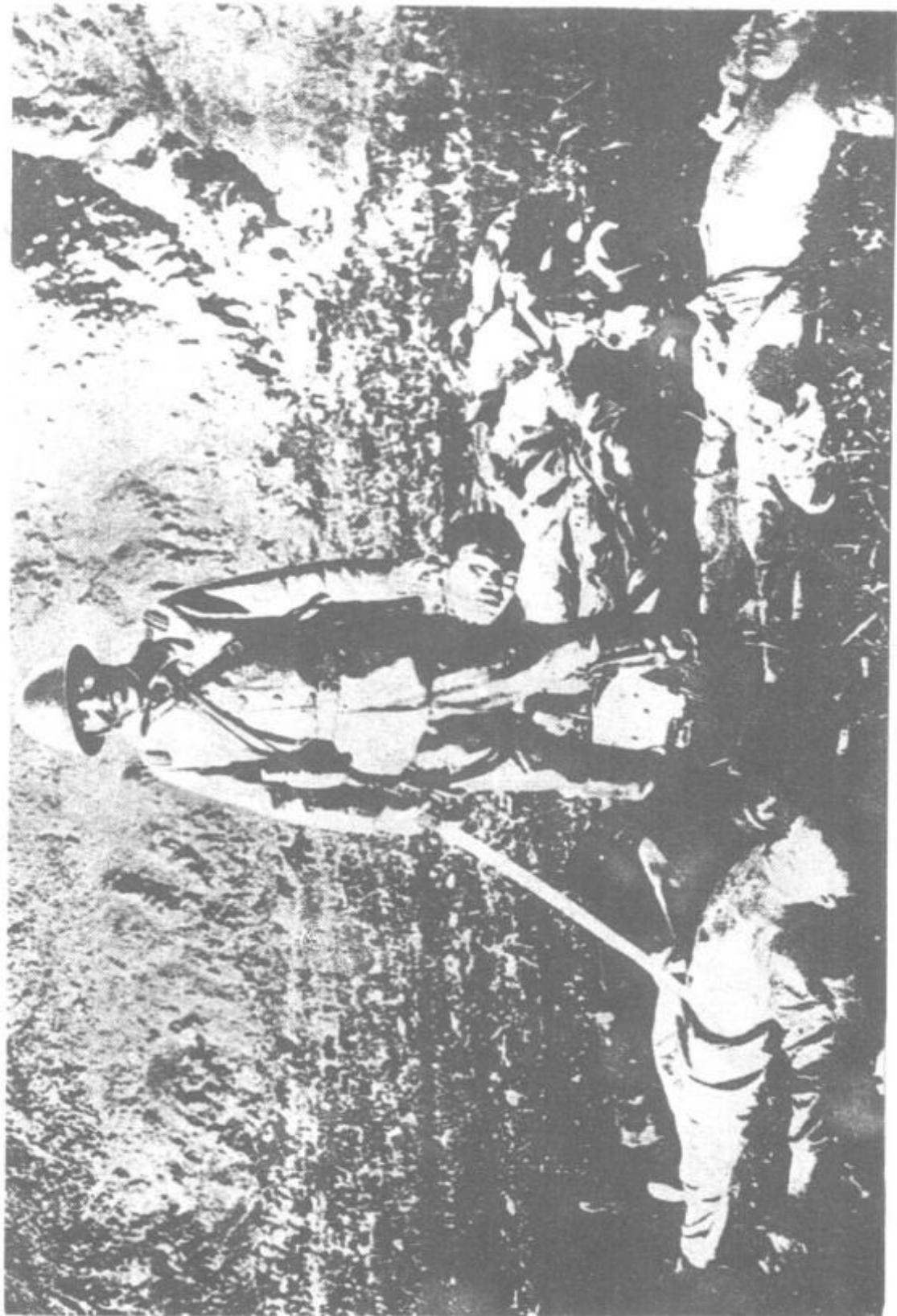
定价： 5.60元



蒋介石、毛泽东在重庆举杯同庆抗战胜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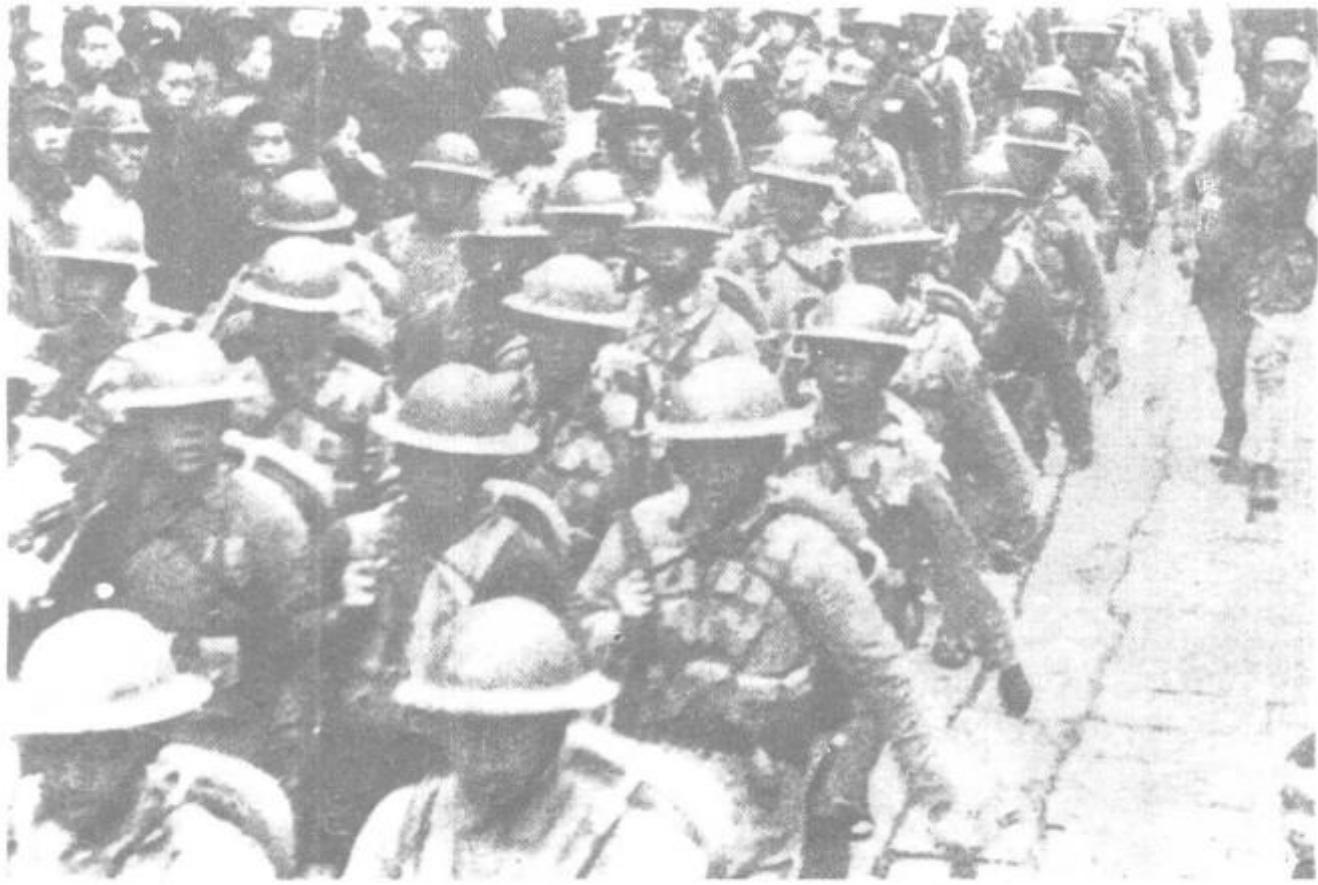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号召全面抗战。



永志不忘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递交投降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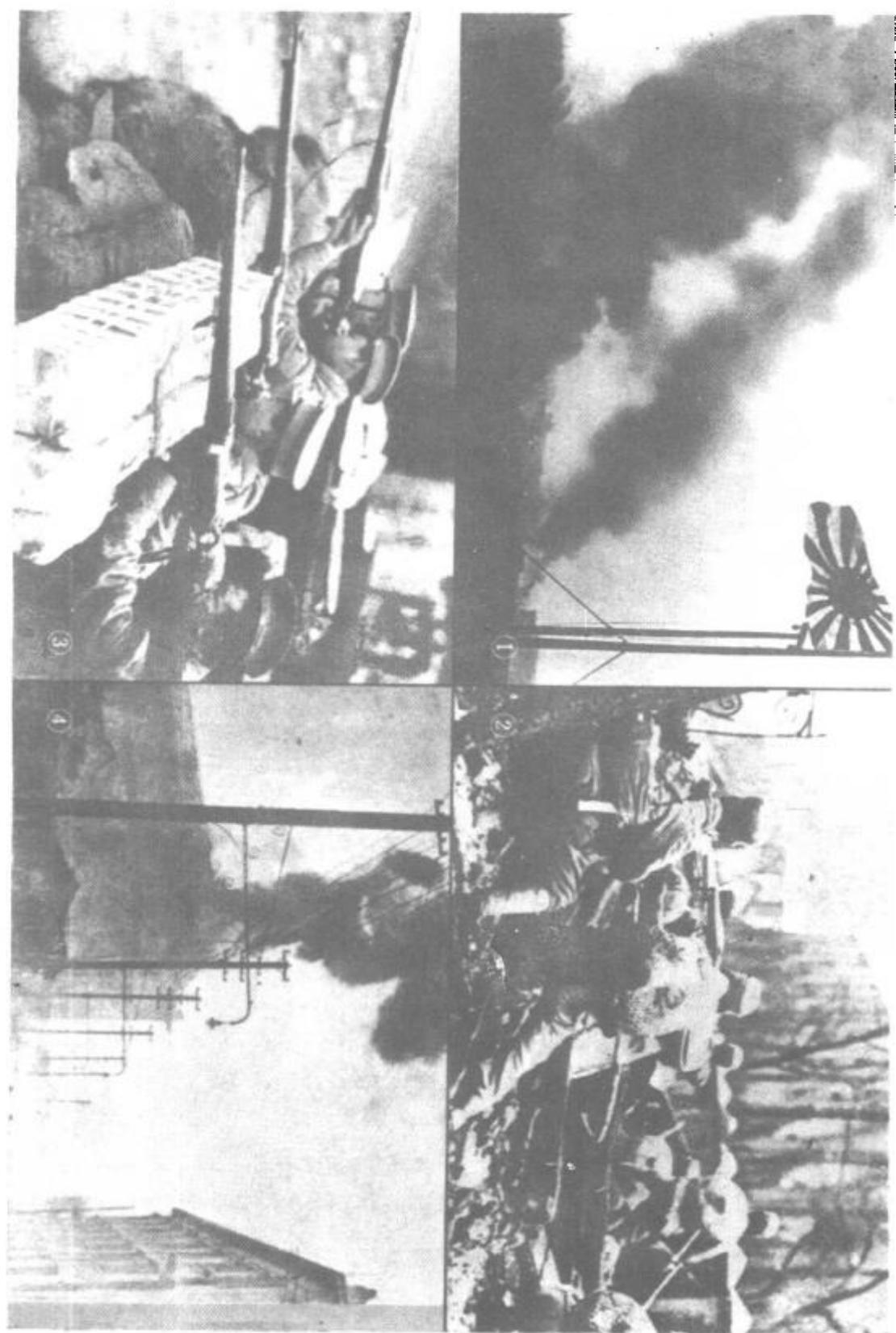


开赴淞沪前线的第19路军部队。



我军重机枪阵地。

军旗与硝烟（摄于1月29日上海闸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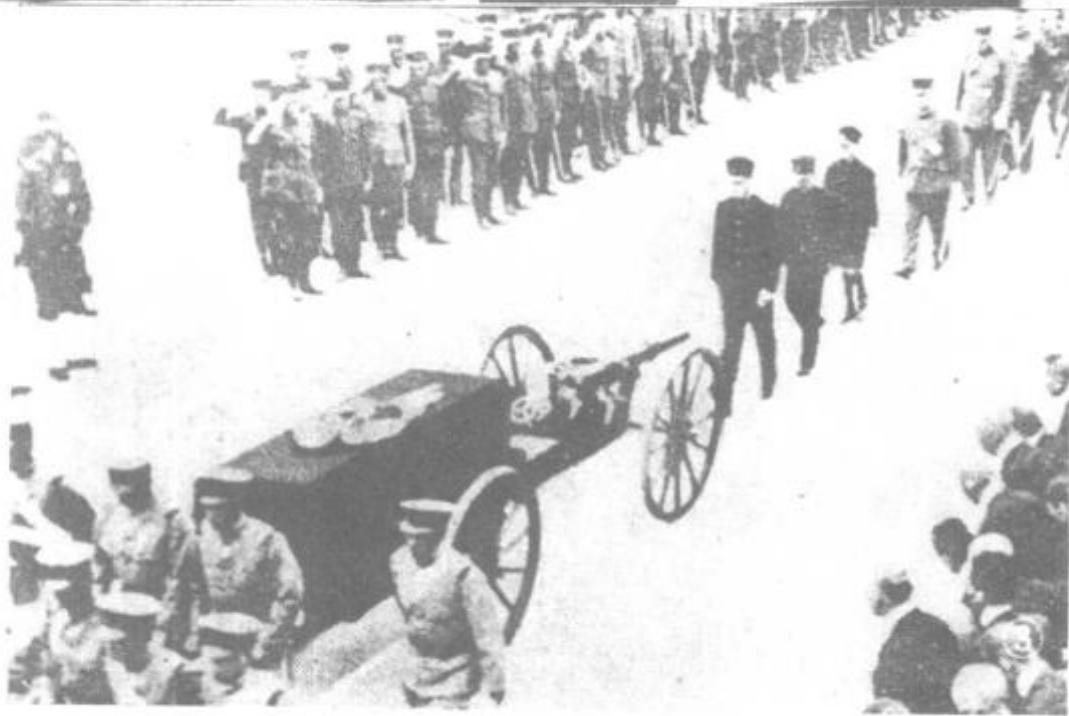
位于宝山路上的东方图书馆被炸焚烧。

所藏善本书59435册，其他书籍34万套和价值20万元的报章杂志毁于一旦。



宋庆龄手捧日军炮弹在残墙边留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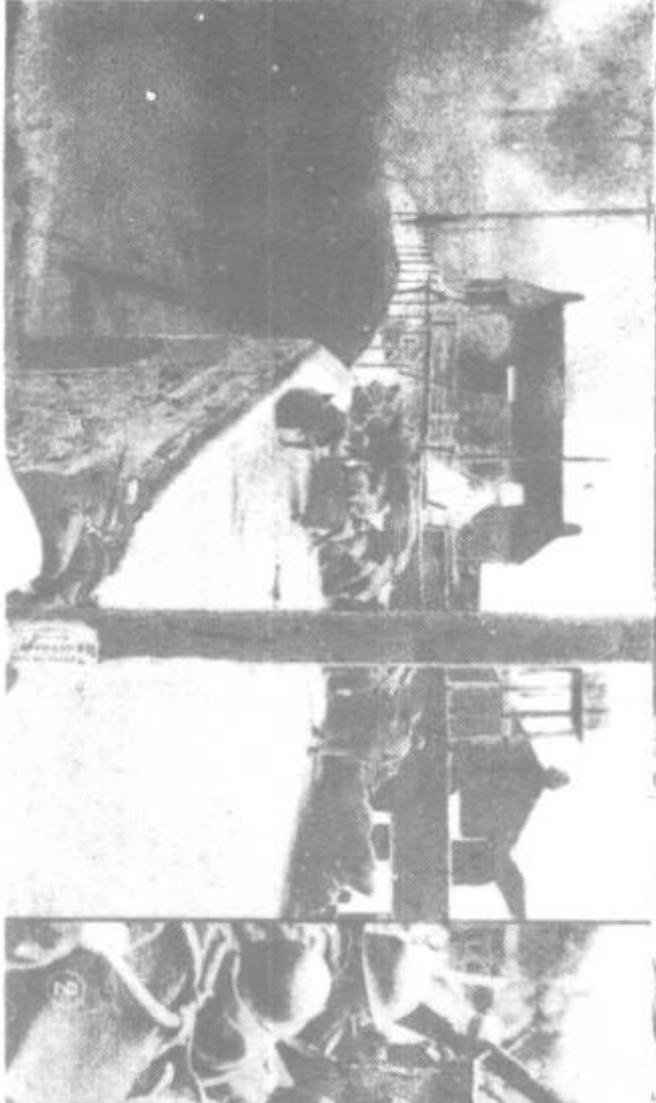
抗日组织成员尹奉吉行刺白川义则前宣誓。



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的葬礼。

第5军军长张治中（左）在浏阳司令部掩体内指挥作战。

日军在战斗中抢运尸体。





我第5军261旅官兵开赴淞沪前线前在“不灭日寇，誓不生还”的誓辞上签字。





我军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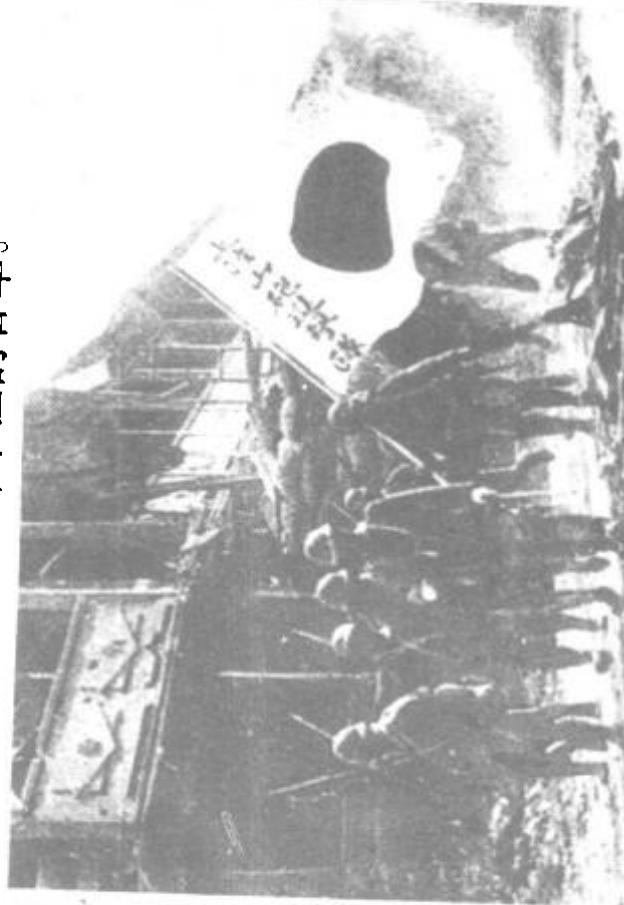


蒋介石在前线视察。

在苏州河边被我击伤的日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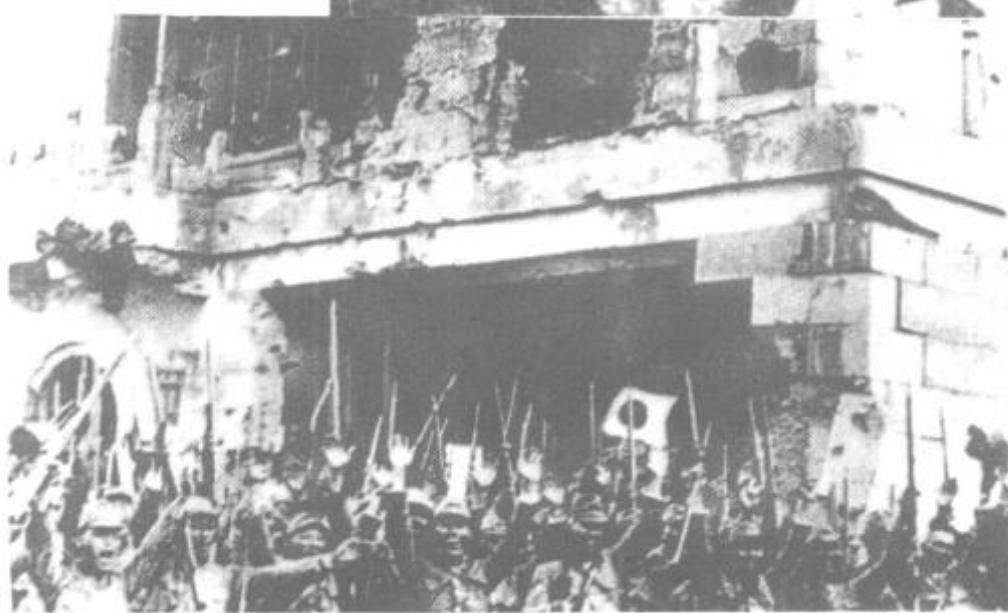
攻入上海市区的日军。



向我军阵地进攻的日军。



女童子军杨惠敏向四行我军献旗前的留影。



日军占领上海市政府



日机滥炸后的上海南站。这幅照片曾在世界引起反响。

日军自摄的残杀上海附近中国人的照片，当时“不许可”发表。





陆军122师师长王铭章将军。



跨过浮桥增援台儿庄的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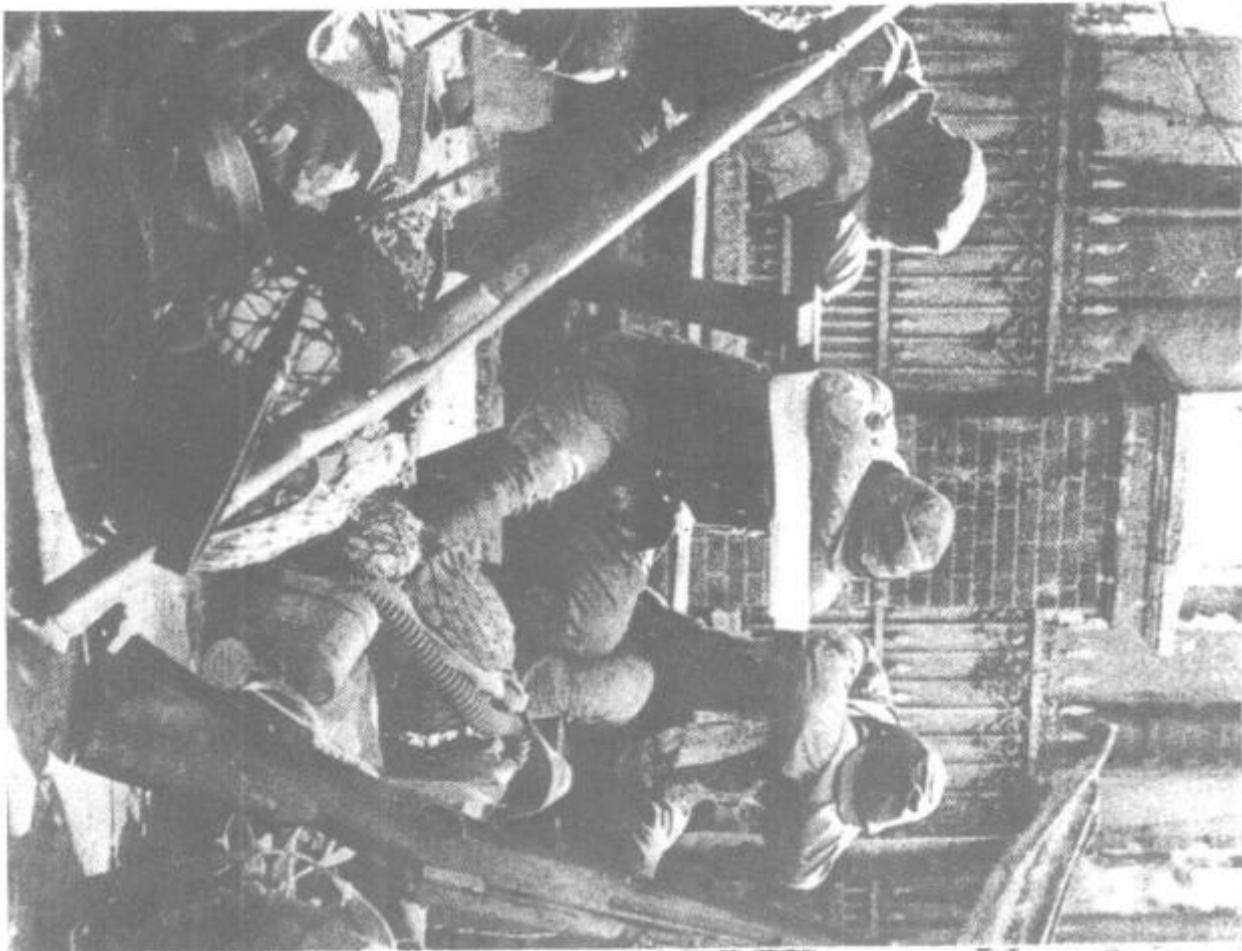


参加徐州会战的我军部队。



台儿庄三战中我军指挥员：左起：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第30军军长田镇南、第31师师长池峰城。

几名疲惫至极的日军在武汉街头大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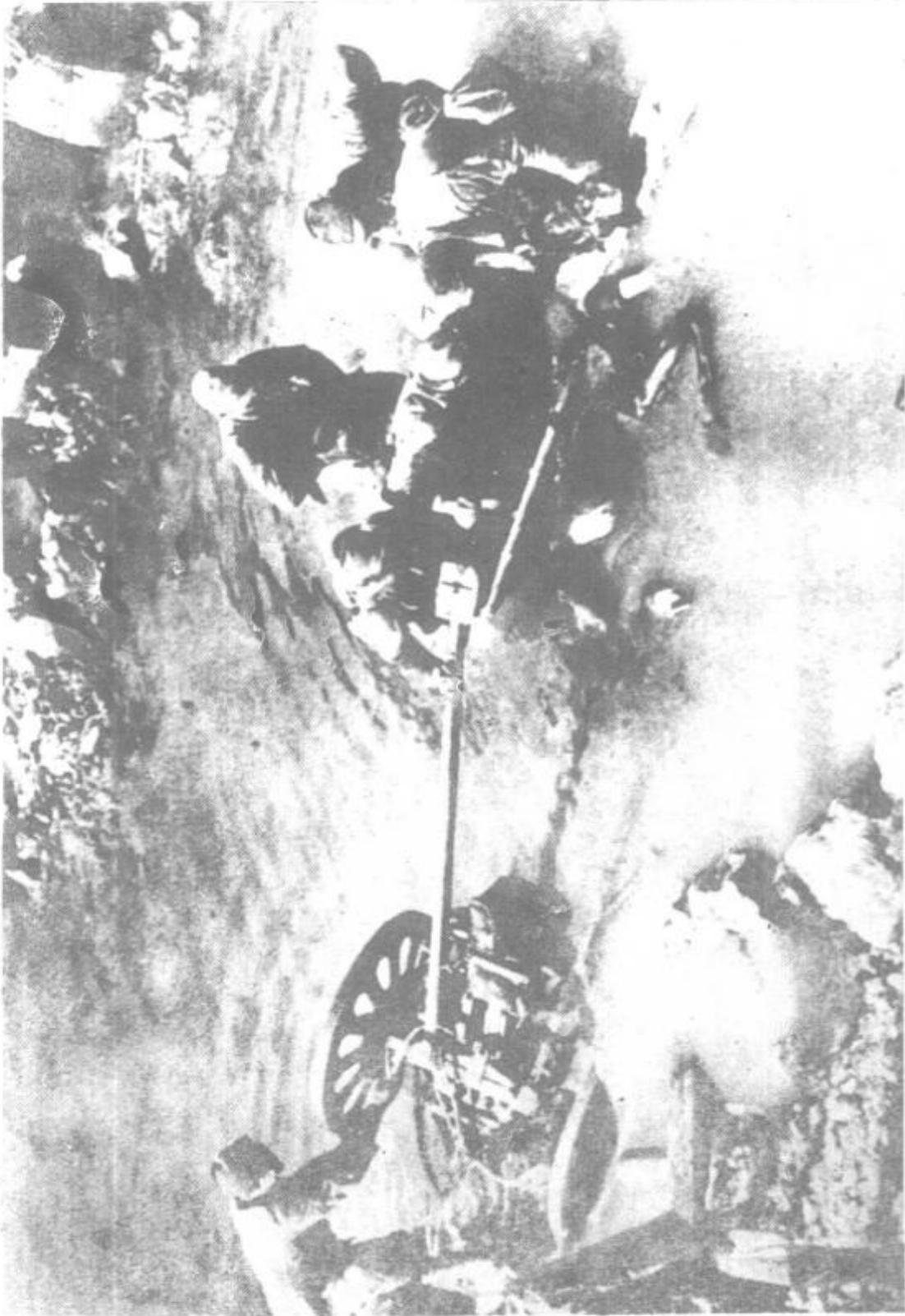
被我俘虏的日军狼狈不堪。



武汉作战中的日军炮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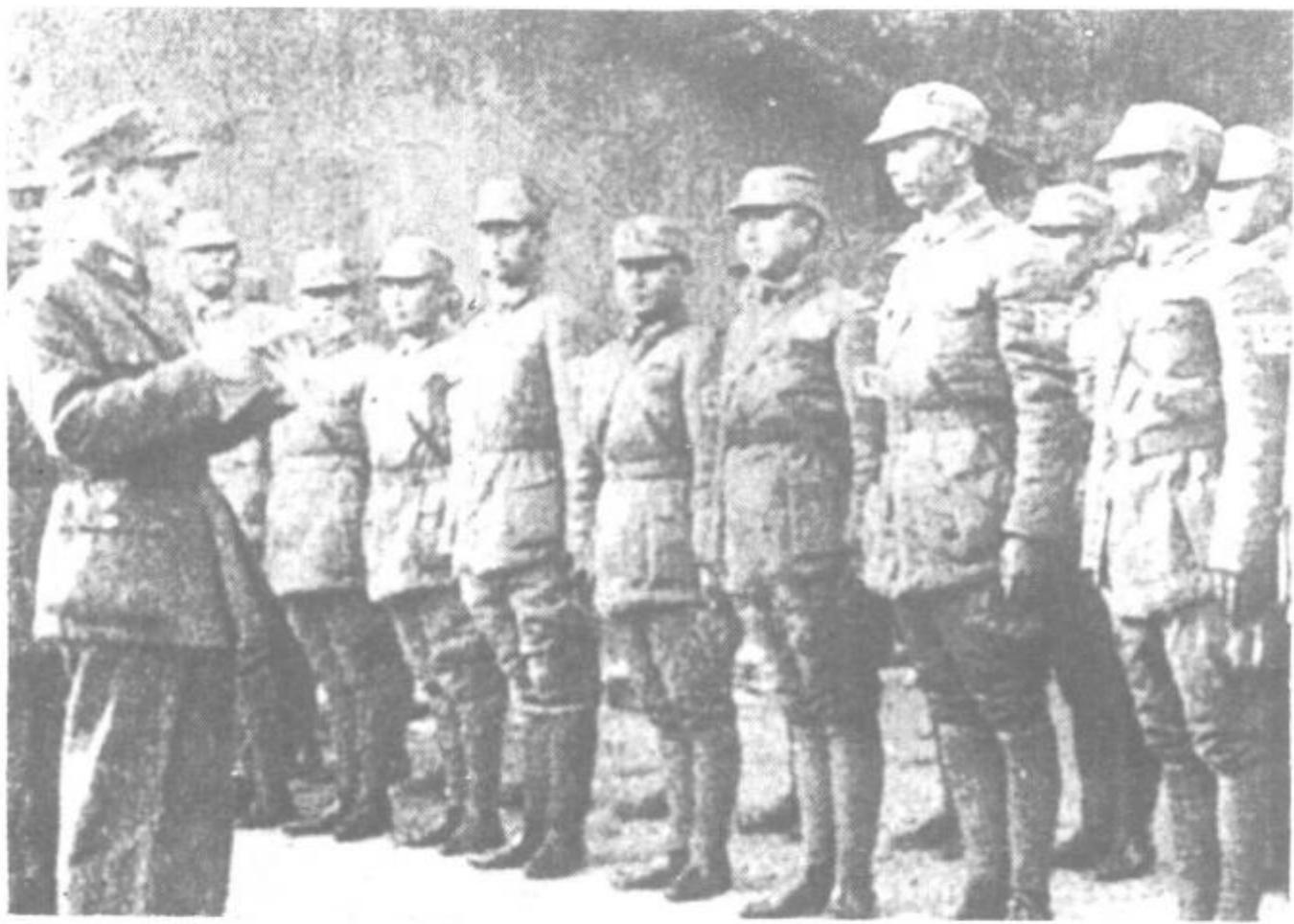


陷入泥潭的日军。





武汉会战期间，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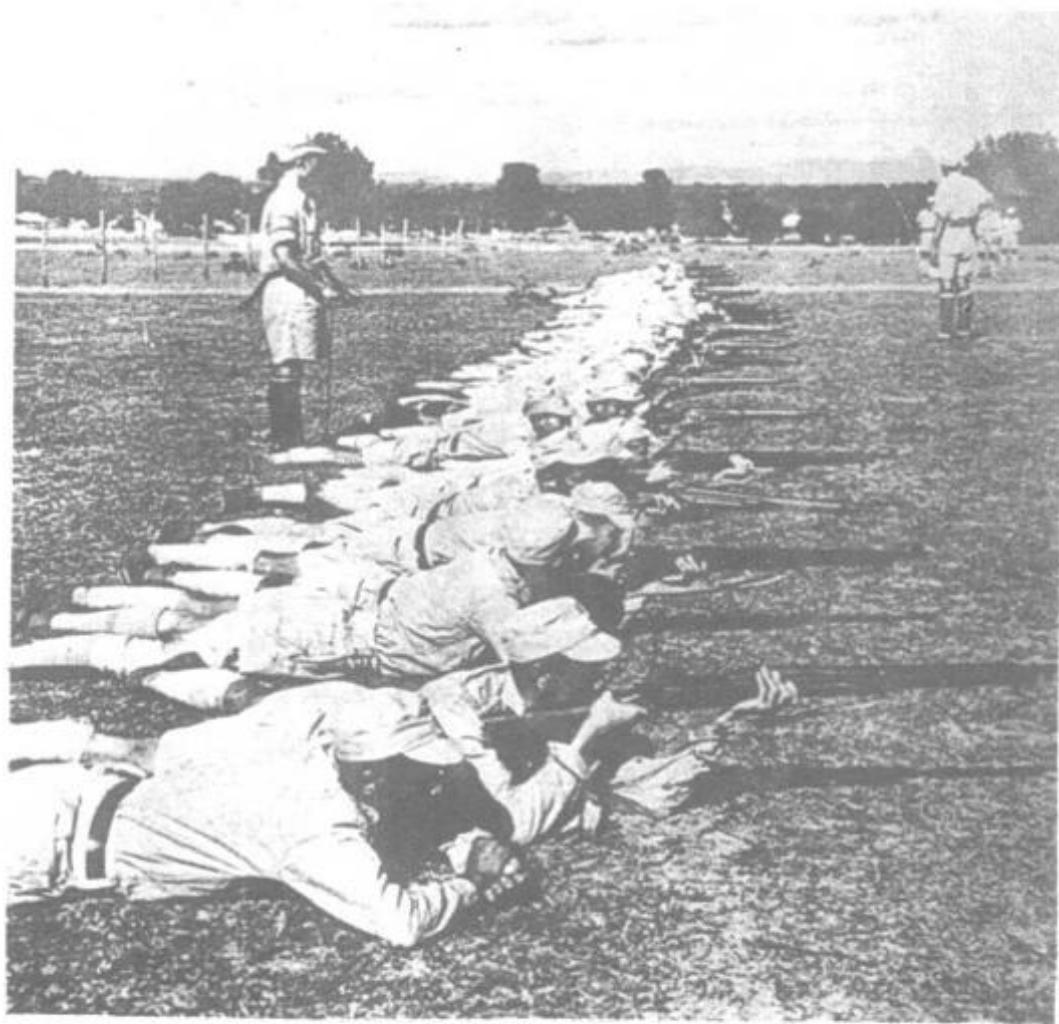
昆仑关大战前，蒋介石视察参战主力之一——第5军。



陆军200师中将师长戴安澜。



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与战区参谋长史迪威。



在印度受训的中国军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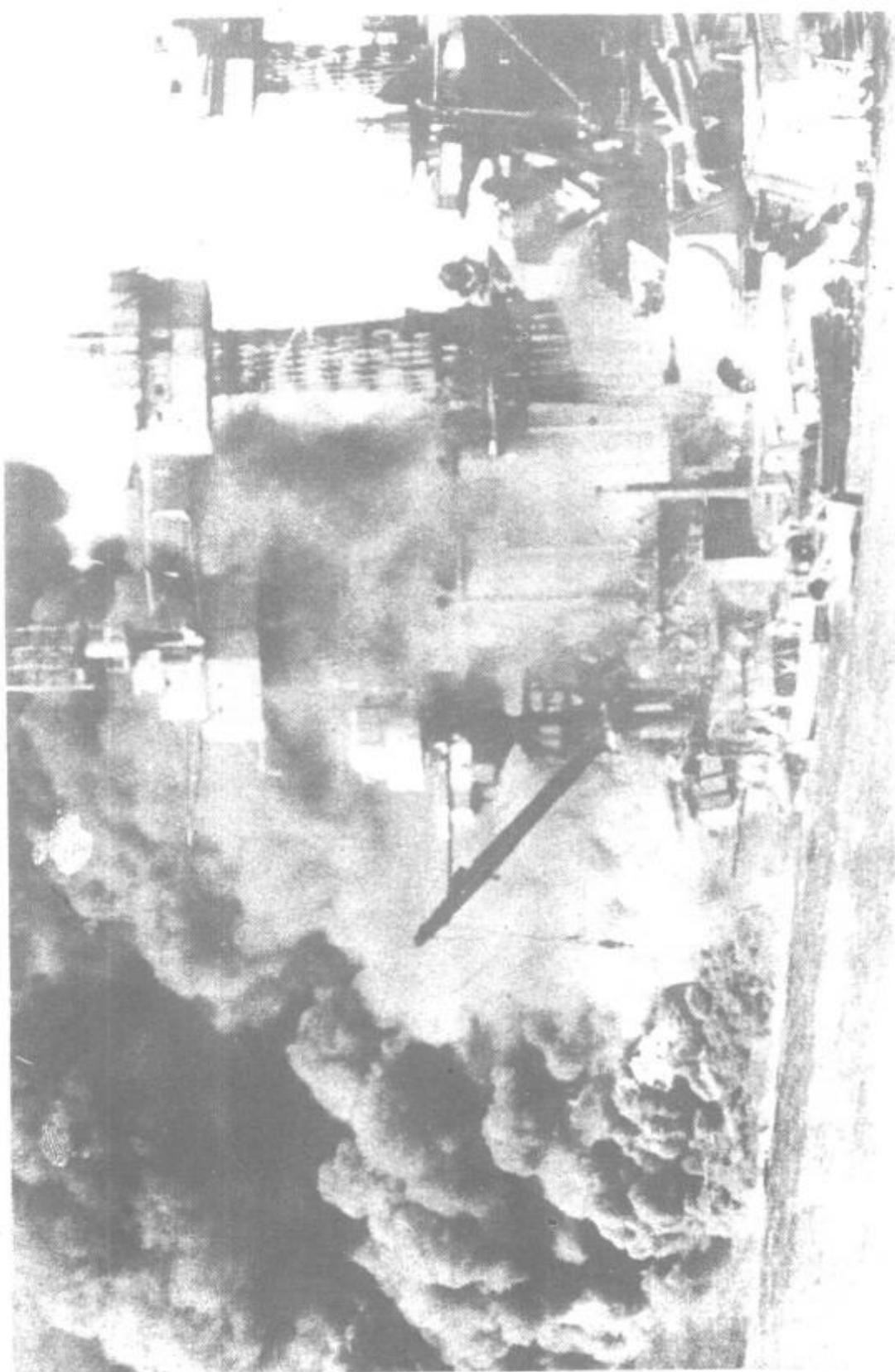
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的中国少年兵。



胜利会师。



远东英军向日军投降。



日军偷袭珍珠港。



攻克密支那。

前　　言

从三十年代初起，中华民族受到乘着飞机和兵舰越海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是一场亡国灭种的屠杀和掠夺。

危亡关头，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挺身而出，以空前惨烈的搏斗和空前巨大的牺牲进行着自卫反抗。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携手御侮，中国军民浴血沙场前仆后继。终于，历经长达八年的殊死较量，中国人民赢得了最后的胜利。

毕竟由于我们民族在那场战争中的牺牲实在太惨重了，三千五百万死难者的冤魂挥之不去。毕竟战争距今仅仅五十年，老一辈人无法忘记，青年一代应当了解。

这场本世纪中我们民族最大的灾难不应被遗忘；这些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抛头洒血的英烈不应被遗忘。

为此，我们写了这本书，把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告诉中国人。

中国曾经有过这样的日子。

中国曾经有过这样一些人。

——谨以此书慰籍日本侵华战争中三千五百万死难者的魂灵

目 录

一、“1. 28”首战淞沪：民族尊严重如山

蔡廷锴不顾不抵抗命令毅然揭竿抗日。中共通电全国声援十九路军。张治中冒名参战。中国军队庙行大捷。上海日军连遭失败四易主帅。十九路军伤亡惨重腹背受敌退守二线。长天节庆典日军大将遇刺丧生。

二、“8. 13”再战淞沪：一寸河山一寸血

蒋介石发表“7. 16”谈话号召全民抗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名中共领袖联名致电蒋介石：“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效命。”工农红军接受改编奔赴前线。虹桥机场事件。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上海日军。宝山城姚子青 500 官兵壮烈殉国。18 师师长朱耀华之死。

八百孤军奋守四行仓库，女童子军深夜传送国旗。

三、台儿庄：拼将热血写捷报

蒋介石怒杀韩复榘。张自忠大义救临沂。王铭章滕县成仁。毛泽东题联致哀。矶谷廉介轻敌冒进，李宗仁布网诱敌。池峰城炸浮桥背水死战，蒋介石悬重金奖赏头功。台儿庄飞捷报举国振奋，武汉市十万人火炬游行。

四、武汉大会战：20万倭寇成新鬼

花园口黄河大决堤。蒋介石处决薛蔚英。周恩来一言中的。薛岳巧布“反八字阵”。李品仙的慨叹。万家岭大捷。一箭双雕日军攻占广州。蒋介石宋美龄最后撤出武汉，飞机迷航险些断送委员长性命。

五、昆仑关：涛涛碧血写军魂

中国精锐部队云集桂南。白崇禧力主反攻。蒋介石遭空袭怒骂“欺人太甚”。“德国专家”邱清泉将战车开上重山峻岭。陈诚唱黑脸：“拿不下昆仑关就提着脑袋去见委员长”。荣誉第一师，一支全部由负过伤老兵组成的部队，师长郑洞国几乎将全师拼光。日军旅团长中村

正雄毙命。耸立于雄关的丰碑。

六、印度、缅甸：大远征

巨头们的世界。输血线。先锋戴安澜。浴血同古。廖耀湘牵着日军鼻子走。英王乔治为新38师师长授勋。曼德勒会战流产，远征军兵败缅甸。翻越野人山戴安澜殉国。反攻，反攻！卫立煌挥师强渡怒江天险。坎坷胜利路。蒋介石赶走史迪威。大会师，打通中印公路。

一、首战淞沪： 民族尊严重如山

引子

1931年8月1日，55岁的日本陆军第10师团长本庄繁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这个通晓中国事务的日本军阀，在上台第3天参加的日本陆军军司令官、师团长会议上，将自己经过多年调查、积累的资料和精心研究的方案，上书陆军在臣南次郎，提出日本向外侵略的步骤和近期入侵中国的总设想。

这份代表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侵略扩张野心的文件很快被转到内阁，被转到外表富丽堂皇，里面却极幽暗神密的皇宫。

人们不知道天皇见到这份文件时做何评价，只知道一个多月后，在中国东北爆发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而直接策划和参与军事行动的，正是日本关东军。

“9·18”事变，日军强占我国东北三省后，本庄繁阴谋建立伪政权，巩固对东北的统治，为了转移国际视线，他密令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在我国南方制造事端，引起中日之间新的冲突。板垣与上海日本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是国内的好友，便串通他在上海活动，达到日本向上海出兵的目的，并向田中支付了2万日元的活动经费。

田中答应了板垣的请求后，立即找到当时在上海的女间谍川岛芳子。这个川岛芳子正是心狠手辣，技艺高超，日后干了不少坏事，终于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捕获枪决的那

个臭名昭著的女特务。

川岛芳子接受任务之后立即行动。她利用自己的姿色和假冒的各种身份，与军、政、学界进行广泛接触，散布谣言、收买汉奸、刺探情报、制造混乱，无所不为。她阴谋的第一步，是借“9·18”事件之后人民的抗日情绪，煽动在上海的日本侨民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同当地人民的矛盾，并使矛盾不断升级、激化，为日本以“保卫侨民”名义出兵上海制造借口。

在川岛芳子的策动下，日本浪人和海军陆战队员在大街上寻衅滋事，撕毁抗日标语、殴打我国同胞，气焰极为嚣张。

日本人在上海的动向，受到我国军队的严密关注。

(一)

当时在上海一带驻防的，是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因病住院，由军长蔡廷锴负责指挥。

蔡廷锴字贤初，广东罗定县龙岩村人，生于1892年4月15日。自幼家境贫寒，艰辛的生活使他磨炼出刚毅的性格。长大后渐渐知道了一些国事。得知清政府腐败，屡屡向洋人割地赔款，感到十分气愤。认为投军报国是自己的唯一出路。他于18岁那年说服父亲，投入广东新军，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武昌起义和讨袁护国的多次战斗。由于作战勇敢、能吃苦、会用兵，他在军队中不断得到提升，是国民革命军中为数不多的由士兵升为高级军官者之一。

“9·18”事变使蔡廷锴怒火难遏。31年12月中旬的一天，他秘密召集全军旅长以上军官在上海金菊村他的寓所开会，

商讨抗日大计。他主张将队伍开到东北，援助正在那里与日军作战的马占山、丁超、李杜的部队。他的主张得到军官们的一致赞同。他们商定抓紧时间练兵筹款，作好准备，于来年2月1日，以“西南国民义勇军”名义，沿津浦铁路北上出关抗日。

1932年元旦刚过，日本侨民的破坏挑衅行动逐步升级，上海上空布满了乌云。一天夜晚，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与蔡廷锴在电话中谈了很久，感到日侨闹事的背后一定还有更大的阴谋。蔡廷锴心说：计划2月份出关抗日，说不定上海也会变成战场了。

1月18日，在川岛芳子的导演下，日本僧人天崎启升、水上秀雄、藤井国吉、后藤芳平和黑岩浅次郎共5人，来到抗日情绪很强烈的“三友实业社”附近，忽然街巷中冲出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朝着这几个僧人狠踢猛打。不多时这5人就瘫倒在地，鼻口出血，动弹不得。待被抬到医院救治时，其中一人因伤重不治而死。

19日，一批日侨为此而结伙闹事。日侨组织之一“青年同志会”纠集了32名打手，于当日半夜捣毁并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当三名我国警察闻讯前来制止时，他们挥刀猛砍，使两人被砍成重伤，一人当场死亡。

20日，数百名日侨在“日本俱乐部”召开大会，要求日本政府派兵保护侨民。会后，这些人手执凶器在吴淞路、老靶子路、北四川路游行，大呼颠倒黑白的挑衅性口号。途中捣毁6处商店，并打伤了前来劝阻的英国巡捕。

21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竟然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四条无理要求。

- 一、市长须向总领事道歉；
- 二、逮捕并处罚杀害日僧的凶犯；
- 三、对被伤日僧给予抚慰金和医药费；
- 四、取缔抗日团体。

同一天，驻上海的日第一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还发表了一个恫吓性的声明：

“上海市长对日方提出之要求如不给予满意答复，海军司令官将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

当时日本在上海驻军的情况是，日租界内驻海军陆战队3000多名，及下辖18艘舰只的第一遣外舰队。

在盐泽发表声明的同时，日军最高指挥机关于1月21日紧急派出在日本吴港的轻巡洋舰“大井号”载500多名陆战队员，于1月23日晚到达上海。盐泽对向我发动攻击作了严密的布置。

一个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的侵略阴谋明白无误地显露出来。1月23日，蔡廷锴驱车赶到总指挥蒋光鼐家中。本想做一番介绍情况和说服他坚决反击的工作，不想蒋光鼐早已对时局了如指掌。并同蔡廷锴一样，主张坚决抗击日军的侵略。蔡廷锴十分感动，立即与他一同研究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御作战。他们一同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抗战决心。

第二天，一份由蒋、蔡联名签署的电报呈送到南京国民政府。电文中说：“如日寇来犯，则坚决抵抗，虽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

这时的国民政府内一盘散沙。蒋介石因派系斗争被迫下野，由孙科主政，孙科软弱无能，对内忧外患手足无措。政府内部对抗日问题意见分歧很大，一部分主战，一部分则认

为中国国力薄弱，缺乏战争准备，打则必败，不如避免冲突，由英美等大国出面调停，不使事态扩大。主战派是行政院长汪精卫、以及冯玉祥、李济深和参谋总长朱培德，而不抵抗政策的代表则是执掌军事实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时间一天天过去。日军的战争叫嚣日甚一日，19路军也召集了营长以上军官的军事会议对抗击日寇进行了布署，但国民政府仍然不表态支持蔡廷锴抗日，使全上海的中国军民深深地憋着一口气。

1月24日，浙江省主席张静江和上海知名人士杜月笙、史量才一起，请蔡廷锴在杜月笙家吃饭。席间，三人婉言劝说蔡廷锴不要同日军对抗，以免后果不可收拾。蔡廷锴听出这是中央主和派的声音，他毫不让步，理直气壮地说：“上海是中国领土，19路军是中国军队，如果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张先生也是中国人，总不能眼看国家受辱而无动于衷吧？”

在三人劝和的宴会不欢而散的第二天，何应钦亲自出马，从南京赶到上海，在张静江公馆约见蔡廷锴。何对蔡说，我国国力薄弱，无力应战，为保存军事实力，只好先委屈求全，后撤30公里，以平息事态。

蔡廷锴简直不相信这些话竟然出自一位政府军政部长之口。他反问何应钦：“日军在我国领土内增兵备战，我们却要后撤30公里，政府养军队究竟是干什么的？一旦日军进犯，让我们有何颜面去见百姓？东三省几个月沦为敌手，老百姓骂我们还少吗？”

蔡廷锴连珠炮似的发问使何应钦窘迫不堪，他只好说，军人要服从大局，等待命令，不能擅自行动。说罢匆匆告辞。

(二)

1月27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入战前状态，又有一批增援部队抵达上海。

蔡廷锴命令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严阵以待。他传令全军：“如日军进犯，则坚决扑灭之！”

27日下午6时，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限令中国军队必须于24小时内撤出上海，否则就要采取严厉行动。28日晚，盐泽又下达了一个以护侨为名的通牒，命令19路军立即撤出上海，由日军进驻。还没等待我军有任何答复的时间，盐泽便下令日军兵分五路向闸北地区进攻。

1931年1月28日晚11时30分。一阵浑浊的枪声撕破上海市区寂静的夜空。19路军156旅5团长张君嵩向负责闸北防务的156旅旅长翁照垣报告：“日军向我们进攻了。”

翁照垣当即下令：“守住阵地，狠狠地打！”

“是！”“哒……”。第6团官兵打响了淞沪抗战的第一枪。这正义的枪声立即通过战地记者的无线电波飞向全中国和全世界。“1·28”，这个日子被永远铭刻史册。

进攻闸北的五路日军每路五、六百人，配备着小钢炮、机关枪，以铁甲车开路，由宝山路、虬江路、川公路、老靶子路、通天庵路向前逼近。

我军阵地上的官兵是初次面对面地看见日本侵略军。强烈的民族仇恨涌上心头，一个个眼睛都红了。他们一面向敌人猛烈射击，一面高喊：“杀呀！杀呀！”冲在前面的日军在我军愤怒的枪声中一排排栽倒在地。

几辆日军铁甲车扫着机枪冲了过来，我守军赶忙卧倒。30米、20米、10米——在铁甲车接近工事时，一排手榴弹飞了出去，“轰隆隆”，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铁甲车轮被炸坏，爬出车内逃命的日军当即被我军击毙。

宝山路的日军依仗众多装甲车接近我军阵地。5团1营2连官兵跃出工事，与装甲车后面的敌人展开激烈肉搏。两军混战在一起，装甲车无法开枪射击，急得团团转。

这个连的下等兵伍培、伍全是一同入伍的亲兄弟，二人在家学过武术，拿起刺刀来得心应手，勇猛无比。他们东腾西跃，连续撂倒了十余名日军，被敌装甲车上的机枪打中双双牺牲。

兄弟2人的班长潘德章见状大吼一声，端着机枪迎着冲上来一群日军猛扫。在击毙十几个日军时左臂被打中，他咬牙坚持射击，直至将敌人压了回去。

闸北战斗打响之后，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立即赶往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所，指挥前线作战。

日军自入侵东北，一直是节节推进，几乎没有遇到过有力的抵抗，所以盐泽计划4小时内攻克闸北守军防线。他万没料到会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在实施攻击1小时后，五路人马均受重创败下阵来，气得盐泽哇哇乱叫，他将设在军舰上的指挥部移到地面攻击部队出发地，抽出战刀命令各路重新组织兵力，再度向闸北进攻。

盐泽在新的攻势中改变了战术，一面仍然强攻我军正面阵地，一面调兵攻击天通路、青云路、横浜桥我军左翼阵地。激战中，日军一度以沉重的代价冲破了我青云路和横浜桥防

御工事。

守卫在这两处阵地的官兵并不退却，他们迅速爬上路旁屋顶，居高临下，向冲过来的日军射击、投手榴弹。黑暗之中，枪声和爆炸声不时响起，日军不时伤亡，却又搞不清我军在哪里。向前走了不到一华里，便掉头往回跑，生怕中了埋伏，被抄了后路。敌人逃跑后，我军迅速恢复了阵地。

虬江路上，敌人用铁甲车、步兵炮、机关枪疯狂轰炸射击，阵地守军全部伤亡，敌人乘机冲入防线，这时我增援部队赶到，一阵激战，又将阵地夺了回来。在闸北防御正面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传来翁照垣旅长的命令：“发扬铁军精神，有进无退，有死无降！”团长张君嵩亲临一线工事，一边指挥，一边与士兵一起战斗。当一营阵地前日军被打退后，一营营长利长江率先持枪跃出战壕，带领部下追杀残敌。

28日夜至29日晨，盐泽进犯闸北的行动被19路军彻底粉碎。第一批伤兵和尸体被送上耀武扬威而来的日本军舰，返回日本本土。

闸北开战数小时后，蔡廷锴、蒋光鼐、戴戟联名发出“第19路军为日军犯境通电”，揭露日军侵略暴行，表明19路军坚决保卫国土的决心。通电在《中央日报》全文发表后，震撼了中国和世界，世界舆论纷纷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要求日军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但是战车一旦启动就很难停止。29日凌晨4时30分，盐泽命令航空母舰上的飞机全部出动，轰炸闸北守军阵地。由此，开始了对闸北的第2次进攻。

这时天还没亮，敌机投掷炸弹命中率很低，我军阵地安然无恙，但大片民房却被炸燃，闸北地区一时间成为一片火

海。许多市民被炸弹炸死，被大火烧死。人们惊惶地扶老携幼，四处逃命，不少人在混乱中被挤死，踩死。处处是浓烟烈火、哭喊呼救，一片战争的惨状。

蔡廷锴命令抽调预备队参加灭火和组织疏散市民。官兵们奋不顾身地一次次冲进火海，将老人和孩子背到安全地带，有许多官兵被烈火烧伤。

当时我国最大的出版和藏书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被炸起火。由于厂房和库房内全部是纸张、油墨这类易燃品，燃烧起来特别凶猛，灭火的官兵们无法靠近，只有眼睁睁看着它们烧光。

几位穿着长衫，戴着眼镜的老知识分子在一旁顿足大哭，为大火中消失的我国珍藏古籍图书而痛惜。

丧心病狂的盐泽趁着大火和市民们混乱不堪，又发起新的进攻。蔡廷锴气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命令各阵地狠狠打击日寇，不让敌人阴谋得逞。

天放亮时，我军各个阵地前面又横陈了百余具敌军尸体，翁照垣下令各部转守为攻，全线出击。顿时，喊杀声振天动地，传出十几里外。团长张君嵩带领一支部队冒死冲过敌火力封锁的淞沪铁路，截断了进攻闸北之敌的退路。

数百名敌人被我军包围，以十倍的疯狂左冲右突，做垂死顽抗，我军以猛烈火力很快将大部分敌军消灭。剩下的一股残敌不敢继续抵抗，一个个丢下武器，脱掉军服，在小弄堂里钻来钻去，寻路逃跑。我军分为几路前堵后截，活捉了十余个日军。

天完全亮了时，我军彻底粉碎了盐泽对闸北的第2次进攻，共消灭日军960余名，缴获了三辆完好无损的铁甲车。

盐泽以对市区的猛烈轰炸进行报复，轰炸范围由闸北扩展到南市，上万名无辜平民惨死在爆炸和烈火之中，昔日繁华的上海变得满目疮痍。

蔡廷锴冒着敌机轰炸来到闸北看望前线守军。官兵们士气大增，纷纷向军长表示杀敌报国的决心。

在阵地上，蔡廷锴给官兵们讲了一个刚刚发生的真实的故事。上海码头有一个汽车司机叫胡阿毛，前不久被日本鬼子抓去做苦工，他恨透了这伙强盗，时刻找机会复仇。开战那天，敌人逼他往前线送军火，他看着满满一车弹药和六名押车的日军，一咬牙答应下来。当汽车开到黄埔江桥时，他猛转方向盘，汽车撞断桥栏翻进江里，六个鬼子和一车弹药倾刻间沉入江底，他自己也壮烈殉国了。

蔡廷锴说：“这位司机和我们 19 路军中那些英勇捐躯的官兵一样，都是最优秀，最有骨气的中国人！”

29 日白天，盐泽又组织了一次进攻，同样遭到可耻的失败，连续两天的败绩使盐泽十分恐慌，他电告日本政府，要求迅速增兵。为拖延时间，防止 19 路军反攻，由日本驻华公使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停战谈判。蔡廷锴明知是敌人的缓兵之计，但由于我军也需要休整补充，于是同意停火。

盐泽初战失利的消息传回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海军军令部长博恭王急忙提议召开内阁会议，会议决定向上海增派援兵。会后，内阁上奏裕仁天皇，天皇当即准奏。于是，一批批日军源源不断地从日本跨海而来。

(三)

19路军抗击日寇进攻上海的消息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为自“9·18”起人民群众压抑、沉闷的心情带来了极大的振奋，处于战场的上海人民更是欢欣鼓舞，纷纷组织起来，支持19路军抗战。

上海市民自发组织起许多支抗日义勇军，与19路军一起奋勇杀敌，表现得十分英勇。复旦大学师生组成的义勇军在28日夜间战斗中伤亡200多人，守军几次劝他们撤下来，但他们坚决不撤，直至与守军一道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在1月29日，即事变爆发的第2天便向上海市的党组织发出号召，“把民众武装起来，上前线支援19路军抗战！”在抗日义勇军中，许多共产党员先锋在前，不怕流血牺牲，深得民众和抗日军队的赞赏。

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宋庆龄、何香凝和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人在战斗间隙视察前线，鼓舞官兵的士气。宋庆龄与何香凝看到19路军官兵衣衫单薄，便号召全市妇女在三天内赶制了三万余套棉衣运往前线。

人民群众自动承担了帮助19路军运输、救护伤员、修筑工事等大量工作。一队队抗日义勇军来到19路军指挥部报到，要求承担战斗任务。除了上海的义勇军，还有外地开来的南京中央大学铁血军团、北平冯庸大学义勇军等队伍。冯庸大学义勇军在老校长冯庸先生率领下，身穿黄呢军服，肩背红绸大刀，雄赳赳气昂昂，其中还有十余名女学生，她们一律短发男装，被人们称为“抗日花木兰”。据当时的统计，

各路义勇军人数共达 5000 多，他们在 19 路军统一指挥下，在战场和后方各尽其力，为保卫上海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声援 19 路军作战，上海市民发起为前线募捐活动，得到全国以至海外侨胞的热烈响应。短短几日内，19 路军收到捐款达 700 万元，还有大批食品、医药、日用品等。许多妇女献出了自己的首饰，儿童抱着“蒲满”（即存钱罐）将平日积攒的零用钱都献了出来。全民族多少年以来没有象这时那样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为民族的尊严而热血沸腾。

“1·28”事变激起的强烈民族义愤和 19 路军抗击日军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使国民政府惧战求和心理有所改变。政府机构于 1 月 30 日由南京迁往洛阳，民国政府发表宣言表示抗日决心。

（四）

1 月 31 日，即日本公使提出停战谈判后的第 3 天，日军航空母舰“加费”号和“凤翔”号携带 3 艘巡洋舰，4 艘驱逐舰，30 余架飞机，5000 余名陆军及大量武器抵达上海。

盐泽见增援部队赶到，立即撕下谈判的面具，于 31 日午夜对闸北我守军防地发动袭击。

19 路军官兵受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持鼓舞，斗志倍增，加之两天中做了休整补充，早已严阵以待。从 23 时起，我军前沿阵地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战火再度映红上海夜空。

日军总结前几次攻击失败的教训，先用炮火猛轰我前沿阵地，我守军灵活地转入掩体。炮声刚停，敌步兵在铁甲车

掩护下黑压压冲了上来，我军迅速进入射击位置。“轰隆隆”几声巨响，集束手榴弹将敌铁甲车炸毁，我军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如阵阵狂风向日军卷来。日军受到严重伤亡向后败退时，我军勇猛地跃出战壕追击敌人，机枪扫，手榴弹炸，令敌人扔下片片尸体。敌人退远了，我军也不恋战，赶紧退回阵地修整工事、补充弹药，准备迎击下一轮战斗。

这种战法仿佛成了一个模式，在几个路口大致都是这样。从午夜打到清晨，各路口均打了三、四个回合，我闸北防地犹如钢浇铁铸，日军无法踏入半步。

这一夜，蔡廷锴与盐泽两个指挥所内都是一片忙碌，但两位指挥官却是以完全不同的心情迎来了同一个黎明。

盐泽幸一少年时崇尚武士道，立志做一名优秀的帝国军官，上军校时门门功课成绩优异，进入军队后战功累累，很快被提升到遣外海军舰队司令的位置，他和他的家族无不为之自豪。他万没料到自己满腹军事才华竟在一支一直为他看不起的中国军队面前一筹莫展，他深知如不尽快战胜对手，后果将不可收拾。他连夜修订作战方案，命在海上待命的日军迅速登陆，严密布署了各路兵力和飞机、地炮和舰炮的配合协同。

2月4日，盐泽下命对我军上海防线实施总攻。战线大大超出闸北，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场恶战即将展开。

(五)

一天，一列由洛阳开来的火车停在浦口车站，中央军校教育长，著名战将张治中在站台上迎接刚刚上任军事委员会

委员长的蒋介石将军。

在去住处的路上，蒋介石见张治中心事重重的样子，便说：“文白兄，有什么话尽管讲嘛。”

张治中说：“19路军在上海作战，孤立无援，越来越难以坚持。党内同志已颇有微词，说中央按兵不动，是要看着19路军拼光。现在在东北和上海打仗的都是过去的奉系和桂系，我以为我们中央的部队还是参加淞沪战斗为好。”

蒋介石沉吟了一会，和着一声叹息说了句：“事情复杂哟……”张治中接过来说：“如果校长信任，治中愿领一支部队先去增援。”

蒋介石点点头：“好吧。”

来到住所后，蒋介石打电话给军政部长何应钦，命驻京沪、京杭两线的87、88两个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合成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即刻启程，对外使用19路军番号，赶赴上海前线，归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将军指挥。

是夜，张治中心潮翻涌，不能成寐。他青年时怀一腔报国之志投身革命，几十年军旅生涯中，这是第一次参加抗击外来侵略，维护民族尊严的战斗。他端端正正地写了一封遗书，表达自己随时准备为国尽忠的壮怀。

上海，抗击日军总攻的战斗正处于白热状态。闸北方面，日军反复向青云路强攻，企图从我军防御正面撕开一个口子。为了使我军失去作战依托，敌炮火摧毁了防线上几乎所有房屋，我军官兵在瓦砾堆里坚持战斗，阻挡敌人前进。

为了不让敌人炮火发挥作用，我军将敌人放近再打。两军时常在断壁残垣中展开肉搏。阵地上处处是尸体，双方在连续的战斗中伤亡都很严重。

战斗中，指挥部派炮兵连长吴丹率两门重炮增援闸北。翁照垣旅长命令向设在江湾的日军指挥部猛轰。后来得知，还真有一发炮弹落在中心指挥室，两名参谋当场毙命，盐泽因在前沿督战而幸免。

在吴淞口，我军据守炮台，与企图登陆的日军展开炮战，我军击伤敌舰3艘，其它几艘吓得退了回去。

在江湾，日军一个联队（即一个团）向我防线左翼发起猛攻。我军让过敌人锋头，大胆穿插到敌军背后，将这股敌人包围起来。

蔡廷锴听说我军包围了日军一个联队，兴奋地亲自赶往江湾。他命令部队坚决消灭这股日军，不使一人漏网。他直接指挥我军部队层层缩小包围圈。

四下响起的枪声和喊杀声使日军吓破了胆。联队长高桥用战刀劈死两个乱撞的日军仍不能将已陷入混乱的队伍组织起来。两军在一片河滩中撕杀起来。日军困兽犹斗，我军越战越勇。

这场后来被称为“江湾大捷”的战斗历时近3小时，我军将这个日军联队全部歼灭。至此，总共历时9小时的粉碎盐泽第一次总攻战斗胜利结束。自淞沪开战，仅一周时间，日军伤亡已达3000余人。

（六）

日本陆军总部对盐泽屡次受挫大为震怒，撤销其第一舰队司令职务。由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中将接替指挥。野村带着一批海陆空军增援部队和大量武器装备来到上海。

野村在日本军中以老奸巨滑著称。到沪后，他详细研究了战况，改变了布署，决定采取分路包抄的战术夺取吴淞口，为增援日军登陆扫清障碍。为此他连夜调动兵力，进行战斗准备。

蔡廷锴得到日军调整布署的情报后，感到吴淞防御力量单薄，便从闸北抽出善打恶仗的翁照垣旅，调归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銓指挥。为鼓舞士气，蔡廷锴亲往吴淞炮台看望部队。他将民众慰劳的两箱白兰地酒转送给 78 师副师长谭启秀和 156 旅旅长翁照垣，勉励他们不负百姓重托，死守阵地，狠狠打击日军。

2月 11 日，日军进攻准备就绪，野村认为胜券在握，便召见英国《泰晤士报》等西方大报记者，狂妄地说：“皇军在吴淞踏平华军防线之日为时不远，请诸位拭目相观皇军如何结束华军在华东的抵抗。”

2月 11 日下午，野村下令开始对上海的第二次总攻。

在闸北，日军飞机投下大量燃烧弹，使整个闸北区又一次变成火的汪洋。

在吴淞，日军飞机和舰炮轮番狂轰滥炸，吴淞口防地的炮台和大炮全部被炸毁。

就在日军在吴淞口抢滩登陆的危急时刻，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銓弃职逃跑。他的秘书拒绝随他一起逃跑，并向军部作了报告。蔡廷锴命令 78 师副师长谭启秀代理要塞司令，并下令死守吴淞，决不让日军登陆。

防守吴淞的官兵们在阵地废墟中顽强抗击登陆日军，一次次将日军压回到登陆艇上去。在一艘军舰上指挥登陆的野村想出一条毒计，命几艘登陆艇在日军陆战队员下艇实施攻

击后立刻驶离岸滩。

数百名日军一看登陆艇走了，后退的路断了，都发疯似地向我军阵地扑了过来，野兽似的嚎叫令人毛骨悚然。

我军面对数量和装备都优于自己的敌人，早抱定战死的决心，尽管伤亡很大，但没有一人退缩，沉着地向涌上来的日军射击。两军在近距离胶着激战，不断有人惨叫着倒下去。

在屏障吴淞口和宝山城的蕴藻浜一线，我78师守军与日军展开拉锯战，阵地时而被我军攻占，时而被我军夺回。每一回合中，双方都各有百余人伤亡。打到下午5时，这片滩涂与水网交织的地带上已是尸横遍野。

眼看守军所剩无几，弹药也快打光，日军又一轮攻击开始了，三百多日军叫喊着冲了上来，形势十分危急。这时，我军阵地上不知是谁声嘶力竭地大吼一声：“和狗日的拼啦！”这喊声仿佛是在将燃尽的火堆上泼了一瓢滚油，我军纷纷端枪高喊着杀声冲入敌阵，与敌肉搏撕杀。

自吴淞口、蕴藻浜到闸北，长长的战线上处处是激烈战斗的场面。我军官兵浴血奋战，以沉重的代价坚守着脚下的阵地。

下午7时，天完全黑下来，日军几处攻击目标没有一处得手，野村只好收拾残兵败将退了回去。

11日战斗，日军寸地未得却阵亡千余人，伤两千余人。野村内心极端恐惧，为挽局面，他将手中“王牌”刚从国内调来的日军主力久留米师团拉了上来。

久留米师团装备精良，曾在日俄战争中打过许多硬仗，是各国军事专家公认的日军精锐。野村命该师团攻占蕴藻浜北端的纪家桥，由此突破蕴藻浜防线，包抄吴淞口。

1月13日清晨大雾弥漫，久留米师团3000多日军乘大雾突然袭击纪家桥我军阵地。守卫在这里的张炎旅一连官兵拼死抗击，由于兵力悬殊，1小时后，全连官兵全部阵亡，阵地被日军占领。

蔡廷锴闻讯，急令61师师长毛维寿率预备队增援张炎旅，夺回纪家桥。蔡廷锴带着几名参谋亲自到前线督战。

蔡军长的到来使增援部队士气大振。为大量杀伤敌人，缩短作战时间，减少更大伤亡，张炎旅长决定组织决死队。消息传出，有百余名官兵当即报名参加。

张炎选出40名身强体壮的汉子，对他们说：“你们此去是有去无回了，有什么话要给家中父母妻儿留下，一个个说一说。只要张炎活着回去，我一定给你们捎到。”

决死队员们先是沉默了一阵，一位年纪挺大的老兵说：“这个时候了，还说什么，不就是一死吗！”其他士兵们七嘴八舌地说：“没什么说的，”“旅座快下命令吧！”

张炎热泪盈眶，连说：“好兄弟，张某至死忘不了你们！”

40名决死队员每人在身上捆扎几十颗手榴弹，用火油浇透军衣。他们分为10组，趁着没有散尽的雾气悄悄潜入敌人营地，我阵地全体官兵以军礼为40壮士送行。

不多时，敌人营地中响起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日军顿时大乱，一片鬼哭狼嚎。蔡廷锴立即命令部队反击，我军个个勇猛无比，奋勇冲杀，日军来不及整理队形便被冲得七零八落，只得被动应战，混战起来。

决死队员的英勇牺牲为我军的反击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蔡廷锴亲自指挥61师包围了久留米师团之一部2000多名日军。一场酣畅淋漓的厮杀，将其全部歼灭。久留米师团受此

重创，从此声名扫地。

上任仅 11 天，组织了两次进攻，均被 19 路军击败的日本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于 3 月 15 日，与在他组织的战斗中死亡和负伤的日军一起，乘一艘运输舰向日本驶去。

途中，他被知悉，参谋本部已将其第三舰队司令职务撤销。

(七)

就在野村在海上痛苦反思失败和猜测等待他的命运时，日军第 9 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被任命为上海日军总司令，统领驻沪海陆空军。他率万余名日军赴沪上任。56 岁的植田是日军老资格陆军将领之一。他在国内每天认真阅读上海方面的战报，对海军将领指挥地面作战深为不满。此次日军参谋本部让他领衔，也是因为上海作战主要是地面战斗，派出陆军将领负责指挥则可加大胜利把握。

植田倚仗优势装备和倍于 19 路军的兵力，首先采取恫吓政策。2 月 18 日，他以总司令名义给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限令中国军队于 2 月 20 日前撤出上海。“通牒”送到 19 路军指挥部时，蔡廷锴正在与师长们研究作战部署。他向大家如何答复这份荒谬绝伦、无耻之尤的东西。众将领几乎是齐声说：“用炮轰！”

于是，中国军队的所有大炮一齐朝着日军的兵营、阵地、指挥所、军舰怒吼。用这种特殊的“语言”给植田了一个特殊的“答复”。

2 月 18 日，张治中将军率第 5 军到达淞沪前线。第 5 军

接替了上海防线左翼的江湾、庙行、蕴藻浜至吴淞的一线阵地。第5军官兵早就憋足了劲来打鬼子，这次来到前线，部队士气高昂，决心与侵略者一决雌雄。

植田推翻了前任的作战方案，制定了将进攻重点放在闸北与吴淞之间的江湾一带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2月20日晨，植田下令开始了对上海的第三次总攻，一阵狂风暴雨般的炮击之后，万余名日军在刚从日本调来、首次使用于战场的坦克的掩护下，分两路向江湾杀来。

植田的指挥习惯是紧跟在冲在最前面的部队之后，进行直接的目视指挥。这天他把指挥部设在江湾附近的一间小土屋里，亲自向攻击部队下达战斗命令。

攻击部队出发不久，步兵前面的坦克在我军阵地前沿压发了地雷，“轰隆”、“轰隆”几声爆炸，坦克变成一堆废铁，我军向坦克后面的日军猛烈开火。

冲在前面的日军是植田亲自训练出来的善长攻坚作战的第7联队空闲升第2大队。他们听见枪声立即卧倒散开，很快形成战斗队形，几个小组交替掩护，不断寻机跃进，很快攻到阵地前沿。

我军见状，纷纷持枪跃出战壕，冲入敌群展开肉搏。由于敌我混战在一起，后面的日军无法展开火力，两军在阵地上杀得难解难分。

时至傍晚，两路日军的数次攻势都被我军击破，空闲升第2大队受重创撤出战斗，植田感到这回确实遇到强硬的对手了。

2月21日，植田指挥7000多名日军在飞机和舰炮配合下，向地域开阔，比较容易展开兵力的庙行一带实施强攻。这

一带是整个防线的重点地段，我军以钢筋水泥和多层铁丝网筑起坚固的封锁线，日军派工兵分队多次进行爆破都没有成功。直到夜晚，日军毫无战果。

日军工兵小队长东岛少尉所率领的 17 人只剩下预备班的三名新兵。望着手表显示出的离限定越来越近的时间，东岛扑通一声跪在这三个人面前，头重重的一低说：“拜托了！”

名叫作江、北川和江下的这三名新兵十分害怕，但激战之际军令难违，于是便带上爆破器材和烈性炸药，战战兢兢地向守军阵地爬去。正值深夜，由于害怕和没有爆破经验，三人不敢按《工兵战斗操典》规定进行单兵行动，而是挤在一起，互相拉扯着、鼓励着向前摸索。好不容易钻过两道铁丝网时，他们被守军发现。

当守军碉堡中的机枪向他们扫来时，他们吓得大哭，抱成一团，守军的枪弹打中了他们携带的爆破器材，引起烈性炸药的剧烈爆炸。铁丝网封锁线被炸开了一个十几米宽的缺口，后面的几十名日军乘机冲了过来，但因这次爆破成功出人意料，日军没有充分准备，几十人个很快被打死打伤大部，其余的忙撤了回去。

这个在战斗中发生的小插曲本来没有什么特别，但由于连续的失败，日军士兵士气低落，日军领导层极其需要一些实例进行宣传鼓动。于是这三个工兵一夜之间变成了“主动以死效忠天皇”的“肉弹三勇士”，三个无可奈何，不懂军事技术的新兵被加工宣传成完全另外的样子。

“接到爆破任务后，作江、北川、江下三人抱定了必死、必成的信念，将各自的后事托付给同乡战友，并将尚剩的香烟、衣物分给其他伙伴，在喝了诀别酒之后，即携带爆破器

于 22 日凌晨 3 时 30 分（注：这个时间是对的。）利用晨月的微光，继续对当面约 30 米外之铁丝网等物作了强行爆破。三人到达预定位置后，突然不顾一切，抱着已引燃导火索的炸药包向前突进，结果铁丝网被炸开各约 10 余公尺宽的两处，作江等三人亦同时被炸为碎片。攻击部队由三勇士的血肉开辟之突破口冲进敌人阵地。作江、北川、江下三肉弹之壮举，体现了皇军之无畏忠勇与大和魂之真姿。……”

（据说，“肉弹三勇士”至今仍被日军做为英雄贡奉着。历史，唉！可怜的历史呵。）

2 月 22 日黎明来临时，我第 5 军 88 师 262、264 两旅官兵已与进攻江湾、庙行的日军苦战一个昼夜，阵地前沿一线堑壕中到处铺着战死者的尸体，已分辨不清是哪国的军人。

天色大亮时，庙行阵地仅存的三十几名守军弹药全部打光，从附近尸体上取下的手榴弹和枪弹也已打光。他们默默地上好刺刀，望着密密麻麻走过来的鬼子，准备着最后的一搏。

就在植田挥动军刀指挥部下占领我军阵地时，突然日军两翼枪声大作。原来蔡廷锴见庙行危急，便与张治中会商，令 19 路军 61 师张炎旅和第 5 军 87 师宋希廉旅从两翼包抄日军。

攻击庙行的日军早已疲惫不堪，根本无力抵御两支援军的夹击。植田下令回撤为时已晚，日军乱得无法组织，他只好带着一小股日军和指挥组的人马夺路突围出去。

2000 多日军被包围在不足 3 平方公里的地带，蔡廷锴和张治中亲自督战，我军官兵又一次抓住“痛打落水狗”的机会，一阵血战，枪声、爆炸声密得如同刮起狂风。1 小时 30

分钟后，战斗胜利结束。日军大部被歼灭，部份被生俘。昨日受重创的空闲升第2大队就此被消灭，大队长空闲升受伤被俘。这一仗再次打出中国军队的威风，历史上称为“庙行大捷”。

据记载，空闲升自被俘后再也没说过一句话，总是一个人沉思默想。后来上海停战，我国政府释放了日军战俘，空闲获释后仍终日不语，在被送回国内治伤的前一天晚上自杀身亡。

植田的总进攻以总溃败而告结束。几昼夜激战中，我军共毙敌3000余名。“庙行大捷”当夜，一群日军散兵溜到杨树浦汇山码头，悄悄打听有没有回日本的船，想逃跑回国。

(八)

“庙行大捷”在全国各大城市掀起新的庆祝浪潮，人们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声援抗日、欢呼胜利，但多数人不可能想到，指挥上海抗战的蔡廷锴将军此时却忧心忡忡、茶饭不香。连日苦战，19路军三万余官兵已伤亡过半，第5军在抗击植田总攻战斗中也阵亡3000多人。眼看兵员和弹药得不到补给，队伍得不到休整，部队的作战能力迅速下降，而上海战事仍不见平息的征兆，蔡廷锴又急又气，心里暗骂国民政府中那些没有民族气节的官僚大员们。

自闸北开战，19路军如一根钢钉死死钉在淞沪防线上，日本内阁仿佛骑上了一只老虎，进退两难。大量增兵、三易主将都没有打胜，朝野一片责难之声。各方压力迫使内阁尽快想办法结束战事。2月28日，正是日军进攻上海整整一个

月的日子，日本陆军元老，著名军事家、前内阁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亲披战袍，率以他为司令官的“上海派遣军”两个师团4万多兵力跨海而来。

大兵压境、多寡悬殊，蔡廷锴、蒋光鼐、张治中联名电请国民政府增派援兵。电报发出却得不到回复。国民政府仿佛一块冰冷的石头，没有一丝气息。三位将军愤而通令上海守军“浴血坚守，直至一兵一卒。”

其实在这段时期中，全国各界和军队广大爱国将士无不昼夜关注着上海战局。刘峙、杨虎城、白崇禧、孙连仲、顾祝同、刘文辉、龙云等高级将领早就请缨参战，但政府高层认定打则必败，只能避战求和，故一律不批准增援。

2月29日，白川大将领率日军在沪的海陆空部队10万余人向2万多守军发起全线进攻。

在闸北，两军在八字桥、天通庵展开激战。八字桥三次被日军攻占，都被守军拼命夺了回来，双方均伤亡惨重，八字桥下的流水已是一片血色。

在天通庵，我军与日军相持8小时不分胜负。下午6时，日军组成敢死队，赤着上身，不戴钢盔，嚎叫着冲了上来。我阵地守军将前面的打倒，后面的又冲上来，眼看冲到阵地前沿，我军因伤亡很大，阵地上兵力不足，左翼被冲开一个口子，日军密密麻麻地向这里涌来。这时几个中国士兵急红了眼，抱着成捆的手榴弹大叫着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

几声巨响后，阵地上出现了短暂的寂静、我军和日军都愣住了。硝烟升起之处，一片血肉模糊。日军被这种自杀式防御吓得心惊胆战，不敢再往前攻。僵持了一会儿，便退了回去。3月1日战斗，虽然日军没有踏过我军阵地，但我军弹

药不足，兵力空虚，防御能力下降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全体中国官兵抱定必死的决心，苦苦支撑着作战。

3月2日，白川下令继续进行全线攻击。在闸北，我军抵抗着数倍于己的日军，打退了数次疯狂进攻。在江湾，日军猛攻杨家楼阵地，78师155旅官兵浴血抗击，杀伤大批日军，并击毙第9师团第7联队长林大八大佐，这个旅官兵在战斗中伤亡过半。

下午3时，白川综合各路部队作战情况，认为决定胜负的时机已经成熟，下令实施他早已想好的方案。

下午4时，在曾令日军伤心的庙行，白川兵分两路攻击我军阵地。敌众我寡，战斗异常激烈。在阵地即将失守时，离庙行较近的浏河守军一个团以大部兵力赶来增援。

浏河守军增援庙行后，逆长江西上，迂回到第5军后方七丫口的日军第11师团与正面进攻的日军相配合，向兵力薄弱的浏河发起强攻。

迂回战术，这是白川义则的军事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论点，他曾在其著作中说，“永远不要进攻可以迂回的敌人。”这次作战，他将正面进攻和迂回我军侧后相结合，使本已伤亡惨重，疲惫不堪的我军陷于困境。

浏河阵地上，我军仅剩不足一营，在抵抗由正面和背后两面攻击的日军中，官兵们英勇无畏，无一人逃生，直至全部阵亡。浏河失守，使我军的侧后方暴露于日军一个师团兵力的威胁之下。

3月2日晚，蔡廷锴做出开战以来最艰难的决定：全军退守位于嘉定、黄渡一线的第二道防线待援。因日军从浏河大批登陆，我一线阵地腹背受敌，而我军兵力单薄得已无力两

面应战了。

19路军官兵血战一个多月，天气寒冷、条件恶劣，得不到休息和补充。但杀敌报国的信念使他们个个士气旺盛，死而无悔，而当得知要撤离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多日的防线时，许多官兵泣不成声，表示宁愿战死，不愿撤退。许多民众代表来到阵地，诚恳劝说他们当撤就撤，保存实力，以图再战。官兵们发誓与日军不共戴天，定要报此血海深仇！

自1月28日日军侵犯闸北，19路军和第5军将士以劣势的兵力和武器装备，以中华儿男的血肉之躯，英勇奋战34天，大战数十场，以伤亡14801人的沉重代价，抗击日本侵略者对我中华民族土地的践踏，击毙击伤日军12000余人。撤退时，全军秩序景然，阵地上未留下一名烈士，一名伤员，一枪一弹。

3月3日，国联宣布开会讨论中日战争。同一天，白川义则发表所谓停战声明。

3月6日，19路军发出停战布告。至此，中日自“9·18”以来的这场规模最大的战斗宣告结束。

(九)

淞沪停战后，在英、法、美、意等大国的所谓“调停”之下，中日代表于5月5日签订了一个对我来说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上海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上海市区内不得驻扎我国正规军，却可以驻扎没有数量限制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国主权何在，尊严何在？！

中国人民怎能忍受这样的侮辱！签订这个条约的中国代

表，外交次长郭泰祺在会见民众代表时被代表们一顿痛打，重伤住院。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动则自停战起便更是此起彼伏。

停战不久，眼看鬼子兵在上海街头耀武扬威，上海滩有名的“斧头党”首领王亚樵怒不可遏。他秘密组织了一支专门抗日锄奸的敢死队，对日军进行暗杀和破坏。他手下一名敢死队员曾携带一枚由 19 路军提供的重 300 磅的定时炸弹潜入冰冷刺骨的黄埔江中，炸伤了日军旗舰“云出号”，敢死队员壮烈牺牲，日军为此大为惊恐。

4月 29 日是日本“天长节”，即天皇生日，王亚樵密谋乘在沪日本人举行阅兵式之机刺杀日军高级将领。朝鲜族抗日义士安昌浩、尹泰吉和金天山慨然领命，在那天乔装混入会场，将炸弹投在主席台上。行刺成功！炸弹在白川义则大将脚下爆炸，将白川炸得飞出 5 米多远。白川身旁的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一条腿被炸飞，植田司令官被炸瞎一只眼睛。野村被炸掉一只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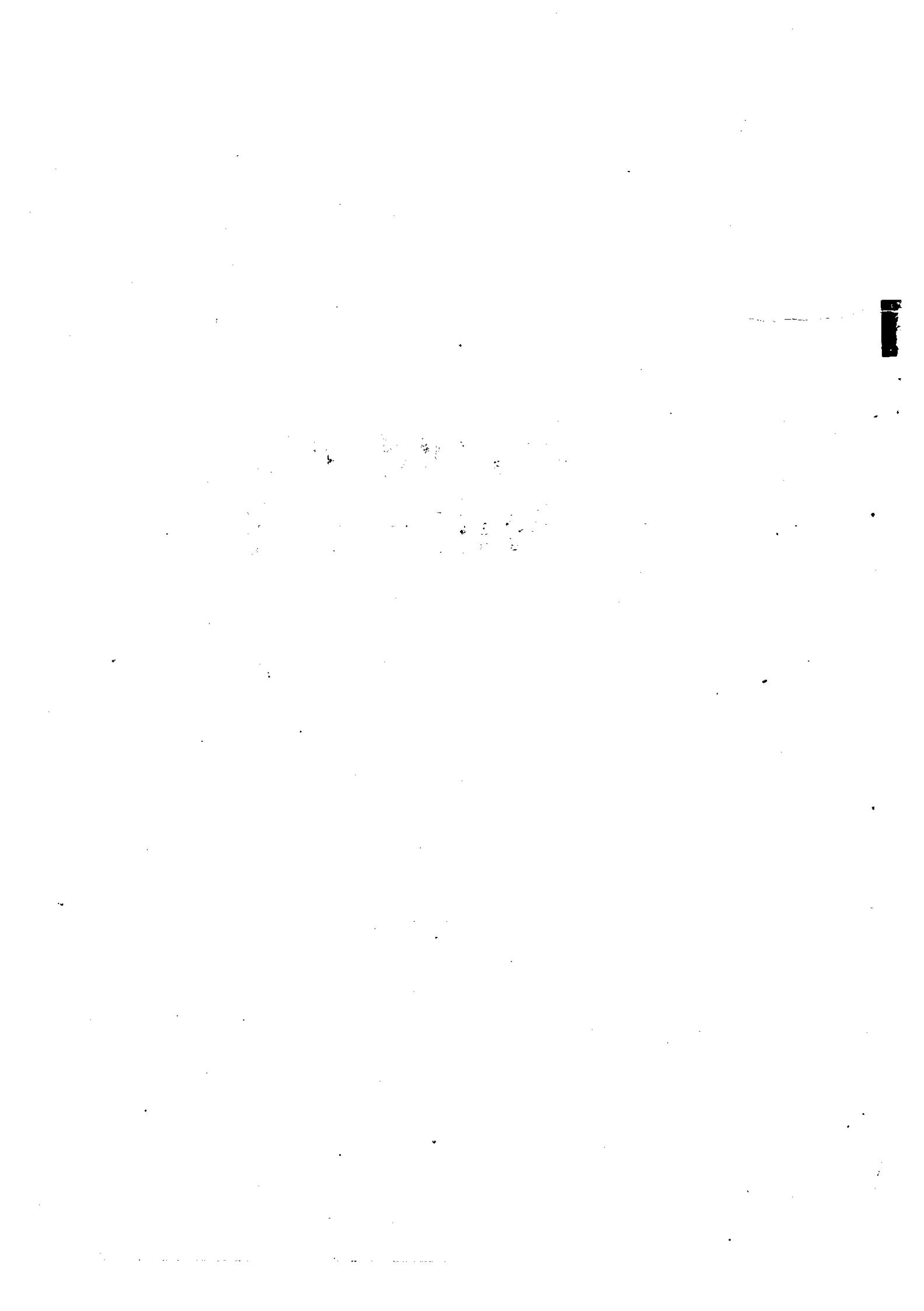
历史有时富于戏剧性，这些在中国土地上做恶的强盗终究逃不脱惩罚。白川义则被送入医院三天后死亡。

5月 28 日，“1·28”事变四周月。在苏州举行了隆重的“1·28 抗日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会场设在苏州城内的王废基公共体育场。蔡廷锴等淞沪抗日将领，宋庆龄、何香凝等爱国人士及 50000 多各界群众沉痛哀悼为国捐躯的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在众多悼辞、挽联、花圈之中，东吴大学送的一具巨大银盾格外醒目，上刻：

“烈士血，华族魂，垂万古，浩气存！”

二、再战淞沪： 一寸河山一寸血



引子

日本东京。1936年2月26日凌晨2时。

日本陆军第1师团营地，4个联队的日军官兵悄悄起床集合，进行了“效忠天皇、誓诛国贼”的最后一次训话之后，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军人快速奔出营区。

凌晨4时，这支队伍与其他队伍汇合为一支由115名军官和1474名士兵组成的军队。这支军队以隐蔽而突然的动作分头包围了位于东京各处的政府高级官员住宅。

从5时起，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从各处响起。受到袭击的有日本首相冈田启介、内大臣斋藤实、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大将、财政大臣（也称大藏大臣）高桥是清、天皇裕仁的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以及已经退休的75岁的前内大臣牧野伸显。

除首相冈田启介被误认，由他的私人秘书官、陆军大佐松尾传藏替死，其余几人均被毫不留情地用枪打死，用刀劈死。

接着，这些军人强行封锁了陆军省、参谋本部的办公机构，包围了警视厅和陆军大臣官邸，并控制了皇宫正门——樱田门。

6时30分，进行这次军事行动的部队派出香田清贞、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3名军官在陆军大臣官邸与陆军大臣川岛

义之进行会谈，说明了此次起事的目的。

这次被历史学家称为“2. 26 兵变”的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代表，一伙激进的青年军人制造的。这些人不满日本政府中那些在战争问题无休止的讨论、拖延而不能形成强有力统一意志的局面，他们不惜以自身生命的代价去铲除政府中那些不赞成迅速对外侵略扩张的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以促使形成一个高度集中、能动员一切力量并在政策上能协调一致、对外进行侵略的“军政府”。

这些激进的青年军人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19名主谋被枪决，近百人被判有期徒刑。）但政府朝着军国主义分子所期望的方向大大迈进了一步。十余天后的3月9日，日本组成以广田弘毅为首的新政府，陆、海军的高级将领中充实了一批年轻人。

一个更加富于侵略性的日本重新审视中国大地。

（一）

1937年初，日本策动我国的晋、绥、冀、鲁、察五省“自治”及内蒙独立。阴谋失败后，日本内阁开始考虑使用武力，趁我国尚未完全统一和国力不强，发动全面战争，达到灭亡我国的目的。

1937年7月7日，驻平津地区的日军挑起事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7月7日晚，日军驻丰台的步兵第1联队第3大队的第8中队在所谓“军事演习”中，称该部少了一名士兵，要求进入宛平城查找，受到驻守宛平的中国军队宋哲元29军所属的

冯治安 37 师 219 团拒绝。日军第 3 大队长一木清直少佐率日军一个中队，向卢沟桥中国守军发起攻击。

我军在 219 团团长吉星文上校和第 3 营营长金振中少校指挥下奋起反击，打响了我国八年抗日战争的第一仗，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7月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和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召集会议，布署向我国华北的进攻。在军事会议结束时的下午 6 时 10 分，还发表了一份颠倒黑白，杀机毕露的“声明”：

“由于暴戾的中国第 29 军之挑战而发生了华北事件，关东军正以极大的关心严阵以待，注视着这次事件的发展……”

7月10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以 5 个师团进攻华北。该计划于第二天得到天皇裕仁的批准。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7·7”事变时，蒋介石正在庐山训练团，接到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电报后，当即给 29 军军长宋哲元回电，指示他“宛平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7月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同一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九位中共领袖联名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下为国家效命！”

7月9日，红军高级将领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致电蒋介石：“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名

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在全国人民不断高涨的抗日呼声中，7月17日，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这次谈话以《最后关头》为题，见诸全国各报纸头版头条。

蒋介石说：“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与绝望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也希望和平，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二十九军现在所住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

蒋介石在讲话中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之决心。”

7月20日，蒋介石停办训练团，由庐山返回南京，召集全国军政负责人研讨抗日对策。

这时，国民党内部各派纷纷发出通电，表示拥护蒋介石领导抗日。在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全中国各民族，各党派空前团结，同仇敌忾，一心抗日。

日军在卢沟桥首开战端之后，大肆向华北进犯，经与中国军队激烈战斗，于7月29日和7月30日分别攻占北平和天津。

中国军队以落后的武器装备与装备精良、机械化强度很高的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我军参战部队无不伤亡惨重。第 29 军副军长佟麟阁将军和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将军战死沙场。

(二)

在侵略我国华北的同时，日本军阀又策划再从华东打开一条进攻中国的道路，他们选择以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为突破口，入侵上海后，对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形成南北两方面的威胁，从军事上和心理上打击中国政府的反抗。

在“7·7 事变”爆发的第 2 天，日本海军第 3 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中将便下令结束正在台湾附近海面进行的军事演习，向上海开进。途中，他发电报给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大川内传七中将，命他制定作战方案，做好先期进攻上海的准备。

同在 7 月 8 日，正在青岛住院治疗的国民党中央军校教育长，兼任京沪地区军事负责长官的张治中将军，谢绝了医生劝告，乘军用飞机赶回南京。

张治中受统帅部之命，自 1936 年起便秘密从事对日作战问题的研究，他预感日军全面侵华一定会凭借海空优势在华东开辟战线，而进犯华东，上海则首当其冲。上海不但是当时世界著名的贸易和金融中心之一，也是我国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的重要基地，更由于它靠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所以上海不论在政治、经济或军事上都堪称要地。

张治中从青岛直奔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见到参谋总长程潜后，程潜告诉他，蒋介石已任命他为京沪警备司令，

负责南京至上海地区的对日作战。接着，程潜问张治中，对上海御敌如何打算。

张治中对此显然早已深思熟虑。他说，日军要是进攻上海，我们无非是三种打法。一是他打我，我不还手，如“9·18”之后的东北；二是他打我，我才还手，如“1·28”上海抗战和长城抗战；三是我判断他要打我，我就先打他，这叫做“先发制敌”或“先下手为强。”张治中认为我军在上海应采取主动进攻的方针，而为了外交需要的先挨打，后还手的方法在中日正式开战之后的现在已经没有必要了。

这时程潜已知道我情报部门截获长谷川清发给驻上海日军电报内容，他原则上同意我军在上海先发制人，但叮嘱张治中要掌握时机，打则必胜，不要做了“夹生饭”。

7月10日，张治中回到上海，下令给蔡劲军上海警察总队和吉简章上海保安团增配枪支弹药；秘密调动钟松61师的一个团进驻虹桥机场；派人在市内重要路段构筑工事。

7月11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开进上海。当日中午，长谷川清在旗舰“出云”号召集海军武官本田、第3舰队参谋长岩树、陆战队司令大河内、陆军武官喜多等人开会，对进攻上海进行了具体部署。在这次军事会议之后，驻在上海的日军和日侨不断进行破坏、挑衅活动，为军事入侵制造借口，这是日军的惯用伎俩，也是明显的战争信号。

张治中认为淞沪之战不打则已，打则必是一场大战，所以他一面加紧作战准备，一面请示南京，调动主力部队来沪参战。

由于7月中下旬我军最高统帅部的注意力集中于华北战场，没有立即答复张治中的要求。直至7月29日，我情报系

统截获日军参谋本部发往驻华部队的《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其中有“以部分兵力在上海作战”的内容，这才引起南京军委会的高度重视。

蒋介石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上海离南京太近，如日军从这边过来威胁就太大了，他指示调动中央军主力向上海集结，同意张治中“先发制敌”的方案，彻底消除国民政府“后院”的危险。蒋介石向驻华中部队发布命令：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于规定同一时间内，将敌在我国华中地区以非法所强占领之各据点扑灭之。

一、国军于华北抗战初期，奇袭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尔后则确实占领之。

二、上海当局应充实宪警之力量，协助国军扫荡上海敌之潜势力。”

为阻止日本海军溯长江西上，蒋介石命令我海军与空军配合，封锁江阴要塞，将日军先行侵入的海军舰艇控制在长江以内，再分头歼灭。

谁知这个重要的军事机密竟被打入国民政府行政院担任机要秘书的汉奸黄浚窃取。黄浚是精卫的亲信，他和他儿子都曾经去日本留学，在日本期间因生活腐化负债累累，被日本情报部门收买为特务。此次，黄浚将我军要封锁江阴水道的计划密报日军情报部门，使日军有时间作出反应。

8月7日，日海军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下令，泊于汉口的日海军11战队各舰连夜撤退，并强迫沿江侨民立即随舰下驶，以使日军舰调动冠以“撤侨”之名。

于是，满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日本军舰和商船高速驶出长江，在上海附近海面重新集结。

日本巡洋舰“云鹤”号当时泊于九江，得到指令后，立即夺路东撤，沿途撞沉中国商船和民船多艘，造成死伤逾百人的惨案。

为防止中国军队沿江堵截，日海军还挟持两艘英国商船与之同行。

中国军队眼看日本军舰一艘艘扬长而去，怒火中烧却又无可奈何。封敌于长江之内的计划一夜之间归于流产。

日本海军在撤出长江舰只的同时，将第2、第3舰队所属的航空母舰、轻巡洋舰、驱逐舰、鱼雷艇等近百艘舰艇集结于吴淞口外，形成大兵压境的态势，等待地面部队的行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已经拥有了世界上堪称最强之一的海军部队。为削减日海军在战争中的威力，最高统帅部忍痛作出沉船封江的决定。

1937年8月12日，中国海军史上最悲壮的一页在长江江阴水面展开。

8艘军舰和20艘商船，在中国海军部部长陈绍宽将军指挥下横为一队，然后徐徐下沉。海军官兵在岸上向这些对于中国海军极其宝贵的军舰洒泪告别。

沉船封江使日军无法沿长江进入我国境内，无法象“1.28”抗战时迂回到我军背后，为我军在地面上抗击日寇打消了后顾之忧。而此时，中日两军在上海市区内的对峙也已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

(三)

事情还要从“虹桥机场事件”说起。

8月9日下午5时，日本海军陆战队驻沪西的第1中队中队长大山勇夫中尉率一等兵斋藤与藏，全副武装，驾驶军用摩托车强行闯入虹桥机场，我国机场卫兵示意停车，这两名日军竟然不听制止，将摩托车开足马力朝警戒线猛冲过来。在机场执行警卫任务的卫兵就是化装为保安部队的刚刚调入上海准备应战的钟松独立第2旅士兵，这些士兵平日恨透了日本鬼子，正憋足劲要和日军大打一场，此时见这两个鬼子兵横冲直撞，早已怒从心头起，当即开枪将其击毙。

在验尸时，发现其中一人衣袋内有两张印有“海军中尉大山勇夫”字样的名片。

事件发生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以电话通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请他派人前往处理。

8月10日，中日双方同至现场调查，确定大山、斋藤均因头部被击穿而死。调查结束时，日本海军武官本田少将对报界发表了带恐吓性的谈话，声称决不让死者作无意义的牺牲。

8月11日，冈本在会见俞鸿钧时提出：着日本海军制服的军人被中国军队所杀，这是对皇军的极大侮辱，此事已引起全日本的愤怒。冈本提出，在本案进行正式交涉前，中国方面必须做到两条：

一、撤退保安队。

二、拆除保安队设置的所有防御工事。

俞鸿钧正告冈本，此次纠纷的起因是日本军人非法闯入我国禁区，我保安人员理应履行职责进行防守。虹桥机场是中国领土，日方无权要求中方保安人员撤退。这位风度翩翩的上海市长极富外交才华，此时他板起面孔，警告冈本，如

日侨与日军不守秩序任意挑衅，纠纷恐将难免，请总领事先生好自为之。

“虹桥机场事件”见诸报端后，上海市民纷纷抗议日军挑衅，并采取一致行动，自8月10日起不向日本人出售大米及其他食物。使日本领事馆不得不采取应急措施，调出驻沪日军的存粮，定量向侨民供应。

此时，日军在华北战场已占领我国平津地区，并作扩大侵略的准备，自8月5日起，日本频繁出动侦察飞机对我江浙地区进行侦察，日本在地面和海面加紧集结兵力，大战在所难免。根据这些情况，南京国民政府军委会于8月11日晚下令，向上海调集部队围攻日军。命令的主要内容是：

一、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集结于无锡、苏州、常熟之王敬久第87师、孙元良第88师及配属部队向上海之预定围攻线开进，准备围攻上海之敌军。

二、刘和鼎第39军集结于蚌埠地区之刘尚志56师及江苏省两个保安团，担任长江南岸江阴、浏河地区的江防。

三、在嘉兴之炮兵第2旅山炮第3团，在南京的15公分口径榴弹炮第10团，由南京、宜兴向苏州开进，归京沪警备司令部指挥。

第二天，军委会又命令在汉口的夏楚中第98师水运至南京，在嘉兴的阮肇昌之57师第169旅以火车运至上海龙华；因去年“西安事变”调至西安的宋希濂第36师经陇海路运至上海。

张治中和他的参谋长徐权，将京沪警备司令部从苏州市内的留园向前移至上海以西的南翔。

当时驻在沪杭铁路沿线的部队，是苏浙边区主任张发奎

所属的第16师、第55师、第57师、第62师和独立第45旅、炮兵第2旅等部。

8月12日晨，我主力部队到达上海。张治中一身整齐的戎装，率领部队经过一夜行军，由苏州、常熟、无锡，马不停蹄地开进上海市区预定阵地。上海市民从梦中醒来，见遍地都是抗日部队，不由惊喜交集。

一位原黄埔军校的学员带着部队向张治中报到。他见张治中军容严整的大将风度，赞叹到：“很久没见教育长这么威风了。”张治中风趣地回答：“将军若在战场上阵亡，按惯例，敌军官兵看到后要敬礼，还要保护尸体，允许对方将尸体领回去，所以我要穿戴整齐，好让敌人认得。”

在中国军队主力开进上海的同时，日军在国内佐世堡港待命的第8战队、第1水雷战队、第1航空战队、第1和第2特别陆战队也于8月11日到达上海，其陆战队于当日晚11时登陆完毕。

8月12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要求英、美、法、意4个中立国家在上海的代表召开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下午3时，冈本在该会上提出，请各中立国对中国政府违反1932年5月5日停战协定，在上海市区内派入正式军队的行为予以制裁。

上海市长俞鸿钧即对冈本进行驳斥，他指出，上海局势之所以紧张，是由于日本的挑衅行为及向上海增派兵力而引起。各中立国代表应将日方的挑衅、破坏和战争威胁的行为报告各自政府，对日方给予谴责和制裁。

中日代表发言之后，法国领事代表中立国发言，他问双方军队能否隔开，以免可能发生的冲突。

俞鸿钧当即严正声明：我国军队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为自卫而进行作战准备，如日方撤退，则可避免冲突之危险。俞鸿钧表示：中国军队当恪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一贯政策。如日方不向我挑衅，我则不向其进行攻击。

其实中日双方和 4 个中立国都清楚，这个会开得除了白费口舌以外毫无意义。中日两国已在华北、东北进入战争状态，在上海又都做好了战争准备，根本不可能通过谈判解决任何问题。下午 18 时，淞沪停战协定共同委员会形成僵局不欢而散，日军上海特别陆战队司令大川内传七即下令其部队进入阵地。至当日晚 22 时，在上海的 4000 多名日军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第 2 天，即 1937 年 8 月 13 日，下午 4 时 50 分，进入阵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八字桥地区的伊藤茂第 3 大队首先向刚刚到达该地的中国军队孙元良第 88 师部队进行袭击，中国军队立即组织反击，由此拉开了“8·13”淞沪抗战的大幕。

(四)

战斗打响后，南京军委会下达攻击命令，命京沪警备军改编为第 9 集团军，以张治中为总司令，于 14 日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命苏、浙边区军改编为第 8 集团军，以张发奎为集团军总司令，守备杭州湾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以炮兵部队攻击浦西汇山码头和大公纱厂，支援浦西第 9 集团军作战。

按南京军委会划定的作战区域，京沪杭地区属于第 3 战区。为加强指挥，南京政府于 8 月 14 日即开战第二天，任命

军委员会副委员长，著名爱国将领冯玉祥为第3战区司令长官，负责淞沪作战。

冯玉祥字焕章，1882年11月6日生于河北省青县光集镇。他早年接受进步思想，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的滦州起义，1924年发动了驱逐满清皇帝的“北京政变”，后又参加北伐战争，他以反帝反封建为己任，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望。“9·18”事变后，冯玉祥八方奔走呼吁抗日，如今心愿得偿，他十分兴奋。在到任第2天，他便率人赴前线视察，在听到我军的炮声时，他高兴地说：“我多年以来为抗日而奔走。今日始听到我中华民族的怒吼之声，这是何等的痛快！”

战幕拉开之后，中国军队主动攻击虹口、杨树浦一带日军，两军在马路、街巷间展开激烈战斗。我军官兵斗志昂扬猛打猛冲，于14日下午4时占领了持志大学、五洲公墓、八字桥、宝山路等日军据点。

孙元良88师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之一，此次痛打日军，官兵们更是格外英勇。这支部队的一个传统是各级军官身先士卒，不避伤亡。在14日攻占持志大学的战斗中，该师264旅旅长黄梅兴遭敌炮击而壮烈殉国。

同一天，张发奎第8集团军攻击部队进展也很顺利。俞济时58师部队猛打猛冲，将浦东之敌300余人压至三井码头，日华纱厂一带，打得日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8月13、14两日，正值台风过境，日军在市区南部上风头顺风纵火，烧着大批民房，大批市民在烈火和混乱中丧生。日军企图以凶猛火势阻止我军在八字桥、广中路一带进攻，但我军官兵冒着浓烟烈火英勇杀敌，几度突破日军设置的“火阵”。

8月14日上午，我国空军冒着大风起飞轰炸敌陆战队司令部和吴淞口日军舰艇，日军旗舰“出云”号被炸弹击中受伤。日第3舰队司令长谷川清当时正在“出云”号中，该舰被炸后，他立即命令日本空军升空拦截，双方在上海上空展开激烈空战。年轻的中国空军首战告捷，击落日机3架，自己无一伤亡。当天下午，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领27架战斗机与日军18架轰炸机在杭州上空激战，我以无一伤亡击落敌机6架。消息传出，军民振奋，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倭寇空军技术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胆矣。”经担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女士提议，8月14日这一天被空军总司令部定为“空军节”。

8月14日深夜，张治中要求所辖各部将日军压迫至苏州河及黄埔江西歼灭之。

8月15日，中日两军继续激战。日军在我强大的攻势下伤亡惨重，退出部分阵地，我军乘胜追击，攻占了爱国女校、粤东中学。

三天的战斗使长谷川清深深感受到中国军队的凌厉攻势和坚定的决心。他一面令陆战队死守阵地，一面急电日军大本营，要求火速派兵增援。

日军大本营见初战受挫，急忙调集原来准备在青岛登陆的两个海军陆战大队赶赴上海，同时组成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的“上海派遣军”，率藤田进第3师团和山室宗武第11师团由日本本土赶往上海前线。

(五)

8月15日，蒋介石紧急召见正在庐山处理训练团收尾工作的军政部政务次长陈诚。陈诚接到急电，即乘飞机飞抵南京。二人一见面，蒋介石开门见山，向他对那份《国民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有何意见。

陈诚时年39岁，身材短小，精明干练。他自1924年在黄埔军校任教育副官以来，一直忠心耿耿地追随蒋介石。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兵谏，陈诚誓与蒋介石同生共死，他对张学良说：“如果蒋委员长遇害，就早一点把我也枪毙了！”他竭力说服张学良不要杀害蒋介石：“你把老头子（指蒋）扣起来，那就把中国交给你，你有那个能耐把中国搞好？全国的军队能听你的指挥去打日本？……”

《国民政府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是由参谋总长程潜上将于36年主持制定的。这个计划的战略主张是处处设防，御敌于国内外。陈诚根据他对我国国情、军力的研究，向蒋介石提出了持久作战的战略方针。

陈诚认为，我国军备落后，又没有充分的作战准备，不宜实施速战速决，也断难取得速战速决的效果。我国的长处在于国土广大，人口众多，经济资源散布各地，具有长期抗战的条件。他具体将抗战分为抵抗、对峙和反攻三个时期，主张据此制定长期抗战的战略与战术方针。

陈诚的见解得到蒋介石的肯定，认为这是符合实际的。在此之后，全国军民都将“持久战，三阶段：后退、相持、大反攻”；“以空间换取时间”等口号做为口头禅。中国抗日战

争的重大军事行动也无不以此为战略思想。

在谈到上海战局时，蒋介石坦率地讲出自己的忧虑。华北战场方面我军节节失利，上海之战的摊子铺开了之后日军大量增兵，原想扫除后方威胁，现在却陷入南北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事到如今，上海之战打与撤，各将领众说纷纭。蒋介石自己举棋不定，决心难下。

陈诚认为，我军面临两面作战，日军同样也是分兵两路。华北战争扩大在所难免，倒不如在上海大打特打，将日军主力吸引到不利于其机械化优势发挥的南方来，将主战场由华北移到华中，我军如能避开日军的机械化优势，还是可以与他拼个高低的。

蒋介石沉思良久，终于下定决心：把精锐主力都调上去，造成以绝对优势兵力打击上海之敌的局面，促使日军主力向南转移。

(六)

此时，上海市区的激烈仍在进行之中。8月17日，中国军队再次向日军发起强大攻势。87师攻占了日本海军俱乐部，88师冲入杨树浦日本坟山，两师协同攻击日军在上海的核心阵地——虹口海军陆战队司令部。

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是日军秘密修筑了多年的坚固防御工事群，有“陆上主力舰”之称。此时日军将装甲车和火炮配备在四周，构成严密的防护体系。我军缺少重型火炮，无法摧毁这个十分牢固的防卫系统，攻击部队的官兵们成批地倒在日军机关枪和火炮构成的火力网之前，数天中竟无进展。

8月20日，张治中下令将攻击重点改在汇山码头，计划将敌人的防线斩为两截再分别围歼。宋希濂36师受命后，于午夜0时由兆丰路向汇山码头攻击前进。一路上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凌晨1时30分，我军突破唐山路敌人阵地。冲在前面的216团胡团长全身5处负伤仍不下火线，冲到汇山码头时，几次爆炸都没有炸开铁栅栏大门，胡团长率先攀上大门，带领士兵冲入码头内。

我军攻入码头后将守敌大部消灭，残余日军支持不住，争相逃到外滩外白渡桥，向英租界内巡捕投降，以此保住生命。

21日夜，36师再次展开强攻，冲在最前面的是215团2营。凌晨1时，该营营长李曾中弹阵亡，全营高喊着营长的名字勇猛冲杀，于2时冲至华德路十字街口。日军阵地崩溃，四散奔逃。

因2营进展过快，后续部队与他们失去联系。日军见状，以8辆战车将华德路四面堵住，用机枪封锁同时放火焚烧周围房屋。全营死战多时仍不能突围，300多名官兵全部葬身枪下和烈火，为淞沪抗战写下惨烈的一页。

36师突击失利，奉命撤至唐山路待命。

87师、88师至21日夜仍未攻克敌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核心阵地，我军将这里团团包围，两军呈僵持状。

在华北和淞沪两大战场激战的日子里，承担消息传递的报界格外忙碌，8月22日这天，各大报刊登的头版新闻是比战场上的进展更令人振奋的一条消息。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命令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叶剑英为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

主任。第八路军下辖 3 个师、115 师，师长林彪；120 师，师长贺龙；129 师，师长刘伯承。这支年轻的队伍共有 3 万人，改编之后，立即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布署，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第八路军虽然只有 3 万多人，但接受改编，共同抗日的行动表明，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已经形成，中国真正进入了全民抗战的历史时期。

淞沪战场。23 日凌晨，松井石根大将率“上海派遣军”中的第 11 师团万余日军先期抵沪。松井组织各联队在吴淞、狮子林、川沙口等处登陆。2000 多日军大胆深入到殷行至张华浜一带，对正在进行围攻战斗的我军侧翼造成威胁。

23 日上午，冯玉祥与张治中、张发奎紧急会商，决定停止对市区内日军的攻击，火速调整兵力，转而对付登陆日军。至此，历时 10 天的围攻上海市区内日军的战斗告一段落。

正在急需用兵的紧要关头，陈诚率第 15 集团军援兵赶到。该集团军下辖罗卓英 18 军、刘和鼎 39 军、俞济时 74 军、周至善 6 师和炮兵第 16 团。冯玉祥命令部队马不停蹄，直接开至蕴藻浜至以北的浏河一线，昼夜不停赶筑工事，准备拦击登陆之敌。

冯玉祥将部队布署完毕，看看指挥室内的马蹄表，已是 23 日下午 5 点多钟。副官看冯忙完这一阵，不失时机地端来一大碗面条，外加几碟小菜，冯玉祥这才想起中午饭还没吃，正要吃时，只听南京专线电话铃响，只得又放下筷子。

电话是蒋介石打来的，蒋自南京来到前线，约冯玉祥即来上海市西北郊的南翔共议军事。

这时天下起大雨，冯玉祥驱车冒雨赶到南翔附近的徐公

桥一处大庄园内，见蒋介石携夫人宋美龄，与顾祝同、陈诚、钱大钧等人已等在这里。

不多时，张治中、张发奎和新就任的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率各师长赶到。这是一次高级军事会议。蒋介石总结了市区作战的经验教训，给部队明确了敌大批援军到达之后我军的作战方针。

蒋介石说，据判断，敌人从长江路岸登陆之后，企图从侧翼对我军加以包围并消灭，达到全面占领上海的目的。我军则在市区以北、浏河以南和江岸以西地区，由北至南组成三道防线，节节抵抗日军进攻。

散会之后，蒋介石留冯玉祥谈话。蒋介石在私下对冯玉祥以大哥相称，蒋说：“前线的将领都太年轻，勇敢有余，经验不足，望大哥多多指教。”

冯玉祥说：“仗打了十天，看到前方将领们一个个都是有血性，有良心，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他们在拼命、流血，打得很苦，也打得不错。”蒋介石说：“无论如何请大哥尽量加以指导。”冯说：“当然，请您放心吧。”

(七)

自8月23日起，双方大量援军陆续到达上海。比市区围歼战斗更为激烈残酷的两军主力的阵地攻防战斗逐步展开。

23日拂晓起，日军在沿江口岸强行登陆。我军主力只有56师刚赶到防御阵地，川沙口仅有一个连兵力，吴淞口的保安团和张华浜的警察总队是临时拉去抵挡一阵的，也无法阻止几十倍于己的主力日军。日军在上述几处登陆均获成功。

张治中急忙从市内抽调兵力，他命令教导总队2团阻击张华浜之敌；78师一个旅支援吴淞；98师向宝山、刘行、杨山、罗店前进，并命98师师长夏楚中指挥该师和11师阻击登陆之敌。

下午5时，98师向刚刚从罗店登陆，尚未站稳脚跟的700余名日军发起袭击，将这股敌人打退。在一名被击毙的日军少佐身上，发现了一张作战地图，经研究证实敌人进攻方向是罗店、嘉定和浏河。

24日，我第15集团军各部队以强行军到达上海，总司令陈诚命令各部立即向登陆之敌发起进攻。

此次淞沪作战，日本海军出动了全部6艘航空母舰中的3艘。从24日清晨起，舰上105架飞机全部出动，频繁地向我增援部队进行空袭轰炸。

我36师和87师各两个团联合作战，将张华浜登陆之敌2000多人包围。张治中兴奋异常，亲率指挥部赴张华浜督战，要求务必将被围之敌歼灭。两军在江边岸滩激烈拼杀，一时难分胜负。

从24日清晨起，我军在张华浜、吴淞、宝山、狮子林以及市区的汇山码头同时与日军激战。上海市区、郊区到处硝烟滚滚，枪炮声此起彼伏。

24日下午4时，蒋介石由南翔来到设在市郊的前线指挥所，用电话勉励各部英勇作战，痛击当面之敌。全军士气大振，加强攻势。至下午6时，98师与吴淞镇守军配合，将吴淞口登陆之敌千余名压至江边。日军背水作战，格外疯狂。两军越战越近，我军索性挥刀与敌肉搏，日军抵挡不住，丢下500余具尸体，夺路向狮子林方向溃逃。

傍晚，36师与87师部队逐步缩小了对张华浜之敌的包围圈，松井石根调集舰上炮火压制我军，因两军相距很近，许多炮弹落入敌阵。这场围歼战斗到此时已进行了5个多小时，敌我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战场上处处尸体横陈，血将江边的水都染红了。我军终未能将这股日军全歼，天黑之后双方各自后撤休整。

由于我军将作战重点放在打击江边登陆之敌，市内兵力减少。24日晚，冯玉祥命令突入杨树浦、虹口地带日军阵地的部队撤回，沿租界各路口固守，以防市区内日军发起反扑。

8月24日晚，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宣布：从即日起，封锁我国长江口至广东汕头的海面，遇有中国船只一律扣押。第三国船只在一定条件下方可出入。

(八)

25日凌早，日海军旗舰“出云”号指挥所。松井石根与长谷川清在反复研究地形和我军兵力分布情况之后，定下以主力攻克罗店的决心。

罗店是控制沿江各河口的重要据点，对登陆和反登陆作战都至为重要。25日清晨，松井石根指挥第3师团主力，分兵三路，在川沙、狮子林、吴淞口强行登陆，上陆后三路日军直扑罗店。

奉命防守罗店的是陈诚15集团军罗卓英第18军的霍揆章14师和李树森67师。两师一正一侧，与三面杀来的日军激烈战斗。日军利用身后舰上炮火的明显优势，步步逼进罗店外围守军阵地。

我军部队在这片不很广阔的防御空间中显得很密集，人员和阵地互相靠得很近，日军炮火对我军造成的威胁十分严重，几乎每一个炸点附近都有伤亡发生。为减轻敌人的炮火优势，我军只得将敌人放近再打，战场上经常出现短兵相接、激烈肉搏的场面，每打一个回合，双方都要运下一批死者和伤员。

25、26、27日三天，罗店战场激战不停，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代价，我军官兵三个昼夜没有休息，经常边打仗边啃几口冷干粮，时常可见困极了的士兵在战斗最激烈时竟在战壕中睡着了。

27日傍晚，日军停止了进攻，做调整补充，我军亦抓住时机修复工事，补充弹药。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将军冒着冷枪冷炮来到前沿看望官兵。

陈诚见士兵们在阵地上疲惫不堪，无精打采的样子，并没有责怪他们，他知道正是这些人在用血肉之躯阻挡着日军的优势装备。他走了几个阵地，在一个机枪掩体中与士兵们攀谈起来。他问机枪手懂不懂“枪语”，机枪手们迟疑地摇摇头，不知道怎么回答。陈诚说，日军的机枪手在战斗开始时总是打三发点射，“啪啪啪”、“啪啪啪”，意思是在问我们的机枪手“怕不怕？”如果我军是有经验的老兵，这时就要回答两发点射，“啪啪”、“啪啪”。意思是“不怕！不怕！”这样敌人就不敢小看你，进攻时就会非常小心。如果我军的枪手勾住扳机不放，乱射一通，敌人就知道你是个新兵，胆子小，放长点射壮胆，那他就要瞧不起你，猛打你了。

陈诚的一番话说得士兵们开心地大笑起来，阵地上的气氛顿时轻松了许多，士兵们显得精神了不少，几名老兵向陈

诚表示一定多杀鬼子，守住阵地。

又走了几个阵地后，陈诚感到前沿工事太差，部队伤亡很重，目前又无援兵可调，很难再坚持了。他吩咐两位师长再顶 28 日一天，待他布置好下一道防线后便将部队撤下来。

28 日晨，又一批日军登陆。三路日军对罗店展开集团强攻。守军从 23 日敌开始登陆起，已顽强坚持了 5 天，部队已经伤亡过半，战至中午，数百名日军从右翼阵地突入我军防线，防守那里的官兵几乎全部阵亡。缺口一开，大批日军蜂涌而入，从侧面向我防线猛冲，我军抵挡不住，撤出阵地。

罗店失守的消息很快报到蒋介石的指挥部，蒋大为震惊，严厉斥责陈诚不该放弃坚守，并令他立即组织反击，务必夺回罗店。当晚，陈诚调集 14、11、67 等师反击罗店，密集的枪炮声整整响了一夜，日军顽强防守至天明，我军反击不成，只好撤了回去。

(九)

30 日，陈诚第 15 集团军退守由狮子林、宝山至杨行镇、刘行镇一线。陈诚精心布下一个梯形防御地带，使部队既能阻击各方来敌，又能相互支援补充。官兵们来不及休息，抓紧时间构筑工事，补充给养弹药。

日军在攻占罗店之后，登陆条件有了很大改善，松井石根命令 11 师团协同第 3 师团迅速攻占吴淞镇，彻底打开登陆的大门。31 日，日军第 3 师团在海军强大火力的配合下，在吴淞口抢滩登陆，11 师团从陆上攻击吴淞镇守军。防守吴淞的部队是张治中第 9 集团军杨步飞 61 师的一个团。全团官兵

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虽然极其艰苦危险但仍浴血死守，寸步不让。

松井石根在一艘军舰上亲自指挥攻击吴淞镇，他预计凭借优势兵力和强大火力，最多3小时定可结束战斗，但攻击开始后，5小时匆匆过去了，攻击部队仍被挡在外围，气得他折断手中的指挥尺，让参谋要通海、空军作战指挥官的电话。

不多时，参与当天各处战斗的20多艘军舰的炮火和30多架轰炸机一齐将目标集中到吴淞镇。密集的轰炸铺天盖地，小镇上本来已是满目疮痍的民房连同守军阵地一起，倾刻之间变为一片焦土。

冯玉祥、陈诚分别在各自的指挥部看见吴淞镇上空的浓烈硝烟，他们痛惜我军官兵又一次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守军在剧烈的炮火下伤亡殆尽，日军乘机占领了吴淞镇。

松井石根见集中轰炸的办法奏效，便如法炮制，下令将火力集中于狮子林守军防线，但日军报告，在防线大部分地段，两军已相距很近，许多地方已混战在一起，不宜再以炮火覆盖，松井这才作罢。

此时的狮子林正杀得天昏地暗。守军张治中第9集团军夏楚中98师路景荣583团官兵正与几倍于己的2000余日军激烈战斗。敌人越逼越近，逐渐靠近团长路景荣指挥所在的主阵地，路景荣一声大喝，率官兵跃出战壕与敌人展开白刃格斗。

路景荣平日深受全团官兵爱戴，进入阵地那天，他当众宣读遗书，抒发报国壮怀，全团官兵庄严宣誓，与狮子林炮台共存亡，在短兵相接的严峻关头，官兵们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以热血实践着自己的誓言。

白刃格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敌军源源补充，583团寡不敌众，官兵们一个个倒下。战至黄昏，路景荣遭敌机枪射击，身中十余弹牺牲，不一会，全团官兵全部阵亡。

第9集团军指挥所内，张治中得到狮子林失守的报告，呆呆地站了很久。参战以来，夏楚中98师已伤亡4960人，其中团以下军官便有200多人。

9月1日，日军第12、18、22、26旅团由日本佐世堡启程增兵上海。日本内阁决心不惜代价打开华东大门，战胜中国军民的抵抗意识。

援兵到达当日，松井石根下令拉开战线，以优势兵力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总攻。战线自浏河起，经罗店、宝山、狮子林、炮台湾、吴淞，向西折入蕴藻浜、张华浜、江湾。日军兵力之多，攻势之猛，使我军首尾难顾。两昼夜激战之后，已有许多阵地被日军突破。

9月1日至4日，罗店地区战斗空前剧烈，两军都在拼命争夺这个控制登陆的关键地势。我军攻击部队将占领罗店的日军团团包围，日军后续部队又从外面将我军包围，我军援兵又到，分几路向敌包围圈猛烈冲击……在整个罗店地区，双方阵地犬牙交错，两国士兵短兵相接，双方都记不清阵地已经几度易手，空旷的滩涂上血流成河，尸体累累无法收拾。战后几十年，从参加罗店战斗的两国老兵的回忆资料之中，作者惊异地发现，当时，日本和中国士兵们竟不约而同地称这里为“血肉磨房”。这看似偶然的巧合，透露出多少关于这场战斗激烈残酷的可怕回忆！

直到9月5日清晨，陈诚第15集团军俞济时74军的51师赶到，猛烈袭击日军左侧后，与包围圈内的我军部队一道

围歼 1500 余日军，动摇了日军防守罗店的布署，日军被逼退了出去，这场恶战才告一段落。

(十)

9月5日，是敌第3师团68联队攻击宝山城的第3天。我军98师583团3营营长，黄埔6期毕业生姚子青率全营500官兵死守城池，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挡了回去。

68联队长鹰森孝大佐在9月4日战斗中挥动指挥刀与士兵一起攻城时，被我军步枪穿透右臂，此时他左手持刀，继续指挥攻击。

5日下午4时，城内守军弹尽粮绝。日军攻陷宝山城东门，姚子青派二等兵魏建巨出城向上级报告，然后收拢起全营仅有的70多官兵。他将步枪上好刺刀，对他们说：“死的时候到了，大家都要死出个中国人的样子来！”

日军炸开东城门，潮水般涌过来，姚子青一声令下，这几十人一起大喊着冲向敌群。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我军官兵们一片片栽倒在地。

从后面赶上来的鹰森孝大佐急忙命令停止射击，他想抓几名俘虏，看看将数倍于己的对手顽强抵御了三天的军队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组成的。但为时已晚，倒下的中国士兵中只有一个还没有死去。

日军从四周向这个士兵逼近。这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士兵头部、胸部、双腿到处是伤，但他仿佛根本没有看见围上来的日军，艰难地用双臂支撑身体，一点点爬向营长姚子青。

姚子青已经停止呼吸，但双目仍在怒视苍天，这个士兵

用手将营长的双眼闭合，随手抓过营长手中那只上着刺刀的步枪，将刺刀尖朝自己喉咙猛地一扎……

日军们静静地看着这一切，没有人说话，呆立了良久后，联队长鹰森孝大佐用低沉、嘶哑的声音说了句：“真正的军人！”

583团3营500名官兵中唯一的幸存者，二等兵魏建巨向98师师长夏楚中报告了全营与宝山城共亡的消息，夏楚中与在场的师指挥所全体人员向宝山城方向脱帽致哀。

(十一)

远在日本京都的日本内阁的成员们每天通过战报了解上海作战情况，中国军队的抵抗能力大大超出他们的预料，9月4日，内阁会议决定将侵华日军的作战经费追加25亿日元。9月6日，日军大本营决定分两次再向上海增兵5个师团，并将3万名预备役兵员派往上海作战各部队进行补充。9月10日，这5个师团中的首批3个师团的日军到达上海。参加上海作战的日军总数达到12万，并配备重炮300多门、战车200多辆、飞机300多架、大小舰只70多艘。松井石根策划再次发动全线进攻。

经过“从8·13”起一个月的艰苦厮杀，我军各部队均有很大伤亡，作战能力逐步下降。9月12日，蒋介石在昆山督战时，决定调整兵力部署。我军全线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至双草墩第二道防线。

9月12日至17日，淞沪战场上出现了少有的平静，中国军队退至第二道防线后，中日两军都在做短暂休整补充，准

备下一轮战斗。

大概是因为打了一个多月的仗终于打完了，16日，刘行镇附近村庄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赶出七、八只羊，在离两军阵地不远的草地上放起来。两国士兵都看见了孩子和羊群。我军士兵为这个孩子捏着一把汗，日军竟也没有开枪射击孩子和羊，大约是因为饱受战火熬煎的军人们都由此感受到一种仿佛已经很遥远的和平生活吧。

然而，战争并没有过去。9月18日凌晨3时，日军第3师团两个联队分两路偷袭刘行、罗店我军阵地，我军发现后立即反击，敌见偷袭不成，即转为强攻。两军激战至上午8时，日军被我击退。

9月中旬，日军在华北战场加紧攻势，因冯玉祥熟悉北方情况，又为当地将领拥戴，蒋介石便请冯兼任第6战区长官，负责华北抗战的组织领导工作。

(十二)

9月下旬起，敌人援兵又至，我军被迫转入全线防御。9月21日，蒋介石自己兼任第3战区长官，他重新调整淞沪地区作战部署，将参战部队分为左翼、中央和右翼三个作战军，总兵力为40万。右翼军总司令陈诚，辖15、19集团军；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辖第8、10集团军；张治中在前期作战中积劳成疾，回后方养病，由朱绍良代他任中央军总司令，辖第9集团军。此时，中国军队的多数精锐部队都已部署在上海，日本内阁认为这是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有利时机，因而严令淞沪日军加强攻势，务必夺得战斗

胜利。

经过几天调整和补充，日军于9月30日拂晓再次向守军发起总攻。松井石根命最有突击力的第9和第11师团在强大火力配合下，强攻高桥至刘行我军防御正面。

我军防御地带处在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地质松软，一挖一公尺便是泥浆，无法构筑坚固工事，大批部队在敌人猛烈密集的炮火下无法藏身，伤亡惨重，防御能力大大削弱。

敌第9、第11师团以绝对优势的炮火为先导，迅速向我军阵地推进，我官兵以血肉之躯拼死抵挡着日军的疯狂进攻。9月30日至10月6日，双方激烈拼杀，反复争夺，日军终于冲破我正面防线并向纵深推进达3公里。我军被迫再次调整战线，大场地带成为两军攻防的焦点。双方在蕴藻浜两岸展开恶战。

在左翼军杨汉城133师阵地，官兵们与日军苦战七个昼夜，全师伤亡达十分之八。10月7日下午，797团6连阵地遭敌炮火覆盖，连长陈月村等十几人当场阵亡。陈连长的妻子是我军战地医院的医生，当时正在附近阵地救护伤员，得知丈夫牺牲，悲愤至极，她从被炸得七零八落的肢体中找到一节丈夫的断臂，举在手中，代丈夫指挥连队继续抗击，听到冲击命令后，她身先士卒，冲向敌阵。

右翼军18师师长朱耀华趁战斗间隙巡视前沿，远远看见被炸得残破不堪的直属团阵地垒起一段米高的胸墙，走近时，才看出这道墙竟全是以我军战死者的尸体垒起的！朱耀华平日十分爱兵，见此情形头皮发炸，他抓住副团长杨如礼的衣领，气愤得不知该说什么。

杨如礼目光发直，呆呆立正站着，并不解释什么，朱耀

华冷静下来，想起这个团团长负重伤，几个营长全部伤亡，全团人数现在还不足两个连。

烈士的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朱耀华捧起一把泥土，垂泪说：真是一寸河山一寸血啊！

10月7日傍晚，日军由蕴藻浜北岸猛攻我南岸左翼阵地侧背，守军两面受敌，伤亡剧增，阵地被敌人突破。

日军乘势连续发起攻击，企图一举突破南岸阵地，占领大场，切断防守在闸北、江湾我军的退路。左翼军总司令陈诚下令坚决反攻，收复蕴藻浜南岸阵地。

为减少日军飞机和舰炮造成的伤亡，我军采取白天防守，夜晚出击的战法。我军官兵敢于夜战、近战，单兵素质不比日军差，连续几天中，我军每天向前推进一段距离。10月13日夜，我军发动强攻，一举收复了南岸阵地。

南岸阵地的恢复使我军防线得以巩固，蒋介石听到报告十分高兴，于14日晚带领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李宗仁、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乘火车前往前线，列车行至苏州近郊，突遇几十架日军飞机追逼轰炸。蒋介石心中明白，不知是哪个暗藏的汉奸将情报透露给日本间谍网了，正在发恨，只见数十个照明弹如悬起几十个小太阳，把夜空和地面照得雪亮，列车清晰地暴露在敌机的火力之下，情况十分危急。幸而列车行至一个郊区货运小站，车长亲自指挥紧急制动，列车在巨大惯性作用下又向前冲出50多米才停住，因车内早有刹车准备，没有人员受到损伤，蒋介石等人赶紧下车，躲入站内的防空工事，敌机滥炸一阵，将列车打得如同蜂窝，这才哼哼地飞走了。侍卫长清点人员，除一名医官在下车时摔断了腿骨，全车无一伤亡，将领们皆称万幸。

在八年抗战中，蒋介石几次化险为夷，躲过日机和间谍的追杀，而蒋夫人宋美龄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就在距 10 月 14 日蒋介石遭到空袭不到 10 天的 10 月 22 日，宋美龄乘坐一辆小车到淞沪前线慰问，途中，十几架日军飞机叮住小车轮番轰炸扫射，宋美龄的司机据说身怀绝技，武功和车技皆高深莫测，此次遇险，他加大油门，想从炸弹和子弹的缝隙中钻过去，不料因车速太快，在一个炸弹坑中猛地一颠，球一样滚出公路，连打几个滚，四轮朝天摔在公路以外的河沟里。宋美龄在这次车祸中肋骨折断好几根，脸部、头部、身子多处出血，立时昏死过去，同车的外国顾问瑞纳先生也受了重伤。幸而抢救及时，二人均大难不死。

(十三)

10 月 15 日，从广西调来的廖磊第 21 集团军辖胡宗南 1 军、韦云松 48 军共 10 个师兵力到达淞沪战场，编入中央作战军序列。18 日，蒋介石下令我军分兵 3 路对日军发起反击。

从 18 日到 21 日，我军从杨径河向以东的蕴藻浜两岸日军阵地猛攻。这时日军部队已疲惫不堪，知道我援兵到来，不敢硬拼，战至 21 日晚，整个战线向后收缩 4 公里。

在日军指挥部里，松井石根也在因惨重的伤亡而烦恼不安。至 10 月 20 日，陆军 5 个师团又一个旅团皆损失巨大。号称精锐的第 9 师团伤亡已达 6000 以上，占总数多半，其他如 101 师团这几个从没打过仗，在国内训练又较差的部队，伤亡已突破 9000，简直是所剩无几了。松井在战报中得知，华北日军长趋直入，至 10 月中旬，已占领保定、石家庄、沧州、

德州等地。松井感到十分不解，他不相信竟有这么容易的事，上海一战，他了解中国军队并不好对付。

在松井再三催促下，日军大本营于10月21日决定以谷寿夫第6师团、牛岛贞雄第18师团、末松茂治第114师团和国崎登步兵第9旅团组成第10军，由柳川平助为司令官，再次增援上海。10月22日，日军第10军到沪。松井石根命令以第10军为主攻部队，集中淞沪地区所有海空军火力，向中国军队发动反攻。

战前，松井有意安排接受西方记者采访，他说：“这一战将会决定日中两国在上海地区的胜负，皇军将不惜使用一切作战手段，包括化学武器。”

我军统帅部知道日军掌握化学武器，但由于中日开战之后日军还没有将化学武器投入战场，我军大部分部队也没有配备防化装具，听到松井的威胁，统帅部立即研究对策。在松井会见记者当夜，我国政府紧急召见各中立国使节，请他们警告日本遵守有关国际公约，不能使用化学武器；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四处搜寻防化装具，紧急配备给各作战部队。

10月22日黄昏，全线日军以旅团为单位，举行极为庄严肃穆的告别军旗仪式。以表示在战斗中不惜以死来表示对天皇的效忠。仪式之后，同乡人之间相互赠送随身物品，留下遗言，让战斗中幸存的人回国后转送给各自的亲人们。

10月23日，淞沪地区小雨淅沥。日军将所有能调动的部队全部投入对我军防线的攻击。战斗从清晨5时开始起就异常激烈。日军倚仗重型火器的明显优势，步步逼近我军防线。战至中午1时，我军全线共牺牲了三万多官兵，阵地无法保持，只好边打边撤。

下午4时，日军在长达十几公里的前线顺着微风向我军阵地施放了几十颗烟幕弹。因我军已被告知敌人可能使用化学毒剂，而防化装具又未能来及运到前沿多数部队，我军误认为敌人已使用毒剂，纷纷躲避。顿时，战场秩序严重混乱，部队难以组织。

日军见“毒计”得逞，乘势猛攻，我军抵挡不及，退至大场一线。日军紧追我军，双方在大场展开激烈战斗，一打就是两天两夜，两军杀得天昏黑地。

10月25日下午，日军经与朱耀华18师血战后攻入大场镇。镇内的18师指挥部已接接到20军军长杨森下达的撤退命令，师长朱耀华忙率师指人员出镇向西急行。

朱耀华骑在马上疾驰时，只见沿途战壕中填满了我军官兵的尸体。因战场上伤亡太大，救护队和民工一般都是先救伤员，一些死者被就近埋在战壕或弹坑内，多数都来不及掩埋和运走。这些为抗日守土流尽鲜血的官兵们现在却曝尸荒野，朱耀华心如刀绞。他想到大场阵地几得几失，如今18师基本拼光仍不能守住，大场在自己责任之内失守，身为丧师辱国之将，还有何颜以对百姓和长官！

朱耀华想到这里，只觉得眼前阵阵发黑，他昏昏沉沉地勒住马，翻身下鞍，拔出腰间手枪，将枪口举向额头。待参谋长和卫兵看出要出大事，大喊着过来拦阻时，枪声已经响起。

朱耀华是抗战以来第一位自杀殉职的高级将领，蒋介石感念其诚，指示不究其大场失守之过，与其它阵亡将领同视之，从优恤奖。

大场失陷后，闸北、江湾、庙行中国守军侧背受到日军

威胁。为避免更大损失，蒋介石下令我军主力撤至苏州河以西。

(十四)

10月26日早晨，第3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打电话给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命他留一支部队在闸北坚守，牵制日军，掩护我主力撤退。

孙元良放下电话后陷入沉思：这支部队任务艰巨又注定孤立无援，谁能担此重任？想来想去，拿不定主意，他通知副官，立即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

会上，孙元良说明了情况和任务，问在坐军官谁愿挑起这副重担，留在闸北孤军奋战。沉默片刻之后，第524团副团长谢晋元中校说：“我愿留下。”

孙元良注视着这位33岁的青年军官，重重地点了点头。谢晋元毕业于黄埔四期，为人刚直正义，作战有勇有谋，正是当此大任的合适人选。孙元良当即任命谢晋元为524团团长（原团长在战中负伤，由谢代理职务），以524团一营为骨干，组成加强营，设一个机枪连、三个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共452人。

会后，孙元良带着谢晋元和一营营长杨瑞符少校来到一座坚固的六层大楼前说：“这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家银行联营的仓库，当地人称为四行仓库，这是我军在上海市区最后的阵地。”

谢晋元和杨瑞符看到这是一座易守难攻的高大建筑，楼层中储存着大量的弹药、粮食和饮水，他们满怀必胜的信心。

向孙元良保证坚决完成任务、与四行仓库共存亡。孙元良正式向谢晋元下达：“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庄严命令。

10月26日夜，我军主力部队撤离了坚守两个多月的上海市区。市民们洒泪相送，别情依依。我军官兵心情沉重，默默地向西开进。离开了这个曾用鲜血和生命拼死保卫过的城市。

谢晋元率全营进驻四行仓库。他对全体官兵说：“从明天起我们就处在日军包围之中，这座仓库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还有一个人，我们也要同鬼子拼到底！”

四行仓库长120米、宽15米、高40米，紧依苏州河，与公共租界一河之隔。谢晋元指挥士兵们用麻袋装满土将所有门窗堵紧，留出射击孔，一直干到天亮，将全楼的兵员和火力配备就绪。孙元良在撤走前指示在仓库内安排了一部秘密电话。通过留在市内的我军特工人员，沟通内外联系，此时这条细细的电话线仿佛就是孤军的生命线。

10月27日早6时，日军由东向西开来，接近四行仓库时，谢团长一声令下，各射击孔内一起射出愤怒的火舌，日军猝不及防，70多人应声倒地。见楼内有中国军队，日军立即摆开队形，组织进攻，全营官兵居高临下，不多时便将敌人击退。

上午10时，日军再次发动进攻。因大楼紧靠租界，日军不能使用大炮，而机枪步枪对仓库厚实的墙壁又奈何不得，至12时，日军不得已停止了进攻。下午1时，日军顺风点燃仓库附近房屋，乘浓烟滚滚笼罩大楼之际发动了第3次进攻。全营在谢晋元指挥下，忍受着浓烟熏烤坚持战斗，直至将敌人

击退。

晚上，租界的英国巡警送来一张由一位法国记者写来的纸条，上面以笨拙的中文写了几条采访内容：大楼中有多少守军，战斗中伤亡情况如何。谢晋元回纸条答道：守军八百，2亡4伤。

第二天，上海的多家中外文报纸都刊登出八百孤军勇守四行的消息。上海市民奔走相告：中国军队还在上海，中国军队还在杀鬼子！

10月28日上午8时，日军发动第4次进攻。为节省子弹，守军等敌人接近大楼时投掷手榴弹，日军向大楼冲了几次，伤亡十几人，终不能进入楼内。下午5时，敌第5次攻打大楼，同样遭到失败。

上海人民非常关心四行仓库内的守军。自28日起，在苏州河南岸一座座大楼顶层，每天有成千上万的市民观战，他们挥动帽子、毛巾向楼内官兵致意，还将学校使用的黑板抬上楼顶，把日军的集结地点，行动情况写在黑板上给守军看。28日晚，上海救亡团体同万国商团谈判，通过租界中外国巡警帮助，把食品装在布袋里，用绳子抛到大楼墙角边，楼内士兵在大楼底层打了一个墙洞，抢运食品。

日军的观察哨发现之后，在附近一座楼房里用机枪封锁墙洞。在抢运食品的过程中，有3名士兵不幸中弹阵亡。

这种运送食品的办法虽然很危险，但可以使楼内官兵经常吃到新鲜的蔬菜。食品袋中还经常夹带着一些当天的报纸，使守军能及时了解到外的消息，当看到连续不断的对四行仓库守军的报道和赞扬时，他们深受鼓舞，表示一定要守住阵地，多杀鬼子，回报上海人民的关怀，为中国军人争荣誉。

10月29日，日军向新闻界宣称：“苏州河以北地区已全部被皇军占领。”然而，就在当天，“占领区”中的四行仓库守军粉碎了日军第6次进攻。

29日晚10时，编号41的中国童子军成员，年仅15岁的杨慧敏小姐，冒着生命危险，悄悄越过日军哨兵和租界巡警的警戒，钻过铁丝网，从窗口爬入仓库大楼。

由于事前经过秘密电话的联系，谢晋元等人早已在等待。见到这位小使者后感到非常亲切。杨慧敏脱下童子军制服，取出一面被汗水浸湿的国旗。

国旗在朦胧昏暗的马灯灯光中缓缓展开，这些身经百战、坚强无比的军人们无不热泪奔流。谢团长激动地对杨慧敏说：“勇敢的同志，你送来的岂止是一面国旗，这是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精神啊！”

谢晋元立刻吩咐做好升旗准备。士兵们找来两根竹竿，接起来做为旗杆，在东方露出微茫曙色时，将国旗升起在楼顶平台上。

几十名官兵在楼顶平台列队，庄严地向国旗敬礼。这是一个极其简朴的升旗仪式，没有音乐与鲜花，但在每个人心中，中华民族神圣的尊严与心中的热血一同沸腾、奔涌。

进行完升旗仪式之后，谢团长带着杨慧敏在楼内各处参观，当看到负伤的士兵时，杨慧敏坚决要求留下来护理他们。但谢晋元不能同意，孤军生死未卜，怎能再让一个女孩承担危险？谢晋元硬是把杨慧敏送到门口，这时天已大亮，谢晋元一把将杨慧敏推出门口，大喊：“冲过马路，跳下河！”

当日军反应过来，开枪扫射时，杨慧敏已经潜入水中。平日练就的游泳技术使她很快游到对岸。当她在公共租界上岸

时，只见苏州河畔站满了人，人们纷纷向四行仓库楼顶上那面迎着朝阳舒展飘扬的国旗招手欢呼！

八百孤军顽强坚守，女童子军深夜送旗。一个既壮烈又美丽的故事通过报纸和电波广泛传扬，一时间轰动了世界。

谢晋元率领这支部队在全国和世界的注目中坚守了四天四夜，我军统帅部认为该部牵制日军掩护主力撤离上海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10月31日，蒋介石亲自为这一个营下达命令：撤离四行仓库，归回建制。

88师副师长冯圣法专程潜回上海，组织孤军撤退行动，在英国驻华军司令斯马来特和美军顾问团长蔡斯的协助下，制定了由仓库以南越过苏州河，经租界至沪西归队的撤离路线。

撤离命令由电话下达给谢晋元时，谢坚决要求留下来与日军战斗到底，冯圣法再三说明是最高统帅亲自下的命令，是大局需要，他才表示服从。

31日深夜零点，坚守四行仓库的孤军开始了与日军最后一战——撤离阵地。斯马来特将军亲自指挥英国士兵用小钢炮将日军封锁仓库路口的探照灯击毁，谢晋元率队火速冲出仓库。

日军情报系统已于当天侦知我孤军要撤出四行仓库，他们一面向租界方面提出交涉，威胁不惜动用武力也要制止孤军利用租界来保护自己，一面加强了对仓库的监视封锁，探照灯被炸灭后，日军十多挺机枪从周围朝仓库方向乱射。

全营官兵冒着弹雨冲过北西藏路进入租界，一路上20多人负伤，营长杨瑞符左腿被打中，血流如注。官兵们互相搀扶着、协助着，全部到达英租界。

这支号称八百的 452 人的队伍，在孤军奋战的 4 昼夜中，共毙敌 240 多人，自己仅伤亡 37 人。尤其是他们坚强的意志和英勇的精神，在全国同胞中引起强烈的反响，鼓舞了抗日斗争的士气。31 日，蒋介石下令，为孤军每人晋升一级，为团长谢晋元颁授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但令人痛心的是，本已突出日军重围，死里逃生，眼看就要返回大部队怀抱的谢晋元部官兵，在进入租界后却受到租界警方的扣押和迫害。原来日军威胁要占领租界，慑于压力，租界警方不放孤军归队。

于是，谢晋元领导着这支光荣的队伍，又展开了一场比坚守四行仓库更加艰苦卓绝的斗争。

(十五)

坚守四行仓库之战，为整个淞沪抗战书写了一个可歌可泣的尾声。11 月 1 日后，日军又以两个师团的兵力增援上海，我军主力被迫由苏州江以西继续后撤。蒋介石曾想利用“九国公约组织”限制和制裁日本的行动，但在 11 月 3 日召开的“九国公约组织”会议上，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公然支持纵容日本侵华，蒋介石寄予极大希望的英国和美国采取的竟然是“中立”和“不介入战争”的政策。当中国代表顾维钧对于会议没有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以任何制裁提出抗议时，各国代表对顾的抗议以“沉默对待”，只有法国代表说了句：“我们实在无能为力。”

指望别国、指望所谓“公道”来挽救一个民族的幻想破灭了，中国在此时比在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只有靠自己的力量

才能拯救自己。

11月5日，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向上海以西迂回，我军于11月9日进行总撤退。11月12日，上海地区全部沦为敌手。

自“8·13”中日两军在市区开战，到11月12日上海沦陷，在历时3个月的苦战中，中国军队以伤亡30万人的巨大代价，抗击了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在中国发动的最大的攻势。淞沪之战打碎了日本以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梦想，显示了中国政府和军民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强决心。我军以劣势装备伤亡日军12万，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淞沪之战是由局部抗战转为全面抗战的标志。由此，两国军队和两个民族展开了一场接一场的殊死搏斗。

三、台儿庄： 拼将热血写捷报



引子

1938年1月24日晚上，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旁边一座小院内的2层小楼里，两个身穿便衣，精明强干的年轻人敲开楼上一个大套间的房门，对正躺在里屋床上闭目养神的人说：“何部长请您过去谈话，请跟我们走吧。”

床上那人年纪约在五十上下，中等身材，一副保养得很好的气色。听来人话后，并不应声，懒懒地披衣下床。两个年轻人中的一人又说：“家里有什么事没有，如果有信我们可以送到。”

这时房间主人已经穿好衣服，从穿衣镜中对身后两人冷冷摔过一句：“我没有家！”便转身开门下楼。

那人走到楼梯半腰时突然停住脚步，只见从门厅到院内，不知何时已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

那人愣了片刻，转过身来，对紧跟在他身后的两个年轻人说：“我脚上的鞋小，挤得脚疼，我回去换双鞋……”

话音未落，猛听得身边几声沉闷的枪响，那人浑身一阵痉挛，挣扎着转过身来，瞪着眼睛恨恨地说了句：“你们，敢打，打我……”便软软地倒了下去。

在倒地的瞬间，他看见周围数不清的枪口再一次朝他喷吐火光，然而他已经没有丝毫疼痛了……。

第二天，中央通讯社在全国各大报刊醒目位置刊登了国

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等军法会审判决书。

“被告韩复榘，畏敌抗令，不战而弃防地……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

(一)

1938年初，日本内阁在侵华战争问题上陷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华北方面军从北路占领了北京、天津、太原、张家口等城市，华中派遣军由南路攻陷上海、南京，在表面上，军事进攻进展顺利，大有乘胜前进，一举灭亡中国之势；另一方面，内阁和统帅部中一些头脑清醒的军事专家们看出，中国这块土地也实在太大了，日军取得的这些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经过与中国军队的几次大战，使人感到以速战速决灭亡中国已绝无可能，那么战争陷于令人痛苦的持久作战对日本是十分不利的。日本的军力犹如一块皮条，攻占华北和华中后，这根皮条已经绷得很紧了，如再往里深入，兵员补充、后勤供应将更加困难，皮条就有绷断的危险。中国地广人多，为打日本而征兵简直是一呼百应，蒋介石手中还有200多个正规师，其中半数是中央军的精锐。

日军统帅部认真分析了日、中两国兵力、国力之后，提出在1938年8月以前不发动新的攻势，而是巩固占领区，对部队进行补充和整顿，待作好充分准备之后再说。

2月16日，日军召开大本营御前会议，即直接和天皇共议大计。天皇听完将领们对于情况的分析，认为还是稳妥一些的好，于是决定在1938年内不发动新的进攻。事情似乎就

这样定了下来。

然而战争这部可怕的机器一旦被启动，就会按照自己独特的规律运行起来，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日军一路血腥地攻城略地，长驱直入，在中国土地上逞尽凶残，尤其是攻占了“敌国首都”南京之后，这些侵略者的骄横狂妄达到头脑发昏的程度，仿佛中国只是一块等待他们去大啃大嚼的肥肉。

1月12日，海军不顾与陆军协调，甚至对统帅部也隐瞒了真实意图，以训练为名，在青岛地区登陆。1月29日，日本陆军第5师团也赶到青岛。当时青岛守军只有市长沈鸿烈指挥之下的海军陆战队500人和100多名警察，接火不久便撤了下来。日军占领青岛后，沿胶济铁路西进，因我军在胶东没有主力部队，日本第5师团在师团长板垣作四郎指挥下一路畅行无阻，很快便深入山东腹地。

板垣原以为我军主力第3路军十余万兵马会凭藉黄河天险和泰沂山屏障设防抵抗，如果是这样，将有一场恶战，中国军队虽然装备落后，但得其地利和民心，绝难轻易可以战胜。

没想到身为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路军总指挥的韩复榘指挥十余万兵马不战自退，日军轻取黄河，更加不可一世，不几日便吞没了大半个山东。

板垣师团由潍县南下沂水，直逼临沂。这时由南路杀来的日军矶谷廉价第10师团也一再突破日军大本营设置的限制线，沿津浦铁路而来，这两支日军一拍即合，相约会师于位于徐州东北的台儿庄，一同攻打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市徐州。

徐州地处津浦铁路与陇海铁路交叉点，扼苏、鲁、皖、豫四省要冲，是中原和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的重要屏障。徐州以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成为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在南北日军重压之下，徐州能否防守得住，全国上下无不悬着一颗心。

国人的担心不无道理，我国是一个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真正统一的国家。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建立了共和体制，但从1911年直至抗日开始，军阀混乱不休，各地区不乏拥兵自重、占山为王的绿林豪杰。许多真心报国的热血青年也不得不卷入无休止的内乱。即便到了抗日战争开始时，军队之中仍是派系林立，时有如韩复榘者，公然抗令的将领。

但自“9·18”事件之后，随着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高涨，大多数军队将领以民族大义为重，服从国民政府领导，逐渐统一到抗日的旗帜之下。在韩复榘被判处死刑之后，中国军队上至战区司令，下到普通士兵无不深受震惊。由蒋介石等高层领导制定的“革命军人连坐法”等军事法规得以执行。每次战斗之后都认真总结，奖功罚过，部队的纪律日益严明，战斗能力因此而有较大提高。在中国土地上骄横轻狂的日军不会想到，正有无数双猎鹰般的眼睛在密切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随时都在寻找时机给他们以致命的一击。

(二)

1938年2月27日清晨，十几位中国军队的高级军官在徐州机场迎候。为首的是第5战区司令长官，陆军上将李宗仁。

李宗仁字德邻，广西临桂县西乡人，桂系领袖。他17岁

从军，历经讨袁护国、统一广西，挥师北伐的多次重大战事，是民国革命军中著名战将。出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之后，他认真分析总结了我军多次防守失利的原因，认为我军装备落后于敌，不能采取消极的阵地防守，而要集中我军兵力，分散敌人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运动防御”是他此次迎战日军的基本作战方针。

不多时，从天边飞来一架美式小型飞机。飞机在跑道中缓缓停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走了下来。与众位将领寒暄几句之后，蒋介石问道：“德邻兄，你看徐州可以守吗？”

李宗仁说：“请委员长放心，徐州在短时期没有问题。”

见蒋介石将信将疑的神情，李宗仁又说：“如果能得到充足的补给，我可能还要打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

来到第5战区指挥部后，李宗仁向蒋介石介绍说，日军矶谷廉介第10师团和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从两个方向奔台儿庄而来，板垣师团已经在临沂与我军接火。蒋介石打断李宗仁问道：“谁在守临沂？”

李答：“庞炳勋。”

第3军团长兼40军军长庞炳勋年近花甲，这员西北军的宿将几乎经历过辛亥革命之后的历次战争，抗战之前，他一向以消极避战，保存实力而被军界同仁们称为“老泥鳅”。抗日烽火一起，他一反常态，积极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7·7事变”之后，他率部在津浦线姚官屯车站一带与日军大木旅团激战四个昼夜，以惨重代价守住了阵地。1938年3月初，庞部奉李宗仁之命防守临沂。庞炳勋深知临沂是徐州外围军事重镇，其得失关系第5战区全局，他决定坚守临沂，阻敌南

犯。当他的部队抵达临沂时，当地百姓热情欢迎，青壮年踊跃投军入伍，妇女们拿出鸡蛋慰劳军队。一位 80 多岁的大娘将一篮鸡蛋送到庞炳勋的指挥部时，庞深受感动，对官兵们说：“我们如不拼命打日本鬼子，真对不起老百姓！”

2月下旬，日军板垣师团的先头部队开了过来。庞炳勋指挥部队主动出击，节节把守。他命令 115 旅北进莒县，与日军激战，取得毙敌 200 余人的战果，该旅也损失 500 余人。接着，他命令 116 旅在垛庄、汤头一线截击继续向南推进的日军，毙敌数十人，击毁敌汽车 3 辆，缴获 1 辆。

3月3日，日军主力相继开到，庞炳勋率领 40 军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在飞机和坦克掩护下猛攻我临沂前沿的汤头阵地，两军相持 4 天后，汤头失守，临沂城暴露于日军火力之下。

3月8日，庞炳勋令 231 团正面攻击汤头之敌，补充团与 229 团分别抄袭日军两侧，敌军在我三面打击之下撤出汤头。

3月10日，板垣师团的精锐——田野旅团赶到，5000 多日军在 30 多门大炮和 20 多辆坦克的配合下，猛攻我军阵地，一天之内便将临沂城外围的我军阵地全部攻陷。

3月11日，日军田野旅团开始攻城，庞炳勋指挥部队拼死抵抗，战斗十分激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日军攻势持续不减，后续部队也在快速运动过来，庞炳勋急忙向李宗仁发报求援。

电报刚发出不久，只见副官急匆匆拿着一份电报来见庞炳勋，庞以为来了救兵，连忙接过来看。这封电报是蒋介石亲自发给他的，内容是：“临乃台、徐屏障，着令你部坚决保卫，绝对不能弃守。”

(三)

第5战区指挥部内，李宗仁正站在地图前沉思，参谋长徐祖贻和一位中年军官走了进来。

“德公，你看谁来了。”

“荩忱！”李宗仁高兴地迎上前同来人握手。

来者是第59军军长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他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革命，后投笔从戎，在冯玉祥领导下，由下级军官逐渐升为军长，“7·7”事变之后，他奉宋哲元密令，以北平市长身份与日军周旋，受到国人误解，李宗仁了解到张自忠为人正义，治军严明，与日伪打交道实为忍辱负重，并无卖国求荣之意，便为他四处奔走说情，使他能回军队带兵抗日。

李宗仁找到蒋介石，介绍了张自忠的为人和北平事情的原委，请他说句话，批准张回部队。蒋介石沉吟了一会说：“好吧。”说完提笔给军政部写了一张条子，让张自忠回到原先的单位59军，仍任军长，编入第一战区战斗序列。

张自忠在上任之前专程来到李宗仁住处辞行，深深感谢李对他的帮助。张自忠激动地说：要不是李长官一言九鼎，我纵有百口也难向国人说清，历史会把我写成汉奸的。李长官对我恩同再造，我在有生之年定当以热血生命报效国家民族，报答长官知遇之恩。

张自忠言出至诚，不由热泪流淌，李宗仁也深感得一知己，激动不已，两人互道珍重，依依惜别。

板垣师团自青岛登陆节节西犯，张自忠59军被军委会调

往第五战区，加强李宗仁徐州一带御敌的力量，这样张自忠便成为李宗仁的部下。两人相见，分外亲热。张自忠说：“蒙李长官厚爱，使自忠有机会重上抗日战场，还希望能将最艰巨任务给我，自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李宗仁愣了一下，低头想了一会，犹豫着说：“眼下倒是一件很苦的差事，只是……”

张自忠爽朗地说：“李长官请讲。”

3月12日清晨，板垣征四郎率领着他的指挥部登上临沂城外的一座小山。连日攻城不下使他大为恼怒，尤其是听说津浦线的矶谷廉价第10师团不顾与他协同，单独迅速南下时，一股妒火从他心底燃烧起来。

板垣深知，他与矶谷这两支不按统帅部意图行事，违反了“稳扎稳打，年内不发动新的进攻”的方针的部队，所采取的进攻行动，却在客观上为整个在华日军的部署创作了一个有利的态势，这就是如攻克徐州，便可打通华北和华中两个战场，使在华日军联成一体，为下一步深入中原腹地的进攻行动做好战略准备。

板垣从国内转来的报纸和每日两次传来的各方面情报中，察觉出日本天皇，参谋本部和日本国民都在观注着即将拉开帷幕的徐州之战。两个师团的迅速运动并没有受到参谋本部的制止，只是接到日军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的电报，告诫两个师团要注意配合协同，不要离得太远。这分明是对这两支部队的支持和纵容。板垣隐隐察觉出这其中还有一种竞争、比武的味道，谁先攻入徐州，谁便成为大东亚圣战的英雄。板垣绝咽不下屈辱人下这口气，他发恨尽快扫除临沂这个屏障，赶上矶谷，攻打徐州。

为此，他严令各部队，务必于今日攻克临沂城池，消灭守城华军，挥师台儿庄。他腰挎战刀，亲自来到攻击部队督战。

上午7时，日军开始攻城，密集的炮火朝临沂城防工事下冰雹似地猛砸下来，将大部分掩体，阵地炸得稀烂。数千名日军分为两路，从城西、城南攻了上来。

庞炳勋的指挥所设在城内的一所学校内，日军的炮火已将校舍和教室炸得七零八落，电话机中不断传来各阵地告急呼救的声音，庞炳勋心中焦躁，一根根抽着烟，苦苦思索如何应付眼前的严重局面。

不可能下令撤退。蒋介石亲自发电报严令拒守。如弃守逃命，即使不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也难逃军委会的军法会审。韩复榘被处决就是最好不过的例子。况且日军正向临沂两侧运动，已经掐断了庞军的退路。那么打，打他个鱼死网破，这些疲惫不堪的兵，这些陈旧落后的武器，就是全部拼光了，能挡住鬼子进临沂吗？

庞炳勋正在苦想，被爆炸落下来的砖石砸伤脑袋的电报员拿起一份电报跑来。庞炳勋一把将电报抓在手里，不知是凶是吉，展开电报纸时两手直抖。

电报是李宗仁发来的。“临沂防线关系重大，必坚决保卫，拒敌前进。已令张自忠前往增援，并派本部参谋长徐祖贻就近指挥。”

庞炳勋看完电报之后，心里并没有高兴起来，他又点燃了一支烟，默默地抽着，回想起一段往事。

过去，庞炳勋与张自忠同是冯玉祥部下的战将，一同打过许多大战苦战，彼此以患难之交而情投意合。庞年长，张

以大哥相称。1930年，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庞炳勋投靠蒋介石，倒戈反冯玉祥，张自忠多次劝告庞炳勋回心转意，庞不听，于是二人分道扬镳。

在一次蒋介石与冯玉祥的战斗中，庞炳勋带人袭击了张自忠的师部，双方展开一场混战。混战之中张自忠胸部负重伤，若不是警卫营长死命相救，也就命丧黄泉了。从此张自忠对庞炳勋恨之入骨。“这个时候，”庞炳勋心想，“他会冒死前来救我吗？”

这时传令兵跑来报告，日军已攻破城南大门，防守在那里的三个营官兵全部阵亡了。

庞炳勋仰天长叹一声，命令指挥部勤杂人员们烧毁文件电报，领取枪支弹药，临时组成几个战斗小组，准备做最后一拼。

庞炳勋在北伐战争中腿部负过伤，落下残疾，走路时微跛。此时他跛着腿，带着一位参谋和勤杂人员向战斗最激烈的城南走去，一个号兵趁人不注意向路边一条小巷跑去，庞炳勋看也不看，挥手一枪将那逃兵打倒，又带人继续向前走。一群人也不排队，乱哄哄却又默不作声地只顾走。这进城西枪声大作，喊声震天，一位参谋叹息道：“229团那边也完了。”

突然，庞炳勋停住脚步说：“不对，你们仔细听听，那是我军的冲锋号，哒嘀哒嘀哒哒哒哒——没错”！他激动得大叫：“59军来了！我们有救了！”

果然，不多时，就见日军纷纷溃退。城内守军见援兵到了，也抖擞精神，发动反击，战场形势陡然急转。

原来，张自忠奉李宗仁之命增援临沂。临行之前，李宗仁对张自忠说：“我知道你和庞军团长有宿怨，但现在是国难

当头，你当以大局为重。”

张自忠坚定地回答：“孰轻孰重，自忠自知，请李长官放心，自忠绝对服从命令，保证全力以赴，与庞将军携手打好这一仗。”

为了争取时间，张自忠带 59 军以强行军速度赶往临沂，官兵们扔掉许多物资，只携带枪枝弹药和少量口粮拼命奔跑，一个昼夜下来，有些体弱的士兵累倒、累死在路上。进入战场之后，张自忠下令立即向围城日军发起攻击，日军首尾难顾，退出攻击线，临沂城防转危为安。

在庞炳勋的指挥部中，张自忠一声“大哥”，叫得庞炳勋老泪横流，两位为抗日重又生死相依的将军手紧握在一起。

在第 5 战区参谋长徐祖贻组织下，3 月 14 日，59 军强渡沂河，与 40 军内外夹击，向日军展开反击，两军在沂水河畔和蒙山丘陵中激战五个昼夜，伤亡日军 2000 多人，板垣叫苦不迭，率部向莒县逃窜，我军追至莒县城下，见日军坚守不出，也不再攻，大胜而归。

临沂一战，将日军伸向台儿庄的两臂砍去一只，我军士气大振。蒋介石、李宗仁分别传令，嘉奖庞、张两部官兵。国民政府特派军事参议院院长陈元前来视察。陈元看到城内堆积如山的战利品，感慨万千，赞不绝口。

庞炳勋部士兵生俘两名日军。在押解去军部途中，两名俘虏互相对骂而至厮打，其中一人狠踢另一人要害致其死亡，押解的士兵哭笑不得，只好抬着死俘去交差。

(四)

就在板垣师团被庞炳勋和张自忠围在临沂狠打的时候，位于津浦线上的日军矶谷廉介第10师团已经开至台儿庄西北的滕县。

在布置对滕县守军的攻击时，矶谷收到板垣发来的电报，提醒他注意与第五师团的配合，以免孤军深入遇到不测。矶谷看完电文之后，极其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随手将电报扔在一旁。

矶谷廉介是在日本著名的1936年“2·26”兵变后被起用为陆军军务局长的青年将军。为了在军界的前途，他必须以显赫的军功证明自己并击败竞争对手，他也同板垣一样，看准了徐州之战这个天赐良机，决心在此战中一显身手，奠定自己的英雄地位。

军帐中，参谋送来一份滕县守军的情报，矶谷看后心情很好，用口哨吹起一支欢快的日本民谣，正好伙夫送来午饭，矶谷问伙夫：“你知道中国有一支叫做‘杂牌军’的部队吗？你知道‘杂牌军’在战争中的用途吗？”说完后哈哈大笑。

守卫滕县的部队是川军122师。师长王铭章生得虎背熊腰，在川中绝对是彪形大汉。他是川军中的一员虎将，为人正义廉洁，颇得民心。“7·7事变”之后，他在德阳誓师抗日，率部赴山西与日军作战40余天，部队伤亡过半，败下阵来。38年1月，122师编入李宗仁的第5战区，此时奉命防守滕县，阻止日军南下。

滕县是津浦铁路重镇，是徐州的门户，能否守住关系重

大。王铭章望着武器装备远不如中央军其他部队的自己的122师官兵们，不由心情沉重。这时副官报告说，李长官派人送来的枪械弹药运到。王铭章心头一热，想起自己被编入5战区前的一段尴尬往事。

王铭章122师随邓锡侯22集团军出川抗日，先是被编入第2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苦战多日，不敌日军强大攻势，太原失守后，川军随大部队狼狈后撤，沿途遇到晋军的军械库，也就顾不上许多，赶走守卫，破门而入，见枪扛枪，见弹装弹。事为晋军头子、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所知，当即大发雷霆，亲自发电报给蒋介石，一定要将川军调出山西。委员长无奈，说：“第2战区不肯要，把他们调到第1战区，问程长官要不要？”

军委会将电话打给在郑州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告知这是委员长的意思，并如实说出事情的原委。谁知程潜对川军纪不良早有风闻，在电话里便一口回绝。当军令部次长林蔚将此消息报告蒋介石时，蒋正为南京失守而心情烦躁，听后勃然大怒说：“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四川去称王称帝吧！”

这时白崇禧恰好在场，他劝蒋介石息怒，说：“让我打电话到徐州，问5战区李长官要不要？”说完便挂通武汉至徐州的长途电话，向李宗仁细细诉说了事情的经过。李宗仁与白崇禧是至交，又正值韩复榘不战而退，5战区兵力不足之际，便立即同意将川军调到徐州来。

白崇禧说：“他们的作战能力当然要差一些了。”

李宗仁说：“当年诸葛亮扎草人作疑兵，他们总要比草人好些吧？请你快调来吧！”川军就这样被编入第5战区序列了。

到徐州后，第 22 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和副总司令孙震拜见李宗仁，见面便苦笑说：“一二两个战区都不要我们，真有天下之大，无处容身之慨。李长官肯要我们来，真是恩高德厚！”

李宗仁说：“大家能够一同抗日救国，也算是难得的机会，今后团结一致和敌人拼命吧！”

邓、孙二人表示绝对服从李长官指挥，不避艰险，奋勇杀敌。

李宗仁了解到川军装备很差，缺枪少弹，便从自己库存中拨出大批新枪和弹药，补充给川军各部，使 22 集团军上下士气大振。王铭章 122 师是第 22 集团军的主力师，此番踞守滕县，明知任务艰巨，全师上下斗志昂扬，决心打出川军威风，为川中父老争光。

3 月 14 日，矶谷派出濑谷启第 33 旅团向滕县发起进攻。王铭章率部奋勇抗击，激战一昼夜，日军仍被阻于滕县外围。

濑谷旅团一向是矶谷的得意先锋，一天战斗没有进展，矶谷知道面前这支部队远不是他想象之中不堪一击的“杂牌军”，于是他仍以 33 旅团正面攻击城外守军，另派两上联队从两侧迂回至县城两侧，直接攻打县城。

3 月 16 日晨，正面防线首先响起激烈的枪炮声，不多时，县城东西两侧同时受到日军进攻。王铭章率领城内 5 个营兵力沉着应战，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

中午，第 22 集团军派出一个旅的兵力增援滕县，进至滕县以南的南沙河一带时，受到日军的堵击，双方遂即展开激烈战斗。激烈的枪声和爆炸声使城内官兵情绪高涨，王铭章命令组成突击队向援军来的方向冲，配合援军夹击敌人。但

由于敌人连续向堵击地带增加兵力，援军寡不敌众，被迫后撤。城内部队听到枪声逐渐远去，心情开始沉重，知道救援无望，只有死拼一条路了。

16日一天中，122师伤亡惨重，杀至傍晚，县城东关被日军突破，东关守军严翔少校所率的一个营大部伤亡，城内只有11个连。王铭章被迫收缩兵力，将在城北铁路正面北沙河一线的两个营调入城内。

17日凌晨2时，日军在东城墙炸开两个大缺口，随之潮水一般向城内涌来，守军拼死将日军抵挡在缺口附近，战斗中团长王麟与数百名士兵一同牺牲。

滕县的危急情况王铭章已向李宗仁做过汇报，李令王死守县城，等待援兵。可现在敌人已经攻到城内了，援兵仍不能突破堵击赶来会合，王铭章知道他和他的部队，和这座孤城都已到了最后时刻了。

王铭章把副官叫到身边，将一份全师人员花名册交给他，说：“你立即化妆出城，回去拜上川中父老，说王铭章和122师所有川人子弟，唯将一腔热血泼洒抗日疆场来报还亲人养育之恩了！”

副官一听，泪如雨下，双膝下跪，哭道：“师长，全师五千弟兄已经快拼光了，咱们对得起那些官老爷了，撤吧！来日方长，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有机会杀鬼子，撤吧，师长！”

何尝没有想过要撤？王铭章心中闪过一幕幕往事：川中父老壮行之言，全师官兵铿锵铁誓，以及“友军”的白眼和李宗仁以诚相待的情份……我王铭章是无路可撤了！王铭章没有回答副官，只说了声：“快走！”

第5战区指挥部内，李宗仁眼睛盯着地图，一动不动，参

谋长徐祖贻报告说，增援滕县的部队仍被阻挡在南沙河一带。

李宗仁仍一动不动地盯着地图，一支红蓝铅笔在手中“叭”地折断。好一会，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说：“晚啦！”

17日中午12时15分，王铭章将他今生最后一战中的最后一封电报发给最高统帅蒋介石。

“……独坐山方面，本日已无友军枪声，想系被阻止。目前敌用野炮、飞机从晨至午不断猛击，城墙缺口数处敌步兵屡登城垣屡被击退。忆委座成仁之训及开封面谕嘉奖之词，决以死力拒守，以报国家，以报知遇。”

下午2时30分，日军在飞机掩护下，从东、南两个方向大量突入城内，我军随之与敌展开巷战和肉搏；街道上，屋檐下，到处都是两军的尸体。

王铭章和指挥部的军官，师部特务连一起，来到县城中心十字路口阻击冲过来的日军。此时占领了县城东、北、南的日军一起向城中心压来，王铭章身边不时有人倒下，他带领着仅存的十几人向城西边打边撤，离城门百余米时，突然从城西门楼内射来雨点般的枪弹，原来城西守军已全部阵亡，日军攻上了西城墙。

王铭章和参谋长赵渭滨等十几人同时中弹，血从王铭章额头热辣辣地流淌下来，他的视线顿时变成一片暗红。

王铭章忍着天旋地转的感觉艰难地寻找赵渭滨等人。他看见在五米开外，赵参谋长胸部穿了两个血窟窿，头部被打碎，那顶平时非常整洁的帽子甩得老远。

其他几人也是遍身血污，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正在欲哭无泪，欲动不能时，王铭章看见远远地有几个日军端着枪朝这边走来。

“宁做战死鬼，不当亡国奴！”王铭章想起率兵出川时，他向自己的父老和自己的部队发的誓言。他咬紧牙关，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手枪举起来，朝着自己已经鲜血横流的头部勾动了扳机。

这天深夜，受伤昏迷的王铭章的卫士李少昆被凉风吹醒，他艰难地在尸体堆中找到王铭章的遗体，趁着夜色，背着遗体一点点爬出城外。

第二天，矶谷骑着马巡视满目焦土和余烬的滕县县城。滕县虽被攻克，但对手的坚韧与顽强在他心中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他又一次想起攻城之前那份情报上对这支部队的用语：“杂牌军”。

滕县保卫战为孙连仲第2集团军和汤恩伯第20军团在台儿庄一带集结和布署赢得了宝贵时间，122师以全师覆没的代价顽强坚守了四天，毙敌2000余人，使矶谷师团受到很大损失。

为了表彰国民革命军（川军）第122师在滕县英勇杀敌的光辉事迹，国民政府为该师全体官兵立碑记功，并追授王铭章陆军上将军衔。

王铭章的灵柩经武汉、重庆、成都运回他的家乡四川新都，沿途民众纷纷举行悼念、祭奠活动。在武汉，蒋介石率军委会官员参加悼念仪式。

悼念大厅庄严肃穆，蒋介石和军政委员们神情庄重地在王铭章灵前鞠躬、默哀。蒋介石发表讲话，号召全军将士以王铭章将军为楷模，不惜杀身成仁，坚决抗战到底。

王铭章灵前还摆放着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秦邦宪等人联名献上的挽联，上书：“奋战守孤城，视死如归，是革命

军人本色；决心歼顽敌，以身殉国，为中华民族增光。”

(五)

日军矶谷廉介第10师团在突破滕县之后，迅速向台儿庄压来。奉命防守台儿庄的是孙连仲第2集团军。该军的31师负责庄内防务，31师师长池峰城知道恶战在即，带领队伍开进庄内后便立即组织部队疏散当地百姓，抓紧构筑工事。

一时间，人们扶老携幼，牵牛抱鸡，从大街小巷中涌出城门，涌过运河浮桥，向南逃命。守卫浮桥的士兵们如同凶神恶煞，连推带搡，拳打脚踢，生怕逃难的百姓们把浮桥挤撞坏了——这是由台儿庄南撤的唯一通道。

庄内百姓唯恐逃之不迭，恨爹娘少生三只脚，不到一天庄内便冷冷清清只有军人们在活动了，只有一位90多岁的白发老太死也不肯离开家里的老屋，士兵们劝不动，报告了正巧在这里巡视的池峰城师长。池峰城说，不走也罢，派人每天给送些吃的，听天由命吧！

正说着，副官骑马来报，说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叫他立即去徐州汇报作战准备。池峰城骑上副官的马往师部走时猜测：莫非“老头子”（即蒋介石）来了？

果然，蒋介石率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和军令部次长林蔚来到徐州与李宗仁会商作战事宜。眼下徐州地区集结着10个军30个师16万兵力，矶谷骄横轻狂，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正是打击日寇气焰，振奋国民精神的天赐良机。

军事会议上，李宗仁向蒋介石汇报了他精心策划的作战部署。孙连仲第2集团军摆在台儿庄正面，其中池峰城31师

防守正面阵地；张金照 30 师、黄樵松 27 师分别防守主阵地东、西两侧；汤恩伯 20 军团在敌侧后峰县一带担任策应，力争诱歼谷师团于台儿庄围歼之。

蒋介石对李宗仁的作战方案频频点头赞许，内心深深佩服这个桂系领袖的军事谋略。军事会议之后，蒋介石提出要去台儿庄视察，李宗仁出于安全考虑劝说蒋不要去，但蒋执意要去看，李宗仁无奈，只得做出严密的警卫安排，陪同蒋介石来到徐州西北 60 公里的台儿庄镇。

此时台儿庄正热火朝天地进行作战准备，池峰城领着蒋介石和随行长官们看了几处阵地、工事，蒋介石勉励池峰城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并下令拨给 31 师野炮一营、战防炮一连，铁甲车一列。

蒋介石在视察完毕要上车时，转身对池峰城说：“此战必是极其险恶，镇峨（池峰城的字）兄要多加珍重，再拨给你 10 万银元，做急需时招幕敢死队用，算是我对打赢这一仗的一点心意吧！”

池峰城忙说：“请委座放心，职部一定尽心竭力，万死不辞！”

李宗仁见蒋介石掏了腰包，也当即命军需官给 31 师补充 20 万元作战经费。孙连仲是 31 师顶头上司，看蒋和李给钱，忙陪笑称谢。回过头来板起面孔冷冷地对池峰城说：“我可没钱给你，只有一句话，守不住台儿庄，咱们谁也别想活！”

孙连仲与池峰城过去都在西北军，平日感情甚好，此时池峰城感到真正有份量的只有孙连仲这句话。台儿庄之战关系重大，31 师是被摆在虎口刀尖上了，如果台儿庄失守，我池峰城就是有三条命也难逃军法。想到这里他心中沉甸甸的，

目送蒋介石等人的汽车扯着一道烟尘走远。

3月23日，矶谷接到走在师团前面的濑谷旅团长的电报，他们已在台儿庄北侧泥沟车站与中国军队遭遇。

矶谷毫不感到意外，而是兴奋起来，他早就渴望着一场真正的、极其激烈残酷的战斗。这场战斗终于来临，序幕已经揭开，他铺开地图，亲手将红色箭头画到“台儿庄”三个字上，这时，参谋又递上来一分电报。

这份电报是他军校时的老师、目前是他的顶头上司的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中将打来的。他向矶谷通报了孙连仲、汤恩伯两部的兵力和位置，提醒他注意与板垣师团协调行动，不要孤军冒进。

这份电报仿佛拨动了矶谷内心深处的一根神经，使他陷入苦涩的沉思。汤恩伯装备精良，堪称国军中的精锐，但他最致命的弱点就是打仗畏首畏尾、生怕伤筋动骨，一心保存实力；孙连仲倒是个能打能拼，血本不顾的家伙，可怜却只有装备很差，连枪还摊不上一人一支的三个师。这些情况老师该是知道的呀？我刚刚攻陷滕县，气势正盛，一鼓作气拿下台儿庄本来顺理成章……莫非，莫非连老师也对我攻入徐州，夺三军之冠有所不悦吗？

不知为什么，矶谷想起他在少年时特别喜欢的一支歌：“灿烂的樱花哟，你注定要雕零，雕零和盛开一样哟，你让我深深崇敬……”他低声哼着这支歌曲，一股英雄主义的悲壮情绪在心中升起。

在歌声中，矶谷理清了思路，坚定了必胜的信心，他召集指挥部人员，大声下达作战命令。他要求各旅团按计划果断攻占台儿庄，扫平通往徐州的最后一道屏障。

(六)

3月24日晨，猛烈的爆炸声在台儿庄响起。日军集中所有火炮对我军防御正面阵地狂轰滥炸。濑谷旅团的福荣真平63联队在炮火掩护下率先向台儿庄东北城墙冲了过来。

台儿庄是位于运河北岸开阔地面上的一个千余户人家的镇子，城墙单薄得扛不住重炮轰炸，又没有自然险要可凭藉，日军的飞机和大炮很快就将城墙炸出几个豁口，我军的工事也七零八落地不成体统，31师官兵们只好在废墟中构筑简易工事，抵挡着日军的冲击。

台儿庄之战从一开始就十分激烈、残酷。24日、25日，日军硬是没歇气地连续攻击了两个昼夜。池峰城没合眼地指挥部队一次一次打退日军的集团冲锋，两军都有较大伤亡。

26日清晨，日军退下去休整。战场静了下来，池峰城正要靠在椅子上睡一会，忽听副官报告说，孙总司令到了。

孙连仲将自己的集团军指挥部移到距台儿庄只有5公里的一个小村子里，一则便于指挥，二则为了显示自己与前线士兵们同生共死的气概。

孙连仲对池峰城说：“正面日军兵力已增至4万多，第10师团全数在此，更有坦克、飞机和大炮助战，你的压力不轻哟！”

池峰城对孙连仲私下里以大哥相称，此时他心情沉重地说：“为了打日本，死不足惜，可从大西北把弟兄们带出来不容易，再怎么说也得给这个队伍留下点种子，请大哥手下留情，别到时真的打得精光了。”

孙连仲瞪了池峰城一眼说：“这仗才刚刚开始，难受时候在后头呢！前个月上海、南京失手，军委会处决了41个旅以上军官，韩复榘丢了山东，堂堂战区副司令不也让蒋介石崩了！你我兄弟只有克尽职守，好自为之了。”

池峰城愤愤地说：“我池老三打仗怕不怕死大哥你还不知道吗？还不是为了弟兄们，还不是为了日后咱们还能回到老家去？甭说了，这回我守不住台儿庄就死在台儿庄，请大哥放心！”说完转身上阵地督战去了。

孙连仲虽不计较池峰城这通没轻没重的话，却也心里窝火，正要回指挥所，刚出门便遇上几架日军飞机，日机仿佛早就看准了这里，连扫射带轰炸地俯冲过来，副官忙把孙连仲按倒在院内的一个防空掩体中。

敌机闹了一阵飞走了，孙连仲钻出掩护，抖落着浑身尘土回到刚才走出的那间师指挥所的屋子，抓起电话要到李宗仁那里说：“小鬼子的飞机整天在我头上嗡嗡，请李长官给我想想办法。”

李宗仁说：“我手里一门高炮也没有了，要不我马上请示武汉，给你调上两个团来？”

孙连仲说：“嗨，那还不早就晚三秋了！”听到李宗仁在电话那头沉默，孙连仲又说：“打不了天上的，能不能打地上的，动动飞机场的脑筋？”

经孙连仲提醒，李宗仁眼睛一亮，他立即让参谋长徐祖贻察明配合第10师团的日军空军的机场位置。徐祖贻发密电向武汉情报部门询问，3小时后武汉回电说日军在泰安附近的大汶口设立了一个临时机场。驻有寺包正三少将所率的第1飞行团中的4个飞行大队，负责支援保障台儿庄地区日军

的作战。

李宗仁立即命令就近的孙桐萱第3军团派兵摧毁大汶口日军机场。孙桐萱在12军20师抽调800名精兵组成突袭队，带着烈性炸药，急行军一整夜，接近大汶口机场。

3月27日拂晓，突袭队分为两路，展开了战斗行动。一路是由500人组成的火力队，由机场东侧向守敌发起突然袭击，他们将日军两个小队的营房包围，迫击炮、手榴弹一阵猛炸，接着是十几挺轻机枪封住逃跑的路线逐房清扫。日军岗哨发现来袭为时已傍晚，火力队官兵的动作迅速、勇猛，许多日军还没找到裤子就被打死在屋里。另一部份日军急忙组织抵抗，向我军还击。但仓惶之中情况不明，难以组织有效的防御，双方在微明的天色中混战不休。

第二路是由300人组成的爆炸队，在火力队与日军打响之后，他们乘守卫停机坪的日军的注意力被吸引过去，由机场西侧迅速冲入整整齐齐停着40余架飞机的机场跑道一端，一部分士兵担任掩护，一部分则将炸药逐架飞机地绑好。不一会，爆炸声四起，许多只巨大的火球腾上天空，40余架飞机损伤大半。机场通讯、加油等设备被摧毁，几个日军飞行员气急败坏，挥舞手枪赶来拼命，被我军消灭。

突袭大汶口机场一仗干净利落，战果辉煌，我军仅有极小伤亡。日军空军4个飞机大队中有两个干脆取消了番号，其余的也再无能力在台儿庄战场露面，我军就此除去这个“天灾”。

(七)

31 师与日军激战到第 4 天，台儿庄内的房屋几乎全部被日军炮火夷为平地。3 月 27 日晚，日军步兵以坦克为先导，由庄子西北角被炮弹炸出的缺口内冲入城区。担任该处城防的王冠五团官兵伤亡过半，但仍顽强地一街一屋地抗拒着敌人的攻势。

31 师枪械落后，大部分官兵仍然配备着大刀，在这支部队中大刀被算为正式武器，并被列为军事训练的正式课目。此时许多士兵抡刀冲入敌阵，与鬼子展开白刃格斗，敌人虽源源不断向庄里冲，但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伤亡。战斗就这样一分钟、一小时地艰难持续着。

第 5 战区长官部见敌矶谷师团主力已集中于台儿庄一带，围歼的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电令汤恩伯第 20 军团立即从所在的枣庄以东的兰陵、郭税集之间的傅山口、新兴、峨山地区南下，从北面对台儿庄之敌实施战役合围，与孙连仲第 2 集团军一起，围歼这 4 万日军。

第 20 军团所属的 52 军军长关麟征、85 军军长王仲廉等将军们纷纷向汤恩伯要求出战，痛痛快快地打个胜仗，但汤恩伯担心部队出动之后矶谷突然杀一个回马枪，与临沂附近的板垣师团一起反将他包围，所以不论上边压还是下边挤，就是不下出发命令。

战至 3 月 29 日，台儿庄城内形势对守军越来越严峻。城西王冠五团已所剩无几，池峰城不得已将守在城外的部队调入城中，充实一线阵地，这些部队常常是整营整连地阵亡，用

当时的话说就是“填进去了。”当时在第2集团军参谋处当处长的何章海事后回忆中讲到一件他印象很深的事情，有一天集团军指挥部把第30师的吴明林团调拨给池峰城指挥，该团齐装满员，在天黑时，跑步入城增援，第2天清晨，团长吴明林浑身是血迹和灰尘，带着十几个同样狼狈不堪的官兵退出城来，向孙连仲报告作战之中全团苦战至覆没的经过。孙总司令只能一面安慰嘉奖他们，一面安排他们回后方整补。

3月30日，日军已由城西北角推至城内，攻占了台儿庄二分之一的地方。

矶谷廉介几昼夜没合眼，台儿庄打得虽苦，但毕竟取得了可见的战果，他将占领区域说成四分之三，电告西尾寿造总司令官，第二天日本同盟社发布消息说：“华方最精锐部队已被击溃，皇军第10师团已将台儿庄全部占领。”

中方统帅部对台儿庄战局每两小时发一次战报，蒋介石派白崇禧和林蔚蹲在李宗仁的第5战区长官部督战。

最苦的还算孙连仲，就在台城告危、他手中已无可调之兵时，传来蒋介石直接发给他的急电：

“台战关系至巨，故以第2集团军全力保守，即有一兵一卒亦须努力死拼。如失守，不但该军官兵重惩，李长官、白副总长亦有处分。”

孙连仲深知此战关系重大，但蒋介石频频相逼又让他心中烦恼，正拿着电报发愣，正好池峰城来电话叫苦：“31师快打光了，让我们撤下来喘口气吧！”

孙连仲没好气，立即厉声说道：“士兵打光了军官填，军官打光了你去填，你填过了我就来填，有敢退过运河者，杀无赦！”

这时正蹲在一个团指挥所督战的池峰城已是浑身多处挂彩，他大口咳嗽着，不时吐出一口口鲜血，他知道再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于是横下一条必死的决心。

他铁青着脸又抓起电话机，咬着牙下达了一道命令。命工兵连立即将撤过运河的唯一通道——军用浮桥炸掉。

四个浑黄的巨型水柱同时在浮桥下升起，接着是一声沉闷的爆炸。此刻在台儿庄作战的所有中国士兵都在无数枪炮声中听出了这声爆炸，都情不自禁地朝那个方向望了一眼。

结实宽敞的浮桥倾刻之间化为千万个碎片顺流而下，河面很快就便得空空荡荡。人们心中明白，退路断了，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和鬼子拼到底！

这天午夜，池峰城清点各部人数，31师伤亡十分之八，建制全乱了，士兵们只能从服装和眼神中辨认哪是自己人。池峰城望着一个个满身伤痕和尘土的士兵，士兵们也望着他们浑身是伤的师长。

池峰城用嘶哑的声音说：“小鬼子在电台里广播，说台儿庄在中国人都死光了，咱们得让狗娘养的们看看，台儿庄的中国人没死光，我现在成立敢死队，有种的，跟上我把丢了的阵地夺回来！”

士兵们由衷敬佩这位与他们一同出生入死的师长，此时纷纷举手，乱哄哄地叫喊“我去”，“我去！”，“算我一个！”不少担架兵、炊事员也报名加入。

池峰城见士兵们在这么惨烈的关头还这样拥戴他，十分感动，他亲自挑选出二百多名精壮的汉子，每人一刀一枪，一捆手榴弹，收拾好了，他命人将两筐白花花的银元抬了出来。

“这是上峰让我在要紧时候召募敢死队用的，这会咱们平

分了它，是死是活，这钱一定会捎到各位家里，给爹娘，给妻儿留个想头吧！”人们见此，都默不作声。“师座——大哥！”一个老兵在队列中说话了，“咱是为了杀鬼子，不当亡国奴，不是为了钱，命都不要了，还要钱干什么？”

“我们不要钱，”“师座下命令吧！”其他敢死队员们也跟着说。

“好！”池峰城将手枪一举，“分成两路，一路城西，一路城北，哪有鬼子，就往哪里杀！”

经过连日苦战，日军也十分疲惫，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到了这种地步，城中守军还能组织起这么强有力的夜袭。

敢死队迅速摸到敌人在城中的临时营地，接着便是爆炸隆隆，杀声冲天。日军从昏睡中惊醒，昏头转向，仓促迎战，陷于一片混乱，敢死队员勇猛地近战肉搏，抡起大刀冲入敌群，猛砍猛杀，所到之处，日军魂飞魄散，不敢抵挡，在混战之中死伤无计。

从午夜到天明，两支敢死队竟然消灭了数百名日军，夺回了城西、城北的大部分阵地，将多数日军赶出了城。

李宗仁和孙连仲连称 31 师创造了“奇迹”。

(八)

3月31日，汤恩伯20军在蒋介石、李宗仁严令之下，向台儿庄之敌背后包抄过来，这个军团装备精良，机械连程度很高，大部分部队是以车代步，行动十分迅速。

走在20军团前面的是该军团的主力第52军。军长关麟征早就憋着劲要与鬼子大战一场，此时他率部以隐蔽的动作

向枣庄以东勃鸽窝、郭里集疾进。

25 师的 75 旅是 52 军的先头部队，他们以急行军速度最先到达郭里集。进村后天已经黑下来，为第二天起早赶路，他们赶忙安排食宿，很快便睡下了。

第二天天还没放亮时，75 旅的一个伙夫提桶打水，见井台已有一个士兵打水，他随便打了声招呼，那人也心不在焉地回了句什么，伙夫摇辘轳打水时，那人一边就着木桶洗脸，一边哼着一支奇怪的小调。伙夫听着不对味，便大声问了句：“这位兄弟，哪部分的？”

那人不哼了，凑上脸来看，这时天又亮了些，伙夫见那人身子和脸长得没有什么特别，往下来，裤子和鞋子都是日本兵的，不好！两人同时惊叫一声，扔下水桶各自逃跑，伙夫边跑边嚷“有鬼子，鬼子来了！”75 旅官兵们正在起床，听见叫声忙抓枪跑出来问，鬼子在哪？

天又亮了些，人们看见村西头有座三层高的炮楼。这时村长跑来说：“那个炮楼有日子没有住鬼子了，天知道怎么昨天半夜来了一伙？”

好玄！和鬼子在一个村住了一夜还不知道！75 旅立即展开兵力包围了炮楼。这时炮楼上的日军用机枪向下扫射，官兵们正要攻打炮楼，旅长一摆手说：“不用了。”

原来军长关麟征带着军指挥部走到离这里不远的武家窝铺，尖兵听见枪声立即报告了军指挥部。关麟征用电台与 75 旅长沟通联络，问清了情况后，指示就近调两门火炮一轰了事。

两门山炮上午 9 时才调过来，因为距离太近，炮手采取直瞄射击，没几炮就把炮楼炸塌了。50 余名鬼子冲出来突围，

很快被消灭了大半。

因关军长下令捉几个活的问问情况，剩下的十几个日军没敢用枪打，但日军身体素质比我军好，跑得飞快，只抓住一个负伤的中士，经审讯得知是佐佐木第30旅团增援台儿庄的一个小队。

就在汤军团快速向矶谷背后运动时，台儿庄内的战斗已经进行到白热化程度。

庄外东侧黄林庄一带的27师与矶谷师团的预备队赤柴八重藏的步兵第10联队残酷战斗，该师伤亡大半，一部分官兵军心动摇，师长黄樵松带领执法队赶赴阵地前沿，亲手将擅自退却的营长张某就地问斩。

台儿庄城内，池峰城31师只剩不足千人，且大半都是伤员，日军又以重兵冲入庄内，所攻占的地方达到全庄的四分之三，31师被死死压在庄子西南角上。

孙连仲虽久经沙场，但如此残酷激烈的战斗也不多见，此时他也有些沉不住气，打电话给李宗仁说：再打下去，31师死光事小，阵地失守事大，请求李派部队将31师换下来。

李宗仁从内心十分敬佩孙连仲，此次孙将军团指挥所设置在离主战场仅5里的地方，大大超出了军委会对集团军指挥所需设置在距离至战场40华里处的规定，他知道孙连仲这是在表示一种决心，即与部队一起死守，不成功则成仁。但此时李宗仁极其严厉地对孙连仲说，汤军团明天中午定可赶到，敌我在台儿庄已经血战一周，胜负取决于最后的坚持。第二集团军血已经流了，决不能功亏一篑，半途而废。

李宗仁接着说：“现在根本无兵可调，你快将所有能战斗的人组织起来，投入前线。我决定亲自到台儿庄督战，务必

要坚持到明天中午，如违命令，当以军法从事！”

孙连仲说：“李长官有此决心，我孙某坚决服从命令，直到第二集团军全部打光！”说完将电话一扔，冒着纷纷炮火，带着几名指挥部人员进台儿庄督战去了。

在日军凶猛的火力和疯狂的进攻面前，台儿庄城内局势越来越危急，城外左右两翼 27 师和 30 师也在做最后死拼，双方仿佛都被对手扼住了喉咙，在焦急地挣扎，我军部队官兵大部分都没见过这种血流成河、尸横累累的惨象，有的实在坚持不住了，偷偷跳入运河，朝着对岸游去。

就在他们游到河心时，对岸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站起身来，河中士兵仍向前游时，枪声响了，子弹在河面上溅起老高的水花，几名渡河的士兵应声沉入水中。其他渡河者见状绝望地哭喊，拼命往回游，“执法队！执法队！”“别开枪，我们回去！”哭喊声凄惨至极。

此刻，矶谷廉介也陷在极度苦恼之中，正面的台儿庄弹丸之地，填进这么多部队竟然就是攻不下来，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他真想亲自进庄看看，他的对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在他背后，汤恩伯军团又悄悄包了过来，他深深感到一种致命的威胁。

矶谷想起被自己甩在后面的板垣师团，他忙让参谋长联系第 5 师团，请求他们向台儿庄靠拢，阻击汤军团合围。不一会，正如矶谷预感到的那样，板垣师团参谋长回电说，他们现在仍被阻于临沂城附近，自顾不暇，无法腾出手来解第 10 师团之围。

矶谷这时才想起他的老师西尾寿造对他孤军冒进的提醒，他突然发现自己象一个傻瓜一样一步一步走到别人设好

的陷井之内，而且每一步都是自己非要走不可的，这就使得愚蠢变得更加可笑。

“莫非，真的到了象樱花凋谢那样为天皇尽忠的时刻吗？不！我决不能失败，我要在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想到这里，他嗖地抽出战刀，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线走去。

4月4日零点，又一支敢死队由孙连仲、池峰城组织起来，这支队伍中有军官、伤兵、挑夫、伙夫、军医、民工，甚至还有几个刚刚被放出一个秘密关押犯人的监狱的囚犯。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孙连仲仍不失自己总司令的威严，他让敢死队列队站齐，自己登上一个高台，象对千军万马似地训起话来。

“今夜，是我们和这座城最后的生死关头了，我们要大力袭扰鬼子，不让他们睡觉，不让他们拂晓进攻，不让他们有一分钟的安生！”

这支300余人的队伍出发了。十几分钟后，城内处处响起爆炸声，喊杀声。当太阳露出来东方地平线的时候，朝霞将台儿庄染得血一般鲜红。

(九)

4月4日震。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战室。

蒋介石彻夜未眠，他望着参谋人员不断地在和一面墙一样大的一张地图上移动着、标绘着各种颜色的箭头、标志、符号，不时看一看另一面墙上的一架大钟。

侍从端来早餐，他挥了一下手表示拿开。当时针指到8点时，他起身向参谋总长何应钦下达指令，这同时也是给李宗

仁的电文。

“围歼敌第 10 师团时机业已成熟。着令第 5 战区全体参战官兵，务于 4 月 10 日前消灭台儿庄之敌。对首先消灭敌人之部队，赏洋 10 万。”

蒋介石向门口走了几步又转身，“出力将士从优叙奖，如限期内仍不能消灭该敌，师长以上各级指挥官一律以军法从事！”

说完，蒋介石径直去卧室睡觉。

徐州。第 5 战区长官部。

李宗仁接到蒋介石电报后立即口述一份电报稿：“委座严令谅已奉悉，本长官亦对首先立功之部队加赏 10 万元。望各努力，勿干法纪。”

此时全国各战区首脑都接到蒋介石给第 5 战区电报复本，因汤恩伯 20 军团和孙连仲第 2 集团军原属第 1 战区序列，此时第 1 战区长官程潜格外兴奋，也给台儿庄作战各部队发来电报。

“本长官即刻前往徐州，协助指挥，委座及李长官悬赏首先灭敌之部，本长官亦加赏 10 万元。”

中国军队将在台儿庄围歼日军第 10 师团的消息传出，各国记者终日围在军委会新闻处等着抢新闻，一些有门路的记者则捷足先登，赶往前线做战地报道。

4 月 4 日傍晚，美、苏、英、法等国记者由大公报特派员范长江和新华日报特派员陆治陪同，从武汉乘火车赶到徐州。兴冲冲来到第 5 战区指挥部时，官员们告诉他们，李宗仁正在台儿庄前线指挥作战，战况无可奉告。记者们七嘴八舌要求到台儿庄，被官员们谢绝后大为不满。

4月4日一整天中，日中两国土兵在台儿庄一带的搏斗可以同时使用“垂死挣扎”一词。日军向来自视天下无敌，尤其是其“武士道”精神举世无双，此次战斗中却也深为我军不怕牺牲的精神所感动。日军第10联队与防守台儿庄右翼的黄樵松27师血战数日，4月5日，在这个联队的“战斗详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这段记载在几十年之后仍原原本本地出现在中国和日本关于这场战斗的历史资料中。

“敌军27师的第80旅，数日以来，其战斗精神，其决死勇战的气概，无愧于蒋介石对他们的极大信任。他们凭借着散兵壕，全部顽强抵抗直至最后。该敌在狭窄的散兵坑内，重叠相枕，力战而死之状，虽是敌人，观其壮烈之态，亦为之感叹。战斗中曾使翻译劝其投降，但无一应者。”

敢于战至尸山血海，此种精神并非独为皇军所特有，为皇军计，对此应有所警惕！……”

4月6日清晨6时，李宗仁命令汤恩伯第20军团和孙连仲第2集团军向日军发起全面进攻。

日军经过十余天连续苦战，早已人困马乏，在我军夹击之下，立时混乱不堪。担任主攻的濑谷旅团首先受到汤军团从背后狠狠打击，濑谷下令收缩阵地，集结兵力，迅速撤出战斗。

矶谷廉介得知后勃然大怒，他在电话中严厉训斥濑谷，命令他立即停止撤退，转取攻势，占领台儿庄，据守待援。濑谷一反对矶谷唯命是从的常态，大骂矶谷是混蛋长官，拼死命攻了那么多年没攻下来，这回人家援军来了，前后包围，眼看被歼灭了，还说什么攻占台儿庄？！

濑谷不顾日军军纪森严，于晚8时向峰县方向逃跑，数

千日军刚刚撤离台儿庄战场，就遭到汤军团 6 万兵力的迎头截杀。

自“7·7事变”，日军在中国长驱直入，所向无敌，即使遇到零星抵抗或如淞沪会战那样的大规模正面战斗，最后也还是以胜利告终。4月6日，日军整整一个师团兵败台儿庄，中国军民首次目睹了所谓“不可战胜的大日本皇军”被战胜时，触目惊心的败退惨象。

日军将来不及带走的整车整车的粮食、被服毫不犹豫地纵火焚烧，将因没有汽油开不走的汽车和汽车拖载的火炮，连同弹药全部炸毁。

日军士兵们发狂般搜寻自己同胞的尸体，将尸体堆成一堆一堆地点火焚烧，将骨灰装在尸袋里带走。

日军的两个骑兵大队将数百匹令中国农民们叫绝的纯种东洋大马圈在城北阔地中用数挺机枪射杀，当这些高大、漂亮的战马倒地之后，骑手们扔下枪，上前抱住死的或将死的马大哭一场，然后徒步逃走。为什么要杀掉这些马？为什么不骑马逃走？当地百姓们百思不得其解，至今说起来仍是一个谜。

台儿庄内，进行着肃清残敌的最后战斗。一部分来不及撤退的日军被池峰城 31 师的官兵死死封在庄内，我军官兵胜利在望，精神抖擞，敌军拼命向外突围，格外疯狂。在庄东北角，200 多日军突围无望，枪弹打光，竟集体自焚，为日军在台儿庄的失败画了一个句号。

矶谷绝望了。失败仿佛来得那么突然，那么意外。这是他的军人生涯中最惨重的失败，而且他清楚这也是“7·7事变”以来，日军在中国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

他一边组织着溃散的部队。一边思考着自己的去处，为帝国造成如此巨大的军事失败和政治损失，显然，最好的结局就是剖腹自杀以谢罪于天皇。

正在苦思冥想，参谋递上一份电报，矶谷无心去看，说了声：“念”。

参谋念道：“令第10师团进入峰县，准备接受新任务。第2军司令官西尾寿造..”

矶谷听后，眼中立即盈满泪水，又是他的老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使他体面地退出战场。

但是，老师所一直教诲的帝国军人比生命还要珍贵的荣誉感和耻辱心呢？纵然你能救学生于一死，可又怎能解脱学生良心的不安，和长久的自责呢？

兵败如山倒。矶谷师团4万之众，台儿庄一战，亡11984人，伤15000余人，损失坦克30余辆，汽车100余台，被缴获的大炮、机枪、弹药及军需物资不计其数。

4月7日清晨，台儿庄内肃清残敌战斗结束后，李宗仁下令汤恩伯20军团向北追击敌军。

矶谷带着不足万人的残部，被汤军团紧紧咬住追杀了两个昼夜，逃至峰县县城闭门不出。至此，台儿庄之战宣告胜利结束。

(十)

捷报传出，举国上下一片沸腾。自“7·7事变”，特别是京沪沦陷之后，压在人们心头的一口闷气此刻一吐而光，“皇军”并非不可战胜，中国不会灭亡！全国人民对抗战胜利更

加充满了信心。

大公报特派员范长江首先抢发了台儿庄大捷的消息。在全国各大城市，人们涌向街头抢着购买报童们手中的“号外”，大家奔走相告，鸣放鞭炮，互相祝贺。

4月7日，即台儿庄胜利当天晚上，武汉市举行了有10余万人参加的火炬大游行。人们载歌载舞，欢欣若狂。

参加台儿庄会战的部队来自全国各地，有中央军、西北军、桂军、川军、山东军等等，这些部队曾在内战中互相厮杀，而此时却密切配合，浴血奋战，显示了中华民族内在的凝聚力。

满目焦土的台儿庄变得圣地一般，接待着川流不息的参观者、采访者。各界要员、名流纷纷来此慰问胜利之师，悼念阵亡将士，一时间热闹非凡。

采访者必见的人物之一是一位九旬老太。战前疏散时，她说什么也不愿离开自己住了一辈子的老屋，守军无奈，每日供给饮食，好生照顾，她的老屋在敌人炮火中坍塌，士兵们将她救起，安在一个地窑内。

在十余天的激战之中，照料她的士兵们先后伤亡，她却幸存下来。战后，她逢人便唠唠叨叨地讲述日军的罪行和她在大战中的见闻。

4月9日，蒋介石在中央广播电台向国人和世界宣布：

“我军在台儿庄轻取日军精锐主力。我军士气益振，乘胜进击，将敌一举聚歼，遂造成空前未有之大捷。是役，敌第5、第10师团为我军摧毁，敌死伤三万余众，我缴获步枪万余枝，轻重机枪九百三十一挺，步兵炮七十七门，坦克四十辆，大炮五十余门，俘敌无数……

在陕北的延安，共产党人也在欢呼这一伟大的胜利。毛泽东以喜悦和振奋的心情发表演说：

“国共两党兄弟和军队，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象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

尾 声

几天后，参加台儿庄会战部队的军官在徐州隆重祝捷，会后欢宴。

宴会大厅内时时传出阵阵鼓掌、欢笑和杯觥交错之声。一位军官独自从宴会大厅内走了出来。

大厅门口，两名士兵互相交换了一个敬佩的眼神，极认真地向他致以军礼，他挥挥手算是还礼。

他沿着长官部一侧的大操场慢慢地走了一会，停住脚步，沉思起来。不知过了多久，他听见身后有人喊了声“大哥”。

那人回身一看，原来是刚刚宣布晋升为中将的31师师长池峰城。池峰城望着面前情同兄长的上级孙连仲，二人相对无言。

两人并肩缓缓散步，默默无语。台儿庄一战，胜利固然可喜，但我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孙连仲第2集团军3个师战前齐装满员，战中伤亡数平均在十分之七，31师几乎全军覆没，整个台儿庄之战，我军伤亡数达35000多人。

台儿庄之战狠狠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不可能改变侵略者嗜血的本性。祝捷大会之前，蒋介石召见五战区高级军官，通报了日军华北、华中方面军将以10个师团兵力，分

兵 6 路合围徐州，妄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意图。

一场新的大战迫在眉睫！

抗日战争刚刚开始，今后的路还很长，大战、恶战还会很多，生为这个时代的军人，他们别无选择……

四、武汉大会战： 20万倭寇成新鬼



1938年5月，举世瞩目的中华民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进入到一个转折关头。

中国方面，我军在台儿庄地区取得的军事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将一直徘徊在国民心中的悲观主义情绪一扫而光，一个更加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逐渐发展壮大，中国军民已经做好了抗战到底的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日本方面，虽然以“7·7事变”为标志的全面侵华战争还不到一年，但日本内阁已经开始感觉到征服中国的困难，日本在短短时间内在华投入大量兵力和物资，也取得了一些军事上的胜利，占领了许多地盘，但伴随而来的内部危机也逐渐显露出来。一是随着占领区的扩大，兵力逐渐分散，战线不断拉长，兵员和作战物资的供应越来越艰难，二是从1938年初，日本国内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侵华战争巨大耗费的直接后果，狂热的军国主义情绪不能代替铁一般的经济规律，经济危机导致财政危机，导致社会问题不断增加，天皇裕仁责令内阁尽快拿出办法，消灭中国军队主力，迫使中国政府投降，以及早结束战争。

天皇提议成立了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和海相组成的“五相会议”，做为专门负责对华战争的核心机构。“五相会议”在成立之后便连续召开会议，通过对中日两国国情，军情的研究分析，决定集中日本的军力，攻克中国的心脏城市——武汉。

武汉地处我国腹地，是平汉、粤汉两大铁路的衔接点，又是东西南北水陆交通的中心枢纽，地理位置可谓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由于这个城市集中着中国政府的全部办公机构和军事指挥机构，武汉三镇同时又是我国军事工业的基地，因

此日本内阁认为，攻占武汉是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控制全中国的关键。

“五相会议”的决策很快便得到天皇的批准。6月5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武汉的作战命令：

“华北方面军在追击从徐州突围的中国军队途中向武汉转进；华中派遣军沿长江和淮河自东向西推进；两个方面军合兵会战武汉。”

(一)

为使读者对台儿庄大捷结束，至武汉会战开始这个阶段中日两军情况有所了解，我们不妨先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4月7日的台儿庄大捷举世震惊，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重创（也有人说是“歼灭”）日军第10师团。身兼日本大本营陆海空军大元帅的天皇气急败坏，不顾幕僚们的劝说，改变了在1938年年内不再发起新的进攻的决定，命令向中国大规模增派兵力，寻机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以挽回失去的面子。

台儿庄之战结束后，日军情报部门发现在徐州地区集结着中国军队大量精锐部队。包括前期参加台儿庄会战的和战斗过程中陆续调来的。日军情报部门的分析和判断相当准确，我军数量为50个师，60余万人。

日军大本营立刻向天皇申请，发动徐州会战，以优势兵力围歼该地区之中国军队主力，雪台儿庄兵败之耻。

此时正当我国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大张旗鼓地宣扬我军在台儿庄的胜利和小日本的可耻失败。闹得国际国内纷纷扬扬，天皇正为此大伤脑筋，见大本营的请示，当即批复：“围

歼徐州地区中国军队。”

4月中旬，日军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集结十几个师团，30多兵力，配以飞机300余架，采取南北对进的战术，分6路向徐州包围过来。

我军起初还没有察觉日军总的意图，各部队分头抗击自南面和北面而来的日军，直到5月上旬，各部队不断传来与日军激烈战斗，伤亡不断增加的报告，我情报部门将日军十余个师团对徐州形成大包围的态势清清楚楚地标在地图上。我军最高统帅部才猛然感到问题的极端严重性。

蒋介石与参谋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商议，再死守徐州已无意义，也不现实，应赶紧突围出去，再做打算。

蒋介石定下撤离徐州的决心后，立刻发急电给第5战区长官李宗仁，令其组织突围。

李宗仁不愧为杰出的军事人才，在日军铁桶一般团团包围的徐州地区，将数十万部队分为五路，逐一在敌人包围圈的缝隙间迅速通过，至5月下旬，5路大军全部安全撤至安徽、河南。

担任掩护的刘汝明第68军，在完成任务之后，放弃徐州城，化整为零地钻出重围，在安徽萧县集结。

5月底，各路日军经过一个多月的外围作战，付出伤亡3万余众的惨重代价，隆重开进了空无一人的徐州城。

连由东京赶来指导作战的大本营官员们也在公开场合赞叹中国军队撤得漂亮。

6月初，日军大本营进攻武汉的战争略意图明确下来，南北两路日军对中国军队的追击与作战均成为武汉会战的组成部份，一场新的大战逐渐拉开了帷幕。

(二)

武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蒋介石站在军用地图前沉思。南北两支日军如一把巨大的钳子，向武汉狠狠夹来，南路的华中方面军沿长江水路发动强大攻势，北路的华北派遣军则克兰封，破开封，直逼郑州，来势甚为凶猛。

我军主力刚刚经过徐州突围，正是人困马乏，需要休整补充，而日军则大部份是以机械化行军，以逸待劳，最重要的是我军没有经过周密的布署配置，仓促应战则必败无疑。军情如火，事关重大，蒋介石心中忧虑不安。

这时秘书送来第1战区的急电，北路日军14、16师团已至郑州城下。蒋介石心中一惊，如郑州失守，日军顺平汉路南下，不用几天便到武汉了。

草草用过午餐，蒋介石召集了一个小范围的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有人重提一个月前说过的一个阻敌之计。在座的人立刻沉默下来。蒋介石离开坐位走来走去，内心反复权衡着利弊得失。

4月下旬，日军第2军的几股部队推进到黄河北岸，与我第1战区部队隔河相望。国民党元老之一的陈果夫视察这里后回到武汉，向蒋介石呈上一个报告，主张在河南武陟县掘开黄河北大堤，放黄河水淹毙北岸日军。陈果夫认为：自古以来黄河水凶险莫测，对于南岸的中国军队和北岸的日军都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日军首先炸开南大堤，则我军将受水淹，既然如此，还不如趁日军未动手时决堤放水，这样既可解南

岸之忧，又可淹敌，阻敌于河南。

蒋介石当时的犹豫在于，决堤放水在军事上固然可以占些便宜，但放水淹敌的同时必然会累及泛区百姓，一个意义并不十分重大的军事行为可能造成一起写于史书的殃民大罪流传千古，这可就太不合算了！于是当时他把陈果夫的报告转批给第1战区长官程潜，而程潜同样不愿承担这千秋是非，这个建议便搁置下来。

而现在，日军的凌利攻势已不给蒋介石任何思考犹豫的时间，又有一些高级官员向蒋吹风，主张放水阻敌，眼见日军部队快速向南推进，保卫武汉又需要时间来布署兵力，蒋介石将心一横，把中国丢给日本鬼子才是天下第一大罪，其他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6月3日，蒋介石叫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密电第1战区长官部：立即决堤放水。

程潜得到蒋介石明确指示，立刻召集黄河水利专家和军政人员研究决口的地点。他们最初将决口处定在中牟县的赵口，派53军的一个团挖了一个昼夜，但因土质问题，没有决开。

6月6日，重新选择地方，以两团兵力，连挖带炸又是一个昼夜，仍没有成功。

蒋介石和程潜听说决堤未成，十分焦急，因为此时日军第2军各部已得知中国军队可能决堤，正拼命向西赶，已到达开封至兰封之间，妄图迅速跃过黄河，使决堤失去意义。

6月7日，程潜亲自点了一员大将，即新编第8师师长蒋在珍，嘱他务必尽快完成决堤任务。蒋在珍精明强干，即使到了如此分秒必争的关头，仍亲率参谋人员沿河实地勘察，最

后将决堤地点选在郑州以东不远处的花园口。

蒋师长认为，在此地决口，可以使得黄河水向东南而行，经中牟、尉氏、扶沟、西华、周家口各县而入淮河，即可达到阻敌南进之目的，又将黄河水祸的损失减到相对最轻。

蒋在珍的方案得到统帅部和有关水利专家的认可。8日起，蒋在珍亲率两个团，在花园口大堤开挖出一段宽50米的豁口。

1938年6月9日上午9时，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黄河水先是缓慢，继而急剧，最后则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出河床，在宽阔的地面上奔腾咆哮。

用当地百姓的话说就是决堤放水触怒了天庭，恰好从9日晚上起，天降狂风暴雨，倾盆大雨连降一昼夜，黄河水面陡涨，水势越发汹猛。

常言道：“洪水猛兽”。决堤的黄河远远胜过千万只虎豹豺狼，高达三、四丈的水头铺天盖地，遇村村毁，见人人亡。豫东至皖北的44个县市，5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时成为一片汪洋。泛区百姓死伤者，无家可归者无计其数。

黄河决口在付出我民众惨重代价的同时，也达到了阻敌南犯的预期目的。推进至开封以南的日军第2军各部在涛涛黄水前望“洋”兴叹，再无法前进半步。

几支走在前面的日军部队被黄水围困，汽车、火炮、战车沉于水中无数。数百名日军被波涛卷走淹死，上万名日军数日之中整天泡在水里，靠飞机空投食品度日，日军调来大批工兵以舟艇援救被困的部队。

4月份就赶到河南的北路日军14、16师团各一部共4000余人被困在中牟、朱仙镇、尉氏一带的滔滔黄水之中，程潜

下令该战区张自忠 59 军和刘和鼎 39 军果断出击，激战两日，这股日军大部被歼灭。

北路日军的最高长官，第 2 军司令稔彦亲王亲自指挥空中、水面部队抢救被淹日军，他在给大本营的电报中惊呼：“华军使用水淹战术，将致我军于死地矣。”

黄河水在郑州至蚌埠之间一千多公里的地段上形成了巨大地障。北路日军南下包围武汉的计划彻底破产，不得不回过头来，沿黄泛区东北艰难绕行，向合肥地区集结，这些日军直到 8 月底才开始进攻信阳，重新加入到攻占武汉的作战之中。

由于黄河决堤形成的新的军事态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改变计划，将进攻武汉作战由北路地面作战为主，改为以南路沿长江水路进攻为主，南北两路合兵会攻武汉的时间推迟了近 3 个月。

花园口决堤，阻敌与淹民的千秋是非功过，几十年来为史学家、政治家们争执不休，也许只有历史才能做出最终的评判。

(三)

黄河决堤为武昌军委会调整兵力布署赢得了时间。6 月 14 日，蒋介石下令组编第 9 战区，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兼任武汉卫戍司令。6 月 20 日，军委会制定了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

中国军队主力沿长江分为江南和江北两大战场，在武汉外围，利用鄱阳湖、大别山有利地势和长江两岸丘陵湖沼迟

滞日军进攻势头，消耗敌人有生力量。

我军的兵力布署是：李宗仁第5战区辖孙连仲3兵团和李品仙4兵团，担任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一线防御；陈诚9战区辖薛岳1兵团和张发奎2兵团，负责长江以南南昌至九江防御。

几乎是与国民政府布署保卫武汉同时，日军大本营于6月18日下达了进攻武汉的作战序列：由华中派遣军司令畠俊六大将为最高指挥官，统一指挥稔彦亲王的第2军，冈村宁次的第11军及直辖兵团、航空兵团。

稔彦第2军辖4个师团，由合肥经六安、霍山向大别山推进，直趋信阳，切断平汉铁路，迂回武汉之北；冈村第11军辖5个师团和波田支队，沿长江河道及两岸从南面进攻武汉。

武汉会战是自“7·7事变”以来，中日两国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规模最大的一战。日本调集了其总兵力的五分之四，12个师团、120多艘舰艇，500多架飞机，会战初期时兵力便达35万。

中国军队则更是将几乎所有主力部队调往战场，动员布署了14个集团军共110个师、全部作战飞机225架，及仅存的34艘海军舰艇，投入初期作战兵力已达60多万。

中日两大民族仿佛要就此决出个你死我活，双方都豁出去了！

布署就绪之后，蒋介石下令，驻武汉的各级机关、团体、重要的工厂、学校一律撤退到四川、甘肃、陕西、湖南等后方省区。

蒋介石率领军委会留在武汉，指挥保卫武汉的大战，及

全国的抗日战争。

6月12日，南路日军的波田支队进攻安庆，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几天之后，蒋介石通过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和世界发表了一份措辞庄严而又沉重的声明：

“中国人民和政府已被日本侵略者欺侮压迫到了最后限度，中国军队为了民族之生存，决心在武汉地区与日军决一死战！……”

在这个声明之中，人们听出国民政府和所有中国人民誓死抗战的决心。全国各地的民众纷纷声援武汉会战，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声援示威和为前线募捐活动，许多海外侨胞汇来巨额款项，资助抗日。武汉军民此时更是处于激情的旋涡之中，城区内到处可见“保卫大武汉”的巨幅标语，到处是同仇敌忾的情景。

(四)

6月12日。潢川第5战区长官部。

李宗仁已是2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紧张地指挥着防守长江重镇安庆的作战。

日军波田支队冒着大雨乘军舰溯长江而上，在安庆下游20公里处登陆，正在与守卫在那里的徐源泉²⁶、杨森²⁷两个集团军激烈战斗。

波田支队擅长丛林和水网地带作战，此次担任南路日军的先锋，队长波田可称智勇双全，就在守军眼看就要将日军压下去时，突然阵地背后枪声大作，原来波田使用两面夹击的战术，与先期从合肥方向赶来的日军第6师团沟通联络，从

陆路包抄沿江守军部队。

安庆不但是江防要地，而且还是当时的安徽省的省会，所以以两个集团军重兵守卫，但守军在敌两面攻击之下乱了阵角。12日晚，日军突破防线，占领了市郊的安庆机场。

李宗仁命令杨森组织反击，务必夺回机场。是夜，两军冒雨激战，李宗仁守在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待消息。

13日早7时，杨森电告李宗仁，日军已攻占安庆全城。一夜激战没有消息，李宗仁没想到机场没夺回，连老窝也丢了，不由急火攻心，右颊上22年前讨伐军阀龙济光时受的枪伤突然发作，致使右脸肿胀，右眼失明。

医生劝李宗仁下去治疗，李哪里肯听，争执一番后，还是在协助指挥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劝说下，李宗仁才同意治疗。

军委会将李安排到武昌东湖疗养院，该院长是个美国的外科医生，他亲自为李宗仁主刀手术，从伤口处取出一撮黑色碎骨，肿痛和失明的症状随之消失。

日军攻战安庆之后继续沿江而上，6月24日攻战了香口，25日包围了我军费了很大力气筑起来的马垱要塞。

马垱位于安庆上游一百多里，在江西省彭泽县境内，这里江面狭窄，宽度不足一里，水深流急，加之以大型铁锚、巨石和水雷设障，两岸山峰险要处设置碉堡和炮台，使这里不亚于天险。6月中旬，白崇禧副总长曾来此视察，指示要严密防守，不得有失，16军军长李韫珩答道：“白副总长放心，我军将誓死守卫马垱”！

但这个16军的李军长却是一个典型的糊涂官。他自恃要塞地势险要，防守严密，不把日军放在心上，没有落实白崇

禧“派重兵把守马垱”的指示，只是将几支属于不同建制的小部队共 500 人摆在要塞，由此埋下要塞失守的祸根。

香口失守后，被日军打散的守军跑到马垱报信，但当天马垱的排以上军官都不知上哪里去开什么“结业典礼”大会了。当日军悄悄包围了要塞，突然发起攻击时，军长李韫珩如大梦初醒，手忙脚乱地组织对马垱的增援。

白崇禧得知马垱告危十分气恼，他强压怒火，命令薛蔚英 167 师火速增援马垱。命令下达之后，师长薛蔚英却因害怕与日军遭遇而不敢走大道，率领部队在山间小路中绕来绕去，致使贻误了增援的时机。

而此时在马垱的 500 名士兵们却是一派誓死退敌的英雄气概。他们自动组织起来，临时编成一个营，在总队长鲍长义带领下，分兵把口，与攻上来的日军展开激烈战斗。官兵们倚借地形优势，打退日军一次次猛烈进攻。而日军志在必得，不断增派兵力，加强攻势。激战中，日军尸体成片横于山坡上，而我军也一批批死于战壕之中。

经过一昼夜恶战，500 名中国守军全部阵亡，日军于 26 日清晨占领了马垱要塞。

马垱之战中，爱国官兵决死杀敌的英雄气概和昏庸军官的迂腐无能形成鲜明比照，留给人们千古的慨叹和深思。

日军屡次成功运用水陆配合、两面夹击的战术，6月 29 日攻克彭泽，7月 4 日又占领了湖口，步步逼近通向武汉的江上门户——九江。

沿江守军连失要地，蒋介石大为恼怒，他责成兼任江西省主席的第 3 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追究江防失守的责任。几天后，顾祝同将马垱要塞失守的原因及责任电报蒋介

石，指出，16军军长李韫珩、167师师长薛蔚英在战中严重失职，罪不容赦。

蒋介石看完报告之后，挥笔批示：“如拟。应将李韫珩拿办，交军法执行总监审判。”

随之进行的军法会审的结果是：李韫珩被撤职，薛蔚英被处死刑。

军法会审结果通报全军，参加武汉作战部队官兵无不震惊。

(五)

7月14日，中共派往国民政府任军委会政府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将军来到蒋介石办公室。通报之后，蒋介石立刻会见了周恩来。

武汉会战时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最好阶段，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高级领导人在国民政府内任职，共谋抗日大计。蒋介石与周恩来曾在黄埔、北伐时期合作，又因西安事变中周恩来代表中共促成和平解决时显示出过人的才华，蒋介石认为周是位可当国家栋梁的人才，因而非常敬重他。

周恩来此次来见蒋介石，诚恳地说了自己对保卫武汉作战的意见。他认为这种硬拼兵力的战法是十分危险的，他在谈话中引用了历史上明朝覆亡在军事上的教训，就是节节抵抗，节节败退，最后是军队打光，政权灭亡。

周恩来说：日军要速战速决，我则应立足持久；敌人要占领武汉，我则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他具体建议，目

前兵力的各三分之一，与日军对峙、转入敌后和撤到后方，并且不排除在必要时放弃武汉。

周恩来的谈话于坦诚中显出精辟，许多话，如对于目前兵力的布署与持久作战的矛盾等，说中了蒋介石内心深处的忧虑。蒋介石当即表示要立即考虑他的意见。

送周恩来出门时，蒋紧握周的手欢迎他常来谈谈，周微笑者点点头。

送走周恩来，陪在一旁一直没有说话的蒋夫人宋美龄开口说了句：“要是你的核心里有一个周恩来，那中国的事就好办多了……”

蒋介石马上召集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徐永昌等高级将领开会，要求两个战区各以原兵力的百分之六十进行消耗作战，另百分之四十撤到二线作为持久作战的基础，蒋介石向将领们强调，“不到于我有力的地区，不要与敌人决战。”

“要把武汉战场变成一个大泥潭，”蒋介石说“让倭寇深深陷进去，我们的办法是将敌人拖垮，然后消灭！”

根据蒋介石的部署，陈诚将江南数十万大军重新做了调整，将主力集结于鄱阳湖西侧水网泥沼地带和庐山地区，准备利用这些抵消敌装备优势的地势拖垮和消灭敌人。

代理第5战区指挥的白崇禧也赶回潢川召集军事会议，这位为中外军事专家们折服的号称“小诸葛”的军事家根据统帅部的指导方针和江北地理，确定了“在大别山南北两面险要地区阻敌，诱敌于对我有利地带歼灭，确保长江北岸”的作战方针。

7月2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海、空军配合下由长江水路、106师团由陆路，向九江发起攻击。我第9战区的李汉魂64

军、欧震4军、李玉堂8军、李觉70军、王敬久35军在沿长江和鄱阳湖一线与敌展开激战。

负责九江地区防务的是第9战区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这位曾在北伐战争时斩关夺隘，获“铁军英雄”美誉的将军，防守九江之战从一开始就不顺利。7月23日零点，日军冒着大雨进攻九江的前沿阵地姑塘。守军预备11师拼命抵抗了3个小时，在一片漆黑又是哗哗大雨的环境之中作战，我军的素质显然不敌专善热带作战的波田支队。日军在损失9余艘汽艇后强行登陆成功，张发奎派去增援的15师和118师战斗力很差，没放几枪便退回九江和星子一带，贻误了收回姑塘的时机。25日晨，水面和陆上的日军合攻九江城，与李玉堂8军和赶来增援的欧震4军激烈厮拼整整一天。25日晚，日军攻破城门，冲入城内，我军与之展开激烈巷战，双方在城中混战了又一个昼夜，互有惨重伤亡，满城泥水中浸泡的已不知是哪方尸体。26日晚，我军被迫撤出九江城。

张发奎深感作战指挥不利之责，亲自写报告向蒋介石请罪，要求先严厉处罚自己，以警示其他失职军官。

蒋介石和陈诚对九江失守好象早已料到，并没有发火追究。他们早已布置了下一步棋，将日军诱入九江附近的庐山地区复杂险恶的地势之中歼灭之。

日军早知九江一线是江南防线的门户，此时门户被打开，101、106师团紧紧尾随撤退的中国军队而来。

我军按计划退至庐山两侧及南昌至九江的南浔铁路线，消失在重重叠叠的高山密林之中。

(六)

进攻九江的是冈村宁次第11军的部队。冈村宁次是在侵华战争中发迹起来的日本新军伐之一，性格中既有军国主义的狂热，又有军事指挥员的冷静，占领九江之后，按原计划应继续沿江西上，直奔武汉，但精明的冈村侦知在他们前面的瑞昌至富池口几十公里地段上，埋伏着一支精兵，岂是一支，而是一个集团——孙桐萱第3集团军、关麟征第32军团、汤恩伯第31集团军和孙相堂第12军。都是在前几次大战中威名显赫、战功卓著的军旅。冈村牢记着日本战法中的一条铁成一般的格言，“对于可以迂回的对手，永远不要正面攻击。”他改变了原定计划，改走陆路，从庐山西麓，沿南梁铁路南下，占领德安之后，另外一部由德安西进，迂回到孙桐萱等精锐部队背后，采用水陆夹击故伎，消灭这个心头之患。

中国古语有云：“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冈村自以为得计，却早中了蒋介石、陈诚设下的圈套。

第9战区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将军，将7个军的兵力摆在南浔路旁的高山密林之中，单等日军来攻。

8月1日，日军106师团在空军配合下猛攻金官桥我军阵地，我军顽强防守3昼夜，打退敌数十次进攻。3日下午，日军施放毒气，我前沿阵地数百名官兵中毒昏迷。日军乘机冲破我军防线。

8月6日，李觉、欧震两军组织反击金官桥，苦战长达7昼夜，又将阵地夺了回来。冈村亲临前线，指挥101、106两个师团于8月14日起在南浔路一线全面展开攻势。薛岳将军

指挥部队分兵把口，寸土不让。

8月18日，我155师师长陈公侠突发奇想，率全师大胆穿插到日军145联队侧后，与正面部队一起，将这个联队及配属作战的日军共5千多人包围起来。

从清晨到日落，深山密林中枪声、爆炸声不绝于耳，这些日军被我以优势兵力全部歼灭。

战斗快结束时，我军数千官兵层层密密地将敌145联队队长长川大佐及四、五十名日军团团围在几块巨大石山的缝隙之中，翻译上前喊话，敦促他们放下武器，20分钟不见回答，我军官兵齐掷手榴弹，将长川等日军全数消灭。

145联队被歼，106师团士气大减。我军占据有利地势以逸待劳，冈村只好令被困部队暂停行动，在原地防守待援。

8月20日，日军第101师团渡过鄱阳湖，在星子地区强行登陆，来解救106师团，进入庐山东南麓时，薛岳兵团叶肇66军、王敬久25军和陈宝安29军将其层层包围。

装备精良，机械化程度很高的日军101师团数万之众在南浔路旁的山岳水网地带顿失往日威风，在我军包围打击下进退两难，陷于困境，也不得不停止了进攻。

9月上、中旬，南浔路战场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两军遥相对峙，都不主动发起攻击的局面。日军因水土不服，大量兵员患病，加之尸体难收，腐烂恶臭，加剧了传染疾病的传播，非战斗减员剧增。

而我军正好利用这段时间休整补充，战斗能力又有了很大恢复。

一天，薛岳察看地形，在德安以西的马回岭盆地停住了脚步，沉思良久。

这里西面是白云山高地，东面是庐山的西麓，南面是博阳河以北的山地，故马回岭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小盆地，沙河镇至马回岭铁道沿线地势比较平坦。薛岳忍不住心中的激动：“真是一个天赐的战场！”

几天之后，薛岳秘密地将4军、74军和27军布署在马回岭、乌石门至庐山西麓，布下了一个反八字形阵势，以重机枪和火炮构成严密的火力网。

蒋介石听到这个“反八字阵”后很感兴趣，专程从南昌赶来视察。薛岳介绍说：“这个阵势如捕鼠之袋，又如飞剪，犯右则中左应，犯左则中右应，敌人钻进来就别想逃出去了。”

蒋介石笑道：“听伯陵（薛岳的字）这么一说，这个反八字阵倒比诸葛亮的八卦阵更玄妙了。”

在南浔路受挫后，日军武汉会战总指挥畠俊六大将急调第9、第27师团增援九江战区。这两个师团在海空军配合下，沿长江向西推进。

9月中旬，日舰40余艘在地面部队的配合下，猛攻堪称九江至武汉江防锁钥的富池口、田家镇两个要塞，防守在这里的汤恩伯31集团军及萧之楚26军、何知重86军、李延年2军、周品石75军官兵奋战抗击。

田家镇是武汉门户，蒋介石下令死守。从9月15日起，日军第6师团在陆上对田家镇的攻击日益加剧，两军激烈拼杀，反复争夺阵地，我军防线终日硝烟弥漫。

敌机的频繁轰炸对我军威胁极大，由于缺少防空武器，李延年2军9师师长郑作民组织机枪对空射击。在9月18日战斗中我军竟果然击落了一架敌机，顿时阵地上欢声雷动。

在2军27旅阵地上，我军前仆后继，开战3天便伤亡

900 多人，其中营长以下军官 60 多名，官兵们抱定与要塞共存亡的决心，在极其残酷的战斗中打垮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战斗中常常出现短兵相接，陷入肉搏的情形。2 军 9 师 53 团 1 营 3 连在与敌肉搏中，下士班长时克俊赤手空拳与敌人扭打，被敌兵咬掉左耳，他忍着疼痛，用双手猛扼敌兵喉咙，直至将其卡死。

53 团重机枪一连少尉排长袁次荣在全排战至仅存他一人时毫无惧色，伤亡敌数十人后，拉响集束手榴弹与冲上来的几名日军同归于尽。

保卫田家镇要塞的战斗日复一日，我军以巨大代价杀伤大批日军。亲赴要塞督战的第 5 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在日记中写道：

“战况之剧，无以复加；将士忠勇，可歌可泣。东去之大江，滔滔奔涌者尽是中华儿男之热血矣！”

9 月 23 日，日军攻占富池口，又于 27 日占领武穴，田家镇要塞被敌人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攻打。许多守军阵地已经弹尽粮绝，几处防线的守军全部阵亡。

9 月 28 日，长江水面的日军从上洲头登陆，猛攻上公、陈家嘴我军防线，激战至下午，田家镇的制高点玉屏山被日军攻占。当夜，李品仙下令撤出防守田家镇的部队。

田家镇保卫战是武汉会战中值得书写的一笔，我军顽强坚守 15 天，毙敌 2100 多名，迟滞了敌人的进攻速度，杀伤了敌有生力量。撤退时，我军将拖不走的大炮卸下零件，把炮筒埋在水网地带的泥浆里。

在保卫田家镇要塞的战斗激烈进行之中，9 月 20 日，畠俊六大将给 11 军司令冈村发来电报，令他组织 101、106 师团

突破包围，尽快向武汉推进。

冈村立即将重炮 13 联队配属给位于星子以南隘口地区的 101 师团，令其突破包围圈攻占德安；同时命令 106 师团攻向德安以西万家岭山区。为一举成功，冈村又令第 9、第 27 师团派部份兵力做策应作战，配合 101、106 师团突围。

10月2日，被我军十余万大军围困一个多月的日军 101、106 师团中的 4 个主力联队，与其他配属部队共 3 万多人，在空军配合下，猛攻我军防线，向西突围。

王敬久 25 军、叶肇 66 军和陈宝安 29 军利用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与日军激战两昼夜，在杀伤大量敌人后撤出阵地，日军见包围圈被突破，疾速向德安以西万家岭方向运动。

10月5日，1兵团指挥部。薛岳正在与参谋长对弈，门外响起副官急促的脚步声，薛岳说：“我猜是松浦（日军 106 师团长）这老家伙上钩了。”果然副官进门就递上日军进入万家岭地区的电报。

万家岭地处经我军周密布署的乌石门反八字阵西侧，经过二十多天准备，我军官兵斗志昂扬，严阵以待，静静的丛山密林中到处都是上了膛的枪炮。

10月5日，行至万家岭的 3 万多日军被迎候在此的欧震 4 军、俞济时 74 军和尾随而来的叶肇 66 军团团包围，两军即在集山峻岭间展开激烈战斗，使这片往日寂静的山林终日枪炮声不断。

日军发觉自己已经走入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拼死挣扎，格外疯狂。每一座山头，每一个村庄都变成两军激烈争夺的目标。

敌空军出动大批飞机配合地面部队突围，但在前沿，因两

军相距太近，敌机无法投弹，便轰炸我二线预备队，补给线和指挥所。

第9集团军总司令员吴奇伟在叶肇66军指挥部指挥作战，常常是听到防空警报时敌机已经飞到头顶了，指挥部几次遭空袭，幸而没有人伤亡。

有一次又遇空袭，吴奇伟和叶肇来不及隐蔽，只好钻进床板底下，敌机扫射时将床板旁的作战图版打出两个鸡蛋大的洞，警报解除后，两位将军狼狈地钻出床板，细看那两个弹孔，连称“好险，好险。”

10月7日，薛岳命令万家岭地区部队发起总攻，务于3日内消灭当面之敌，向“双十”节献礼。

下午4时，群山中杀声震天，我军总攻开始。官兵们人人奋勇当先，冲向敌阵。傍晚，德安以西山区开始了大规模的围歼战斗，南面俞济时74军伤亡很大，但这支部队战斗力不减，官兵们数次顽强进攻，天黑前占领了长岭，包围了张古山之敌。

10月8日又在激烈中飞渡而过，叶肇66军攻占了万家岭以北石堡山、老虎尖，缩小了包围圈。当晚，74军的王耀武51师夜战张古山，强攻成功，消灭了千余名日军。

9日白天，战斗达到白热化。日军向外冲、我军向里打均无进展。由于短兵相接，日军的飞机、大炮、毒气都失去了作用，两军多次肉搏混战，满山遍野都是中日士兵的尸体和垂危的伤员。

1兵团指挥部，一向以临危不乱，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著称的薛岳将军此时也有些沉不住气了，眼看这些顽敌最后挣扎而不能被消灭，我军伤亡不断增加，薛岳心中焦急万分。

9日下午5时，薛岳下令进攻部队各师均组成250至500人的敢死队，晚7时完成突击准备后即发起强攻。

当夜色淹没万家岭山区时，身负集束手榴弹、炸药包的敢死队员们从各军前沿出发了。这支有去无回的队伍中全是军中最精壮、最优秀的汉子。

66军军长叶肇挑灯为该军的敢死队员送行时，忽然发现自己过去的勤务兵叶辅时也在敢死队员的行列中，便招手让他过来。

这是叶肇一个远房穷亲戚家的孩子，因家境贫寒送到叶肇门下当兵混口饭吃，叶肇念及亲戚一场，又见这个叫叶辅时的孩子聪明伶俐，便留在他身边当了一名勤务兵。

谁知这穷苦出身的孩子心情却极高，不满足于舒适、安全的勤务兵职务，闲时刻苦学文化，立志做一番大事业，后来几经要求，下了叶肇手下的部队，打了两仗后当了班长。此次组织敢死队时，他在全班带头报名，加入了这没有归途的征程。

此时相见，叶军长百感交集，他抚摸着叶辅时的肩膀，千言万语只轻声说了句：“好孩子”。辅时端正地向叶肇行了个军礼，返身跑回队伍之中。

晚8时，我军轻重武器一齐开火，敢死队勇猛突入日军阵地、工事，接着是剧烈的爆炸声惊雷般滚滚而来，后续部队高喊着“为烈士报仇”，不顾一切冲向敌人。

日军在这突然而猛烈的打击中惊慌失措，组织不起防御体系。箭炉苏、田步苏、杨家山等地的阵地很快被我军突破。仓惶溃逃的日军在黑夜中瞎冲乱撞，混乱之中自相践踏，死伤无数。

10日凌晨3时，叶肇66军收复了万家岭、田步黄，欧震4

军收复大金山西南高地和箭炉苏以东高地，俞济时 74 军于拂晓将被日军反攻下的张古山再次收复。

10月10日，冈村宁次在震惊之中令坦克第5大队和17师团53、54联队各两个大队增援万家岭106师团。我军一面加紧肃清万家岭残敌，一面阻击增援之敌。

10月11日，薛岳命令各攻击部队逐山歼灭残敌，这时日军已溃不成军，不堪这最后一击了。

德安以西地区战斗历时22天，最后在万家岭经过5昼夜总攻激战，日军第101、106师团的四个主力联队和其他配属作战的部队共3万余人，被我军全部歼灭。其中106师团仅有不足千人逃脱，这是抗日战争以来我军消灭日军最大的整建制部队，而日军则从没有完全歼灭我军一个整师的纪录。（虽然打垮的不少。）

10月12日，蒋介石致电薛岳，传令嘉奖1兵团万家岭作战各部，拨10万元之资作为犒赏专用。

此战被舆论界称为“万家岭大捷”，载入了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史册。

正当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与日军激烈战斗时，武汉市内进行着紧张而有序的疏散、撤离工作。按蒋介石的命令，国民政府机关迁往重庆，疏散武汉三镇50万人口。

占全国工业生产重要比例的武汉各工矿是撤退的重点，大批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撤到四川、云南、甘肃等地，许多工厂在短时间内便恢复了生产，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武汉几所大学的师生以及云集武汉的一批知识分子、艺术家也随着大撤退的人流来到后方，开始了新的学习、研究和从事艺术工作的生涯。

(七)

当南路日军沿长江水陆并进，艰苦拼杀，节节推向武汉时，北路稳彦亲王所率的日军第2军十余万兵马也在按计划由合肥西指信阳，并预定由信阳下南武汉。

北路日军与南路日军一样，也是一路搏杀，一路伤亡，步履维艰。

日军西出合肥，迎面便遇上防守大别山北麓的孙连仲第2集团军。孙连仲将于学忠51军、宋希濂71军、冯治安77军、田镇南30军和冯安邦42军沿六安至信阳摆开，这些部队均是背靠大别山，居高临下，先得了地利。

孙连仲将张自忠59军及集团军直属骑兵部队布署在固始丘陵地带，控制山区各通道，依山阻敌西进。张自忠受命后下令破坏公路，桥梁，使敌人的机械化装备无法展开。

1938年8月，由于黄河决堤而被迫绕行的稳彦第2军各部陆续在合肥集结。在烟俊六大将催促下，该军13、16、10、3师团分两路向六安和霍山开进。

9月1日，日军荻洲13师团向驻守史河以东的熊集、白大坂的宋希濂71军前哨阵地发起猛攻。宋军依托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杀伤日军300多人之后，于9月2日傍晚撤过史河。

9月4日，荻洲13师团在装甲部队和空军配合下强渡史河，进攻史河以西制高点富金山，与宋希濂布署在该山两翼的88师、36师激烈冲突。

宋希濂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抗战爆发后参加了“8·13”

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和豫东会战，有“粤大将军”之称。正是抗日战争使他的军事才能得以最大程度的施展，在富金山阻敌战斗中，他与日军斗智斗勇，打出了后来的辉煌。

为便于指挥，宋希濂将军指挥部设在富金山山顶。战斗全面展开后，他不时深入到各师和团的指挥所，常对部下说的一句话是：“狠狠地打！”

9月6日以后，日军将进攻重点放在富金山左翼36师阵地，沿山脉棱线向上仰攻。36师师长陈瑞河将兵力按梯形配置，居高临下，正好得手，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拖回许多尸体。

战斗中，宋希濂用望远镜看到日军的炮阵地、运输队。他十分遗憾手中没有炮兵，“哪怕只有一个榴炮团，我也把荻洲这老狗掀个底朝天！”

9月8日，荻洲因富金山进攻受挫受到稳彦的严厉训斥，荻洲来到担任主攻的联队督战，严令务必于10日拿下富金山，为后续部队西进打开通道。

日军采用飞机轮番轰炸和大炮密集覆盖的战法，使我前沿阵地破坏严重，守军伤亡很大。日军重点进攻的36师阵地情况更为严重，但官兵们抱定死守的决心，打退日军一次次集团冲锋。

昼夜不停的激战持续了长达3昼夜，到9月11日，守军陈瑞河36师剩下的人数已不足一个团，日军13师团也因地势不利而伤亡严重，富金山激战中，日军始终没有攻达山腰我军主阵地。

稳彦见富金山久攻不克，严重迟滞了北路日军的总体进攻计划，便派筱塚10师团增援荻洲。筱塚命令增援部队乘黑夜对我军的军指挥部所在地武庙集进行迂回包围，企图破坏

我指挥机构并切断富金山与后方联系。

事有凑巧，日军偷袭我指挥部的企图恰被 71 军右翼部队 88 师 523 团 1 营营长梁筠率领的深入敌侧翼侦察敌情的小队探悉。梁筠立即率部潜回，将情报报给 88 师师长钟彬。

事不宜迟，钟彬一面向宋希濂报告敌情，一面召集指挥部人员和当地百姓开会，研究了敌人行进路线后，钟彬果断决定，在敌必经的坳口塘设伏。

日军万没想到，在决定偷袭行动的当夜，我军便探得准确情报并做出反应。凌晨时分，88 师 528 团据坳口塘险要地势，伏击日军 2000 余人，大获全胜。敌人弃 700 余具尸体狼狈撤退。

9月12日晨，正当宋希濂与钟彬一同参观 528 团缴获日军的大批枪械和物资，副官递上一份电报：日军攻向霍山的一路于 9 月 12 日晨 4 时突破守军防线占领了霍山。

霍山位于富金山东南，霍山失守，富金山侧背暴露于敌。宋希濂正在考虑如何调整兵力御两面之敌，又接到孙连仲电报，命他撤出富金山，向西退入下一道防线。

9月12日，稳彦将日军藤江惠辅 16 师团调至一线，攻打由田镇南 30 军防守的商城。

30 军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部队，曾在台儿庄会战中令敌人闻风丧胆。商城阻敌，30 军威风不减，与日军激战 4 昼夜，双方均伤亡惨重。

9月16日，30 军撤出商城，与宋希濂 71 军一起，防守沙窝、小界岭一带。

敌 16、13 师团随之赶到，中日两军都不顾疲惫，立即投入作战。沙窝防线上，30 军在左翼，71 军的 88 师在正面、87 师

在右翼,形成一条防御带。

在日军两个师团的猛攻面前,我军沉着应战。为了便于配合作战,30军和71军两个指挥部同设在小界岭南3公里的白果树村。面对敌人频繁进攻,两个军的指挥员一起研究对策,互相支援配合,每每将敌人进攻粉碎。

敌16、13两个师团的任务原是取捷径越过大别山,迂回武汉,沙窝防线再次挡住日军的脚步。9月20日,孙连仲命令田镇南30军、冯安邦42军向敌反攻。

孙连仲第2集团军各部普遍装备落后,官兵们全凭一腔爱国热诚奋勇杀敌。他们凭借大别山茂密的丛林、险峻的山势勇猛出击,大量杀伤了敌人。

日军在频频进攻和守军反攻中伤亡惨重,13师团从合肥出发时,每个步兵中队为180人,至10月初,只剩下平均40人了。

孙连仲第2集团军在大别山作战中创造了抗日战争阵地防御作战的范例,受到国内外军事专家的称道。在10月21日由于战局变化而主动撤出阵地之前,敌16、13师团未能越过防线,达到迂回武汉的目的。

(八)

第13、16师团陷于大别山区的丛山峻岭不能自拔,日军第2军司令官稔彦无奈将希望寄托于由固始至潢川、罗山攻占信阳的第3、第10师团这一路。

9月21日,第10师团的第8旅团以惨重的代价占领了罗山,该旅团第39联队从合肥出发时为2800人,因做为先头

部队连续作战，攻下罗山时，全联队只剩 800 余人了。

9月28日，第3、第10师团由罗山向西推进。罗山至信阳的道路和桥梁早被破坏，机械、车辆无法使用，这两个机械化师团只好临时改为驮马师团缓慢前进。

罗山是信阳的东大门，罗山失守后，信阳地区形势陡然紧张起来。蒋介石为阻敌由北迂回武汉，命胡宗南17兵团改编为豫南兵团，下辖董钊16军、陶峙岳1军、沈克43军，防守罗山以西到信阳地区。

为确保信阳，10月4日，蒋介石又决定成立了由罗卓英为总司令的第5兵团，指挥刘和鼎39军、孙桐萱第3集团军、万耀煌第15军团、张义纯48军，于即刻启程赴信阳地区增援。

罗卓英率部由汉口分乘几列火车北上。10月6日，列车还没到达预定地点，罗卓英便在火车上接到豫南兵团与敌第10师团在信阳以南的柳林车站接火的急电。

罗卓英就近下车，将兵团指挥部设在河南与湖北交界的鸡公山。10月7日，他下令北上先头部队刘和鼎39军一部与胡宗南豫南兵团协同，夹击日军第10师团。两军遂在铁路沿线展开激战。

胡宗南豫南兵团是中央军中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部队，加上熟悉地形，经过充分准备，在战斗中十分得心应手，将日军压得抬不起头，我军北上部队乘着火车源源赶到，见铁路线已变成了战场，纷纷弃车步行，在两侧抢占制高点，向北前进。

此时，日军藤田第3师团已于10月4日从罗山以北攻向平汉铁路的三官庙、长台关、彭家湾车站，与第10师团遥相配合，从南北两方面对信阳进行迂回包围。

10月9日，日军第3师团在坦克第7联队和空军第1飞行团的配合下，突袭董钊16军第28师在八里棚、楠杆铺、吴家坡一线防御阵地，阵地守军历经苦战，伤亡殆尽，防线终于被日军突破。

信阳以南的日军第10师团在10月8日攻占柳林车站后，迅速向信阳靠拢。胡宗南、罗卓英率部力战，沿途截杀日军5000余人，但第10师团的先头部队冈田第8旅团奋力摆脱追杀，直奔信阳城而来。

日军第3师团苦战两昼夜，接连突破陶峙岳1军的李正先1师1旅和李文78师在中山铺及信阳城东郊的防御阵地，于10月11日夜间兵临信阳城下。

信阳告急。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这时已治好伤，重回指挥位置）命令胡宗南调整部队，死守信阳，但胡见大势已去，深恐再付重大伤亡仍于事无补，便留下一团兵力在信阳城区，自己率主力部队退往南阳。

胡宗南豫南兵团一撤，信阳立时变做一座孤城。日军第10师团冈田第8旅集中坦克、火炮的火力，于12日凌晨起猛攻城池。

留在信阳的部队是陶峙岳1军李文78师的一个团，他们联系不上城外我军主力，求援无望，只得横下心来拼死抵抗。官兵们将城内军械仓库中的武器弹药摆满城防工事，脱光上衣，进入各自工事之前说声“来世再见”，义无反顾地钻进工事中。

日军第8旅团长冈田坐在一辆坦克中指挥攻城，这个相貌文质彬彬的少将军官一直率部走在第10师团最前面。这个旅团斩关夺隘屡立战功，同时伤亡惨重，成为进攻武汉的日军

部队中很受注目的一支。

日军攻占武汉之后，冈田晋升为中将，回国担任了驻名古屋第13方面军司令。日本1945年宣布投降的当天，冈田与他的老上级，后来当上了天皇军事参议官的第10师团筱冢义男中将相约，双双剖腹自杀——这是后话。

10月12日下午5时，第5战区长官部电令陶峙岳，防守信阳部队撤出阵地，归回建制。78师用电台将撤退命令通知守城的同时，全团只剩下一名副团长、两名营长和十余个浑身是伤的士兵，其余的已全部阵亡了。

(九)

10月12日，蒋介石同时接到万家岭大捷和信阳失守一喜一忧两份电报。信阳失守，武汉大门洞开，虽有罗卓英率5兵团拼死阻击，节节防守，仍难保武汉的安全。

侍卫长请蒋介石用晚餐，蒋这才想起午饭根本就忘了吃，感到浑身无力得再也不愿在作战室呆一秒钟了。正要去隔壁餐室，见机要参谋神情沉重地又送来一份以表示“特急”的红色公文夹呈来的电报，蒋看完后吃惊不少，暗想：“今天是什么鬼日子，怎么都赶在一起了！”不顾吃饭，赶忙召集幕僚开会。

这封特急电是第4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从广州发来的。日军3个师团在海空军配合下，在南海大亚湾登陆，直逼广州。

蒋介石心中清楚，这是日军的一箭双雕之计。一是策应进攻武汉，二是切断那条对中国抗战可说是至关重要的海上国际运输线。

会后，蒋介石电令余汉谋从中山、琼崖、花县调兵保卫广州，并从武汉战场抽调部份部队增援，但第4战区兵力本来就不多，又不可能从武汉战区抽出很多兵力，能不能抵挡得住日军3个师团的进攻，蒋介石感到没有很大把握。

当夜，蒋介石派人写了《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刊于10月13日全国各大报刊，文章强烈谴责日寇新的侵华罪行，号召广东军民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保卫领土。

日军入侵广州，使蒋介石下决心撤离武汉，保存军事实力以为长远计。

10月13日，军委会召开高级将领特别会议，由蒋介石亲自宣布了以下决定：

鉴于日军在长江南北之合围圈已经缩小，广东形势严重，各部队连续数月作战须作休整补充，乃决定撤离武汉。

这次军事会议对参加武汉作战各部队的撤退作出周密安排。这些部队经过逐次抵抗、层层退守，数月之中杀伤大量日军。此时，他们有的向二线转移，有的化整为零进行游击作战，有些刚逐渐到离武汉很近的地域，其主要任务转为掩护统帅部安全撤离。

10月15日，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严令各部加强防御，确保德安、武宁及通山、金牛、保安、鄂城防线。

同一天，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来到驻广济的第6师团指挥部，命令该师团自16日起，经浠水、巴河、黄陂向汉口发起攻击。

10月16日，攻占信阳的日军第3、第10师团沿平汉路南下，直取武胜关。罗卓英率部层层设防阻挡，两军在铁路沿线激战不已。

10月18日，走在南路的日军先锋波田支队突破守军防线占领了阳新，而后直插大冶，19日攻陷大冶，威逼鄂城，要在第9战区的最后一道防线上撕开一个口子。

10月21日，蒋介石接到第4战区副司令官余汉谋电报：日军5、18、104师团配合以1个航空兵团和海军第2遣华舰队，经与我张达62军、张瑞贵63军、李振球65军10天激战，突破我军防御，于本日攻入广州。

此时，蒋介石从九江以南战场紧急抽调增援广州的邓龙光64军、叶肇66军正乘火车走在去广州的路上，得知广州已陷，只好掉头折回。

广州城内被日军飞机和大炮轰炸得一片狼藉，大火冲天。城内多数百姓来不及撤走，在这场从天而降的劫难中一片混乱，死伤无数。

侵占广州之后，日军第21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下令在城郊举行了一个象征性的入城仪式，排列着整齐队伍的侵略者举着血迹未干的屠刀，踏进这座昔日美丽整洁的城市，向中国人民炫耀武力。

武汉战场的撤退如期进行。10月19日晚，李宗仁带着第5战区长官部在撤退途中住在平汉铁路线上花园站以西约10里的陈村。当夜，李宗仁忽感坐卧不宁，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平静，下意识中有一种大灾将至之感。他连忙叫醒侍卫，传令立刻转移。

参谋长徐祖贻来问有什么情况，李宗仁说“陈村可能不安全，我觉得应该马上离开。”

徐祖贻知道李宗仁一向思维严密，不依“可能”之类决定行动，但李宗仁态度坚决，也就没再说会么。长官部一行人立

即收拾东西，向西疾驰。

在李宗仁一千人马离开陈村不到两小时，一支一千多人的日军骑兵部队便将陈村团团包围。翻了个底朝天，杀死百余名村民后扬长而去。

事后，人们无不后怕，庆幸因李宗仁的“神通”才免此大灾。

(十)

10月22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将领召开武汉会战的最后一次会议。武汉警备司令郭忏报告说：市内厂矿、机关、学校、市民都按计划撤退完毕，眼下武汉已是一座空城了。

会议开得沉闷。大街上“誓死保卫大武汉”的标语犹在，群情激奋的场面仿佛就在昨天，而现在开的会却是在安排撤离武汉的行动细节。将领们心情沉重，不愿多说话。

蒋介石以“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之得失，亦不在一时之进退”的道理劝慰众人一番之后，宣布军委会于10月23日撤离武汉，城内外的部队随之向后方转移。

军委会官员的家眷们早已安排在后方，蒋夫人宋美龄却一直坚持与蒋同行。会后，蒋介石又劝夫人当晚先走一步，宋美龄坚持第2天一起走，蒋无奈只得同意。

10月23日，烟俊六下达总攻命令。几路日军争相杀向武汉，抢夺头功。

江北战场，日军第3、第10师团自信阳南下，在一路混战中损兵折将，以惨重伤亡分别攻占了应山和安陆。

因孙连仲第2集团军接到转移命令已于10月21日撤出

防御阵地，日军第13、16师团终于可以迅速向西运动，于23日开进宋埠、麻城。

第6师团于22日接到空中侦察报告，大别山小界岭地区中国军队主力正向麻城方向撤退，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命令组成机械化部队，突进距汉口咫尺之遥的黄陂。这支机械化部队很快到达了黄陂以东地区，一部份走在后面的中国军队受堵截，10月22日黄昏一场血战，我400余官兵阵亡。

10月22日，日军116师团一部协同海军，由水路直插武汉东郊的葛店，守军李兰及55师与之激战，这是武汉城区最早听到的枪战声。

江南战场，日军波田支队于10月23日沿长江南岸直逼武昌城下，武汉卫戍部队立即组织反击，双方均在近距离内交火，多次展开肉搏，战斗从早至晚，异常残酷。

日军第9师团由辛潭铺突入武汉以南的贺胜桥，切断粤汉铁路后北上武汉。

10月23日傍晚，日军已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了武汉三镇，枪炮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往日繁华喧闹的城区街道除了军队几乎无人走动，令人感到这确是一座空城。

蒋介石仍稳坐在武昌军委会的办公室中，身边的将领们不断催促他快走，但他坚持要等布置完各部队撤退后再走。

10月24日，负责断后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得知蒋介石还没有走，又急又气。主力部队已经转移，保卫城区的部队只等统帅部撤离，正在与疯了般攻城的日军做殊死搏斗。

武汉城区无险可守，多打一日便有几千官兵丧生战火。陈诚冒着敌炮击赶到军委会，以保证统帅安全为由，强烈要求蒋介石快走。

在陈诚再三催促下，蒋介石于 24 日夜晚偕同夫人宋美龄登上飞往湖南的专机。

飞机在跑道滑行时，驾驶人员清楚地看见炮弹爆炸的闪光在武汉市郊不停地闪烁。年轻的驾驶员张维楚说了句：“再见了武汉，我们还会回来的”！

飞机升上天空，机上的人们长长地舒了口气。蒋介石面色阴沉，透过舷窗观看地面的爆炸引起的闪光和一些建筑物上燃起的大火。

过了好一会，蒋介石感到情形不对，舷窗外总是爆炸的闪光和燃起的大火，仿佛总也离不开，总也摆不脱。蒋介石心中一惊，暗想：“该不是我的脑子出了毛病吧？”

这时机长向何应钦报告说，刚才由于驾驶员精神过于紧张，飞了半天也没有辨清方向，现在方向是辨清了，但燃油已消耗了不少，担心飞不到目的地，请示是否回武汉机场加油。

何应钦心中暗暗叫苦，但飞机悬在天上，事已至此，只好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向蒋介石报告后，他指示机长抓紧返回武汉加注燃油，确保统帅安全。

于是，这架号称从来没有出过蚂蚁大故障的统帅座机冒着危险重新驶回武汉机场。机长对刚才说“还要回武汉”的驾驶员张维楚苦笑道：“恭喜言中，只是太早了些。”

经在空中与机场联系，飞机降落后，空勤人员立即赶来加油，蒋介石见机场到处都军人在奔忙，便向飞机察看后刚上来的侍卫长是怎么回事。侍卫长告诉蒋介石，这些是负责破坏机场设施的工兵营的士兵，刚才专机起飞之后，他们已将跑道炸毁了三分之一，正准备爆破另外的部份以及塔台、通讯和加油设施，要是飞机再晚降落一点……

蒋介石听完之后，愣了半天，随着一口长气说了句：“阿弥陀佛……”

飞机加满燃油重新升上天空时已是10月25日凌晨4点多了。后来得知，正是在这个时间，日军波田支队已率先冲入武昌城，直奔蒋介石离开不到5小时的军委会大楼。

飞机升上高空时，机上的人们在东方天际看到一抹暗白。侍卫长见蒋介石闭目靠在座椅上，便轻轻将一件斗篷盖在他身上。

蒋介石并没有睡着。轰轰烈烈的武汉会战就这么结束了，结束得那么安静。是否可以说，这是上溯百年以来中华民族历史上抗击外侮的最大一战？

中国军队几乎全部出动。兵力从会战开始时的60多万人陆续增至110万，与敌人相比显得很弱的空军、海军也全部投入，可以说我们是倾其军力、国力之所有了。

这场大战战线长至皖、豫、赣、鄂四省数千里，历时四个半月，付出了沉重的牺牲，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据可以从敌方证实的统计数字，江南江北两大战场，大大小小上千次战斗，我军击毙日军超过20万。

在明显劣势的武器装备之下，我军广大官兵凭着一腔爱国热血与敌寇拼杀，用血肉之躯抵挡着侵略者铁蹄对我国国土和我中华民族尊严的践踏。我军在这场大会战中伤亡的人数是40多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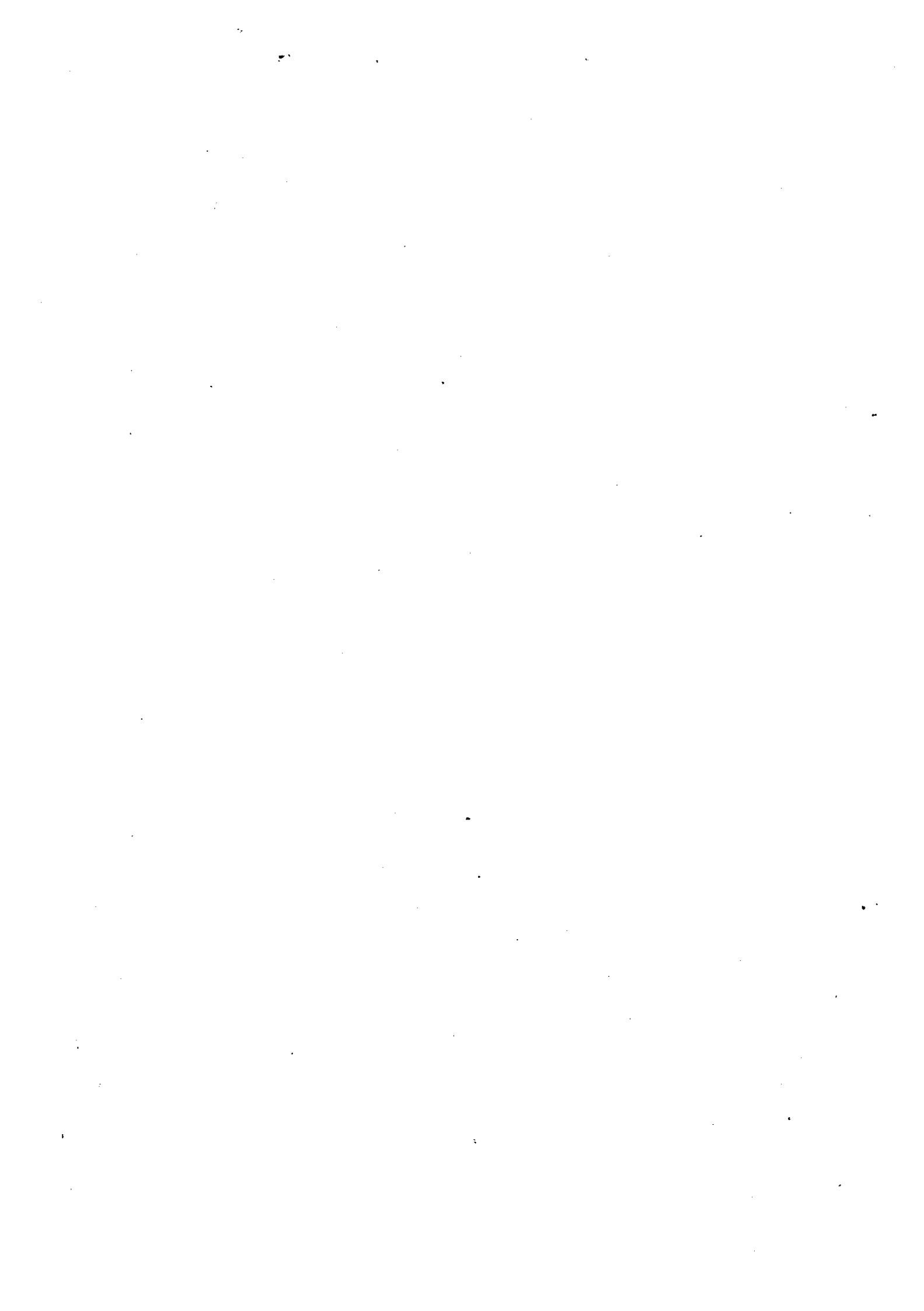
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日本迫使中国屈服的目的没有达到，日军元气大伤，短期内无法组织大的进攻行动，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由防御阶段到相持阶段的转折点。

在这次会战中阵亡的英烈们将永远为中华民族所记忆；
这一百多个血与火的日日夜夜会永远被历史所铭刻、所珍藏。

飞机在云层上方飞行，海涛般的云层一望千里，尽头是
一轮初升的太阳。

张维楚已飞行过数千小时，但此刻仍然被这壮观的景象
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一面驾驶着飞机，一面喃喃自语：
“我们还会回去的，我们一定会回去的……”

五、昆仑关： 涛涛碧血写军魂



引子

1939年秋，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多事之秋。

在欧洲，德国于9月1日入侵波兰，两天后，英法两国宣布对德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由于国际关系在战争中的巨大变化，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组成部分。此时的中国战场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中日两军在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地激烈拼杀，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伤亡。

9月13日，日军大本营作战部长富永恭次少将提议，可以乘英法对德作战，没有精力顾及远东殖民地的时机，派兵力迂回中国南方，攻占钦州、南宁，切断中国与法属越南之间的运输通道。

这条隐藏在深山密林之中的运输线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十分重要。来自国际的援助和我国政府在国外购买的大量军备物资从这条运输线源源输入国内，这是我国抗日作战能力的保障之一。封锁了这条运输线，我国将蒙受巨大损失。

富永恭次的提议很快在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10月16日，日军大本营向在华日军的最高指挥机关“中国派遣军”总部下达作战命令：

“第5师团、第28师团、台湾旅团与海军协同，攻占钦州湾、南宁、镇南关、龙州。”

日军驻广州的第 21 军司令官安藤利吉接到命令后，立即着手实施各项工作，在组织陆军作战准备的同时，与近藤新竹中将的海军第 5 舰队、山县正乡少将的海军第 3 联合航空队进行了协同。安藤下令进攻部队于 11 月 10 日前到达海南岛南部的三亚港。

日军进攻钦州湾的行动被美、英两国的情报系统得知，并迅速通报给我国政府。11 月 9 日，驻守广西地区的我军第 4 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下令，驻敌计划登陆的钦州湾附近的 46 军冯璜 175 师、黄固新 19 师和独立 1、2 团进入战斗准备。

11 月 13 日，敌 21 军的部队以 70 多艘舰只组成一个庞大的船团，为达成战斗的突然性，日军冒着强风从三亚出港，驶向钦州湾。

我守军多数为当地人，他们知道在那种强风天气是决不可能乘船出港的，更何况是大兵团作战。在这种麻痹心理之下，多数哨位警惕松懈，注意力分散，直到日军的船团突然出现在海岸附近时才大吃一惊。

战斗最初在新 19 师第 56 团防守的钦州湾西岸企沙、龙汀打响。当我军全部进入阵地时，日军已有 20 余只舰船的士兵抢上岸滩，遂即展开猛烈攻势。为了这次突袭钦州湾的成功，日军的舰船在狂涛恶流中翻沉 7 艘，这些船上的士兵多数被大海吞没。

日军在与守军激战不到 3 小时后便突破了防御，船团上的日军全部登陆。

11 月 16 日，日军今村均第 5 师团的第 21 旅团在钦州湾内的朱屋、茅岭、黄屋屯一带，台湾旅团在钦州东岸的榄屋

地区相继登陆。守军于 16 日晚 7 时败退出钦州城防。日军随即分三路，沿钦州至南宁公路向前推进。我军 175 师、新 19 师在沿途阻击，但没能阻止敌人前进。

11 月 20 日，我国最高统帅部令杜聿明第 5 军、姚纯第 36 军、傅仲芳第 99 军迅速向南宁、柳州、宜山集中。但在这几个军到达集结地域之前，日军已于 11 月 24 日上午开始强攻南宁城防。

日军首先在大批飞机支援下强渡邕江，于上午 10 时到达北岸，即向城内守军展开攻势，两军在高等法院一带和城区街巷激战 6 小时，守军被迫撤离城区，日军将南宁城区完全控制。

在日军攻占南宁的同时，我杜聿明第 5 军的先遣部队戴安澜 200 师正以强行军速度向南宁疾进。在南宁陷落第 2 天的 11 月 25 日，200 师先头部队 600 团在南宁市郊二塘附近与日军遭遇。两军展开激烈战斗。日军以优势兵力和火力频频发起猛攻，我军寡不敌众，全团官兵伤亡三分之二，团长邵一之，副团长吴其升阵亡。

在 600 团顽强战斗的同时，我军各部队全速向前线开进。26 日，戴安澜率 200 师主力到达南宁以东七塘、八塘占领阵地，掩护我军大部队集结。

敌第 5 师团 21 旅团在我军主力到达之前，经与 200 师 598 团一周激战，于 12 月 4 日进占桂南要地昆仑关。我军主力到达后，与日军在南宁以北高峰隘和昆仑关一线形成对峙局面。

(一)

12月5日，国民政府军桂林行营。

副参谋总长兼行营主任白崇禧将军自从接到昆仑关被日军占领的消息后，一直竭力克制着内心的焦急，净静思索着将要面对的复杂局面。

白崇禧是桂系将领，在广西多年，深知这里的地理。昆仑关位于南宁东北45公里的昆仑山顶，是南宁的天然屏障和控制南宁至宾阳公路的要冲。它以其易守难攻被称为“天险”，又因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成为古往今来兵家必争之地。昆仑关一失，我军在桂南一带将陷于被动。

4日深夜，白崇禧仍在桂南地图前苦苦沉思。机要参谋送来重庆统帅部密电。蒋介石考虑日军初犯桂南，兵锋正锐，指示他慎重应敌，不可企求速胜。

避敌锋芒固然是用兵古训——白崇禧想，——但南宁得失事关我西南国际交通线安危，日军目前在桂南兵力不多，且比较分散，如果这时能够迅速集中我军优势兵力，乘敌人立足未稳，后续部队还没有到达之机主动反攻，收复南宁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想法象火一样烧灼着白崇禧，他在屋里来回踱步。他想，虽然统帅部已经有了一种保守用兵的倾向，但应该出于大局，据理力争一下。慎重起见，白崇禧分别打电话给第38集团军司令徐庭瑶和第5军军长杜聿明，问他们对桂南战局的看法。没想到两位将军的意见与他不谋而合！

白崇禧心中有了底，立即口授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建

议反攻南宁。

12月5日在焦急的等待中渡过，6日，白崇禧接到急电，蒋介石在柳州召开军事会议，要他赶往柳州。白崇禧知道统帅部已经下决心反攻，心中松了一口气，忙驱车赶往柳州。

会议地点设在机械化兵军校，白崇禧赶到时，蒋介石率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总统侍从室主任张治中及第4战区张发奎等已经先乘飞机到达。

参加柳州军事会议的有40多名师长以上将领，蒋介石让大家先说对桂南局势的意见，正在第5军军长杜聿明慷慨陈辞大说反攻时，忽听军校周围响起尖厉的防空警报声。杜聿明停止讲话，张治中示意蒋介石暂避，蒋却纹丝不动，催杜：“说下去，说下去！”

杜聿明正要继续发言，只听敌机隆隆由远而近。众将领忙扶蒋介石躲到离会议室不远的防空工事内，还不及安排停当，只听轰隆一声巨响，一枚重磅炸弹在工事几十余米处爆炸，掀起的泥土烟尘泼了工事内人们一脸一身。

日军飞机狂炸滥扫一通飞走了，蒋介石抖落着满身泥土灰尘，恨恨地骂道：“娘希屁，欺人太甚。”

虽然这颗炸弹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将领们心中仍难以平静。此次开会前仅一个月，日军疯狂报复我军沉重打击日军对长沙的第一次进犯，于11月2日出动大批飞机轰炸远离战场的浙江奉化县偏僻的小镇溪口。只因为这里是蒋介石的老家。

这次轰炸，将蒋介石、宋美龄回乡居住过的临剡溪而筑的“文昌阁”一大套洋式楼房全部炸毁，周围民房也遭连累倒塌一批，蒋介石的结发夫人，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在轰炸

中身亡。

蒋介石对此次轰炸没有在公开场合提及，甚至告诉报界不要多加渲染。但当时在江西出任赣州专员的蒋经国却悲伤欲绝。他星夜从江西赶回溪口，一见母亲尸首，立刻昏死过去，被救醒后嚎啕大哭，几天水米不进，在母亲遇难处竖起一块题写着“以血洗血”大字的石碑，以明复仇之志，他还写了《永远不要挂起日旗来》等文章，表示抗日到底的决心。

12月17日，柳州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广西部队进行“桂南会战”，以昆仑关地区为主战场，向进犯广西的日军发起反攻，收复南宁。

蒋介石命白崇禧立即制定作战方案并迅速组织实施。

白崇禧有一个极精干的参谋班子，很快就拿出一套详细的作战计划。首先是将驻广西的部队分为东、西、北三路。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统领北路，指挥第5军、第99军，做为主攻部队，重点打击昆仑关之敌，然后在东、西两路部队配合下收复南宁。

第26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指挥东路的46军及部份地方武装，在敌后进行游击袭扰，破坏邕江南岸及邕钦公路交通线。

第3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为西路指挥官，其第1纵队负责攻击高峰隘，吸引日军主力；第2纵队负责防止南宁之敌增援昆仑关。

部署即定，各部队纷纷加紧准备。官兵们都知道要打一场恶仗，心情即兴奋又紧张。

在我军秘密进行作战准备时，占领昆仑关的日军也在夜以继日地抢修工事。他们在关口周围的高地上筑起碉堡群，设

置起层层火力网，准备对这个战略要地进行长期据守，并做好迎击中国军队反攻这里的准备。

防守昆仑关一带的日军部队是第5师团的中村正雄21旅团，昆仑关上住的是这个旅团的第21联队。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看到坚固的工事体系为昆仑关险上加险，十分得意，对部下说，用中国人的话来说：这叫“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二)

12月10日，杜聿明在迁江附近的谭蓬村中一个大溶洞里，召开了第5军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在布置完作战任务之后，他庄严地说：这次战役关系到抗日战争的前途，是我国南方战场上至关重要的一战，我第5军全体将士必须勇猛作战，打出国威，军威！

会议结束之前，杜聿明带领全体军官庄严宣誓：

“一定胜利完成这次攻坚作战任务，痛歼日寇，收复昆仑关！”

杜聿明命令各部队于12月12日秘密进入攻击准备位置。

第5军是直属军委会的部队，人员素质好，装备精良。这是我国政府在抗日战争初期建立起来的我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军部下辖3个师，郑洞国荣誉第1师、戴安澜200师、邱清泉新编第22师。这支部队一直被作为“嫡系”加以爱护。此时全军上下得到了担任主攻的光荣任务，无不摩拳擦掌，准备与日本鬼子一拼高低。

12月11日，郑洞国、戴安澜、邱清泉三位师长亲自带领

参谋长和少数学指挥部人员，秘密地登上了昆仑山附近的高地，用望远镜观察地形，进一步核准进攻与相互配合的路线和方位。

望着面前这座险峻高山之上的巍峨友关。几位师长不由心潮起伏，他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在历史上，北宋名将狄青曾率军袭占这座昆仑关天险，一举平定广南，在史书上留下令后世军人们为之心醉的“三鼓破雄关”的佳话。八百多年之后的现在，中国军人又要在这里打一场恶仗，这次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存亡，同外国侵略者做殊死一搏！

第5军的作战部署是，荣誉第一师、200师为正面主攻部队，新22师为右翼迂回部队；200师副师长彭壁生率两个补充团为左翼迂回部队。军指挥所设在荣誉第1师与200师的结合部的一座高山的山洞里。

12月12日，第5军各部以夜幕为掩护，秘密进入攻击准备位置。数万部队在险峻的山岭间悄悄行进，荣誉第1师与200师的官兵们在距离敌人阵地仅三、四华里的地方隐蔽起来。

杜聿明将手中的王牌——机械化重炮旅拉到敌人鼻子底下。他将“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官兵们手拉肩扛。将大炮设置在山上。丛林和石缝中伸出排排炮口，直指日军的阵地，碉堡。

曾经留学德国深造过装甲兵作战、满肚子洋墨水的新22师师长邱清泉，率领部队克服重重困难，将他的机械化战车部队埋伏在五塘、六塘地区的丛山密林里，官兵们只等一声令下，便截断昆仑关之敌的后路。

12月15日，白崇禧发布反攻命令：乘敌后续部队未到，将进入南宁地区的日军包围于邕江南北地区歼灭之。

反攻时间定于12月18日拂晓。

12月16日，蒋介石派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济深和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由重庆直飞广西，协助白崇禧指挥反攻作战。

这一拨要员刚刚安排好，白崇禧又闻蒋介石要亲临广西。12月17日，蒋介石的飞机在桂林停稳，蒋没下飞机，便将来机场迎候的白崇禧拉上飞往前线。来到第5军后，杜聿明要向蒋汇报作战准备，蒋介石一摆手说：“先去看看老兵们吧！”

杜聿明陪同蒋介石来到郑洞国荣誉第1师驻地。这支部队全是由在作战中负过伤的老兵组成的，故称“荣誉师。”部队官兵们士气高，军事素质好，尤其是荣誉心极强，因此深得蒋介石喜爱。

蒋介石接见了师团军官和曾荣立战功的士兵代表，勉励他们一定要打好这一仗，再创新荣誉。在与被接见的官兵握手时，蒋介石看到一名年龄很小的士兵，便问他：“你也是老兵吗？”那小战士倒也不怯阵，解开上衣，露出胸前两道紫青色刀疤说：“荣誉师2团3连下士林四良，打过上海、台儿庄和保卫大武汉，立战功两次！”

蒋介石拍拍他的肩膀说：“还是个抗战小英雄！家在哪里，家里有什么人？”

小战士回答：“我是张家口人，爹被鬼子杀了，娘说赶不走鬼子不让我回去见她”。

蒋介石连说：“好！有志气！”

蒋介石走后，陈诚与白崇禧召集第5军团长以上军官开

会。这两位上将毫不客气地斥责在视察中发现的疏漏。最后，陈诚阴沉着脸，当着全体军官，严厉命令军长杜聿明必须如期拿下昆仑关，否则就提着脑袋去见委员长！

杜聿明笔挺地站在陈、白两位长官面前，神色庄严地大声回答：“是！”

在场军官无不肃然。

(三)

12月18日凌晨1时，杜聿明向第5军各部下达攻击命令。寂静的夜晚被突然而密集的炮声撕得粉碎。军和各师所属的炮兵集中火力向日军阵地猛烈轰击，昆仑关及周围各高地立时腾起团团浓烟和火光。

日军从梦中惊醒，慌乱地进入阵地，开枪开炮向我军还击。这些不知道我军确切位置的盲目射击不但没有对我军攻击部队造成威胁，反而暴露了一些隐蔽工事的位置。我军使用远程重炮一阵猛砸，敌炮火渐渐稀疏下来。

1时40分，我第一线攻击部队在战车和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向敌人阵地秘密运动。2时整，荣誉第1师和200师突击队员们一跃而起，勇猛地冲向昆仑关周围的几个高地。

凌晨2时，昆仑关日军21联队长三木判明中国军队重兵攻击昆仑关，他越级直接向第5师团长今村发电报报告并求援，今村接到电报之后大为震惊。因为自从12月7日以后，今村便不断得到情报，说南宁以北40公里一带有中国军队在运动，并有进攻昆仑关的迹象，但今村认为南宁以北地势险峻，大部队，尤其是机械程度较高的主力部队不可能顺利展

开。他判断这是中国军队在搞声东击西，迷惑日军的把式，便没予理睬。12月17日，即我军向昆仑关发起攻击的前一天，今村还命令该师团的第9旅团去进攻位于南宁西南的龙州、镇南关，眼下昆仑关告急，今村只好从南宁抽调兵力赶去增援。

昆仑关战场激战正酣。天亮时，荣誉第1师攻克昆仑关外围的金龙山、仙女山、老毛岭、441、600等高地。至中午1时，在两个主攻师的合力猛攻下，昆仑关主阵地以下的防御线开始松动。一部分日军开始向后退缩，我军见状，士气又增，越战越勇，步步紧逼。溃退之敌一部分逃向九塘，一部分向上进入昆仑关核心阵地。

在我正面主攻部队与日军激战的同时，邱清泉新22师严密注视南宁方向。古代的一个著名战法称为“攻其必救”，敌企图盘踞昆仑关控制桂南局面，对我军攻打昆仑关不可能无动于衷。

中午2时，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率参谋长舒适存到第2团前沿视察。2团正在攻打昆仑关北侧几个小山头。团长汪波一身硝烟，向师长简单汇报后，又将指挥所向前迁移。

郑洞国等人跟在2团部队后面向前走时，忽见天边飞来几架日军飞机，原来是今村求援心切，要来飞机助战。奇怪的是这几架飞机象长了眼似的直奔郑洞国这一行人扎了下来，一阵俯冲扫射，丢了十几颗炸弹，郑等躲避不及，赶忙就地卧倒。

炸弹在身边开花，机枪子弹在地上溅起缕缕泥土。趴在地上的人们都在想：“这回不知谁要倒霉了。”等敌机飞走后，人们抖落着身上的泥土爬起来，清点人数，十几个人中竟然

没有一个掉根毫毛。参谋长舒适存笑道：“都说师长是员福将，这回我们大家都跟师长沾光了。”众人闻言都笑了。

下午5时50分，第一批增援日军800多人乘着31辆汽车到达昆仑关以南的六塘。日军下车后摆开战斗队形，向昆仑关前进。

这股日军向北走出不到1公里时，忽听身后几声巨响，只见过路上的几座桥梁全部被炸断。邱清泉新22师机械化战车部队突然出现，先断了援敌退路。

接着，令日军恐怖万分的情景出现了。一辆辆战车从四面八方冲出树林和伪装物，开着火炮和机枪朝日军的队伍猛扑过来，敌人躲闪不及，溃不成军，一片片丧失枪炮之下，剩下的纷纷向公路两旁山沟和树林各自夺路而逃。

埋伏在公路两侧的步兵分队正等得心焦，见日军来了，一阵机枪、步枪、手榴弹。日军第一支增援部队就这样干净利落地被歼灭，我军在天完全黑下来前将战场清理干净。邱清泉在一辆战车中看了一下腕上那块硕大、笨重的德国教官送给他的夜光手表，这场昆仑关战役的第一个胜仗仅用1小时57分钟。

19日清晨，杜聿明将攻击重点放在位于昆仑关东北的653高地。这个高地山高坡陡，我军向上仰攻，难度很大，200多名日军据险防守，居高临下，荣誉第1师3团组织了多次冲锋都没有成功，攻击部队受到很大伤亡。

中午，百余名日军乘我进攻受挫，发起反冲锋。双方在山顶主阵地以下三十多米地段展开激烈枪战。

因山坡上没有可以隐蔽藏身的地物，我军伤亡剧增。幸亏预备营连长杨朝宣、排长杨明率突击队猛插敌山头阵地，以

刺刀和手榴弹冒死突入敌群，一阵猛杀，夺下了这个制高点，解救了危急的局势。

我军攻占 653 高地，通向昆仑关主峰的道路被打开了一条，日军三木联队长极为恐慌，组织百余名日军由昆仑关向 653 高地疯狂反扑，我军依托阵地，将敌人的进攻打退。

12 月 19 日，蔡廷锴 26 集团军和夏威 36 集团军按照白崇禧的布署，从东、西两个方向对南宁之敌发起进攻，以牵制日军增援昆仑关。

日军第 5 师团长今村深知昆仑关的重要，他将第 9 旅团调回，加强南宁的防守，同时打出了手中的一张“王牌”：在日俄战争中赢得“钢军”称号的第 21 旅团长中村正雄中将，今村命令中村正雄亲自率领该旅团的 42 联队，火速赶往昆仑关增援。

44 岁的中村正雄中将是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狂热追随者，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之后曾经去拿破仑的故乡留学军事指挥。他曾在日俄战争中为日军建立奇功，所率部队也因之获得荣誉。侵华战争中，他参加了忻口、太原、台儿庄、广州等重大战役，是日本军界中知名的战将。

接受今村师团长命令后，中村率队增援昆仑关。行至六塘以南，他下令停止前进。他以一个小队沿公路缓慢向前搜索，自己则率主力走山路绕过六塘，企图避开阻击部队，尽快赶到昆仑关。

正如中村所料。在他率队进入山间小路不到一个小时，便听见六塘公路一带枪声大作。他知道那个小队已同打援的中国军队交上了火，这支被他当做诱饵的小队八成是凶多吉少了，中村下令所率部队跑步前进，迅速向昆仑关接近。

在中村率部到达八塘附近时，只听西面山坡几声炮响，接着枪声如狂风般响了起来，中村暗自叫苦。原来邱清泉为了防止敌人迂回山路，已预先在这里设下一支部队。

中村命令以一个小队抢占就近的一个小高地，开火牵制阻击部队，自己率主力强行通过封锁线。一路上，不断有日军中弹倒地，但其他人头也不回地向前猛跑。

日军丢下一百多个尸体和伤员，终于冲过这道封锁线。20日凌晨2时，中村率队到达九塘，在与昆仑关只一山之隔时，被邱清泉新22师重兵挡住去路，两军都没有贸然发动攻击，形成僵持对峙局面。

在18日、19日两天的战斗中，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的任务，部队伤亡很大，19日晚，杜聿明命200师接替1师防守仙女山、653、老毛岭等阵地，并担任正面主攻，1师则向昆仑关两翼迂回，以形成合围之势。

20日清晨，200师部队在战车和重炮配合下，猛攻昆仑关敌人核心阵地。荣誉第1师从两侧夹击守关日军。上午7时，我军两辆战车突入关内，步兵也从东、西、北三面逼近敌核心阵地。

守关日军死战不退，几次冲出工事向我军反扑，敌空军出动大批飞机对我攻击部队轰炸扫射，我军立足不稳，已受到很大伤亡，不得不退出昆仑关。

21日、22日，200师部队继续向昆仑关猛攻。我军炮兵以精确的炸点和猛烈的火力封住了正面敌人工事中的火力，但敌核心阵地两侧高地据点中的轻重机枪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封锁了攻向关内的道路，我攻击部队一片片倒在关前，许多官兵死伤后滚下山坡。

戴安澜心急如焚，不顾战场指挥纪律所限定的师指挥员距前沿分队的距离，跑到一线攻击分队察看敌情。

敌人设在关口两侧高地的工事处在我军炮火射击的死角，大炮使不上劲，部队又难冲上去爆破，戴安澜下令停止攻击，警戒待命。

(四)

22 日深夜，军长杜聿明在荣誉第 1 师指挥部的山洞里与郑洞国、戴安澜共商对策。三位将军都认为，由于我军对昆仑关的攻势随时可能因南宁之敌的再次增援而前功尽弃，所以必须尽快拿下昆仑关，以控制整个战场形势。三人深入分析了敌情和地形，感到直接攻击昆仑关敌核心阵地欲速而不达，杜聿明决定调整作战部署，采用军事教科书上称之为“要塞攻击法”的战术，集中优势兵力先夺取昆仑关周围几个高地，斩断这几条左膀右臂，再解决昆仑关主阵地之敌。

三人又在马灯的微弱光线下研究了半天地图，杜聿明将第一个目标选在昆仑关西北侧的主要支撑点罗塘高地。他把攻取罗塘高地的任务交给了郑洞国，并命令戴安澜 200 师各团正面佯攻，牵制敌人兵力和火力。

罗塘高地上有日军一个加强中队约 200 人防守，配备轻重机枪十余挺，迫击炮 6 门。其主要任务就是护卫昆仑关主阵地。12 月 23 日，荣誉第 1 师 1 团在团长吴啸亚指挥下，首先投入攻击。两军在山岩之间展开激烈战斗。

昆仑关为中国军队重兵围攻的消息报知中国派遣军总部之后，总部严令第 5 师团务必守住昆仑关，稳定对南宁的占

领，但并没有答复关于增派兵力的请求，今村为再也派不出兵力增援昆仑关而愁眉不展。

23 日中午，担任警卫补给线任务的日军台湾旅团长盐田定七少将率兵护送运输车队来到南宁。盐田与今村是奈良同乡，又是陆军大学的同级同学，两人是多年的朋友，见盐田到来，今村赶忙置办酒菜，与盐田对酌。

盐田见今村心事重重，无精打采的样子，便问起昆仑关战况，今村便将前线吃紧，无兵可援的情况据实告诉盐田。

盐田听罢，沉吟片刻，将一大杯酒喝下肚里，爽朗地说：“既然今村君有急，我派一个联队去昆仑关增援如何？”

今村一愣：“盐田君一向海量，此话不会是酒后戏言吧？”

盐田见今村不信他的话，不禁面红耳赤，他当即传令，派押车来南宁的林义秀大佐的步兵第 1 联队赶赴昆仑关，归 21 旅团长中村正雄指挥。并说台湾旅团直属第 21 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那边由他去报告，这种临时调整兵力于非本部任务的做法，符合《步兵操典》中有关根据战斗胜利需要，灵活处置情况的原则。

今村见盐田真心相助，激动不已，连声称谢，两人又痛饮了几杯。叫来林义秀，布置增援事宜，命他即刻率队启程。

林义秀大佐率第 1 联队乘车北进，在七塘西北两公里处与邱清泉新 22 师阻击部队遭遇。台湾旅团以善长于山地作战著称，两军狭路相逢，旗鼓相当，厮杀得其为激烈。

下午 6 时，林义秀第 1 联队以伤亡 300 余人的代价杀出新 22 军重围，在九塘与中村所率的 21 旅团 42 联队会合。

在昆仑关战场的罗塘高地上，23 日一天中，荣誉第 1 师 1 团官兵多次展开强攻，都被日军挡了回来，几条攻击线路的

山坡上随处可见我军士兵的遗体。

此时师长郑洞国正在1团指挥所指挥攻击，他不时接到军长杜聿明的电话，问部队现在到什么位置了。重庆统帅部也直接给他来电报，催问战斗进展情况。

1团在攻击中伤亡很大，郑洞国命2团团长汪波率部接替1团担任主攻。几天血战中，汪波一个团兵力只剩下不足两个营，但官兵们都打红了眼，士气依然十分旺盛，汪波二话没说，痛快地接受了任务。

24日中午，郑洞国将师指挥所设在离罗塘高地最近的仙女山，亲自指挥战斗。他令汪团长将兵力分为两部，一部担任掩护，另一部组成突击队，直插罗塘主峰。

团长汪波首先将一束手榴弹和一柄大刀绑扎在身上，这意味着他将带领突击队冲入敌人阵地。600余名官兵列队站好，他走过队列，对那些身强力壮，目光坚定的重重地点一下头，那人便向前跨出一步。

队伍中，年仅16岁的小战士林四良使劲挺着胸膛，当汪波的目光从他身上迅速滑了过去时，他喊了声：“团长！”

汪波好象没有听见，继续向前挑选。林四良再次喊了声：“团长！”汪波回头狠狠瞪了他一眼，转头又向前走，眼看走到队伍尽头。林四良见不能参加突击队，又急又气，强压着声音还是哭了出来。

在漫天枪炮声中，这哭声显得很微弱，但全团官兵都听到了，所有的目光都转向这个多次参加大战、恶战，多次大难不死的娃娃兵。

汪波走了过来，伸出粗糙的大手为他擦了把脸上的泪，低声说：“军人流血不流泪，出列吧。”

林四良忍着哽咽，向汪波行了一个端正的持枪礼，大步跨出队列。

这一切刚好被赶来师里督战，就站在不远处的军长杜聿明看在眼中，他眼眶发热，为有这样的士兵而深感自豪。

下午3时，汪波带领突击队以隐蔽的动作进入攻击准备位置。郑洞国将荣誉第1师的“家底子”——德国造重型榴弹炮连、迫击炮营和两个重机枪连全部配属给2团的进攻。

重机枪被士兵们扛上离罗塘很近的前沿阵地，炮兵们经过反复勘测，将重榴弹炮调到了能有效摧毁敌人工事的位置。下午五时，兵力和火力准备就绪，只等郑洞国一声令下。

为减少敌机对攻击部队的伤亡，郑洞国将攻击时间定在黄昏。下午6时整，郑洞国下达攻击命令，我军一个连高喊杀声冲向高地，日军不知是计，从防炮洞中跑入阵地准备迎战。

仙女山炮兵观察哨在望远镜中看见敌人进入阵地，立即报告郑洞国，郑下令撤回佯攻分队，炮火准备。霎时间我军强大炮火又准又狠地覆盖在敌人阵地上。

一个个地堡、工事被炸得稀烂，日军在爆炸中伤亡严重，阵地上混乱不堪。

炮火攻击15分钟后作延伸射击，我突击营跟在不断前移的炮弹落点后面匍匐前进。接近敌人阵地时，突击营官兵跃身突入敌阵，抡起大刀见鬼子就砍。

几个日军躲在高地东南角的一个没有被炮火摧毁的暗堡中，朝着不论是我军还是正在与我军肉搏的日军，用机枪猛烈扫射，我突击营冲在前面的20多名官兵倒在血泊之中。跟在后面的突击队员毫不畏惧，果敢地猛冲过去，在前仆后继

牺牲了二十几人之后，终于冲到敌火力死角，用手榴弹将暗堡内的敌人消灭。

突击队员们搜索追杀残存的日军，躲在一个防炮洞内的十余名日军嚎叫着冲出来，我军从三面围上去，罗塘山顶这片不大的地方立时刀光闪闪，血肉横飞。

突击营中，各级指挥员都是冲锋在前，因而伤亡也最大。连长李高荫、排长喻国强、陆瑾卿等壮烈殉国，团长汪波浑身多处负伤，仍坚持指挥。

在发起攻击后1小时10分钟，我军终于将战旗插上罗塘高地主峰。守敌除两名受伤被俘外，全部被我军歼灭。

我军300多名官兵组成的突击营也只剩下43人。

攻克罗塘高地的消息迅速传遍整个昆仑关战场，我军官兵群情振奋。杜聿明传令嘉奖第2团全体官兵，颁发法币5000元，做犒赏之用。

消息传到最高统帅部，蒋介石从重庆来电对郑洞国荣誉第1师褒奖勉励。

“桂林郑师长洞国：敬亥参二电悉。0密。昆仑关之得失，影响于南宁作战者极巨。该师激战七昼夜，卒克要点，具见该师长指导有方，将士用命，深用嘉奖。仍希本一贯之精神，以歼顽敌，完成任务为盼。川。中0。艳申。令一元骥。印

(五)

我军力克罗塘高地，使昆仑关守敌十分惊恐，三木频频发报催九塘部队迅速向昆仑关靠拢。九塘日军突不出包围，九塘与昆仑山补给中断多日，日军处境越来越困难。

与九塘日军相比，昆仑关上的三木联队就更加凄惨，几乎已到了弹尽粮绝的关头。3个迫击炮小队因炮弹打光，士兵们只好将炮管埋在地下，改行干别的。

因为粮食吃光，日军不得不忍饥挨饿，不少人吃起山上的野果、野菜甚至树叶，许多人因此而患病。

日军飞机向昆仑关和九塘投下许多食品和弹药，由于我军组织机构对空射击，使其不敢低飞空投，结果使多数物资落在我方阵地。

日军许多精制的食品成为我军的盘中餐，官兵们吃着来自异国的罐头、盒饭，都说味道不错。

12月24日，对于日军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前一天即23日，林义秀联队赶到后，中村率部向昆仑关突围，突围不成，他还被流弹打中左面部。从24日凌晨起，伤口的疼痛和莫名的烦躁使中村心神不宁。

中村在23日深夜又接到三木的电报，昆仑关即将弹尽粮绝，务于今日实现会合，否则阵地不保。中村无奈，只得于24日上午再次组织部队突围。

24日白天，荣誉第1师正在准备向罗塘高地发起强攻。该师3团由团长郑庭笈率领，向九塘两侧运动，阻止敌人可能的增援，部队在天亮时摸到九塘镇外。

郑庭笈命部队隐蔽在树丛中，他爬上一棵老树，用望远镜向九塘镇内观察，发现日军在公路边的草坪上列队，有军官在讲话。

郑庭笈趁日军没有发现他们，命令第1营悄悄占领九塘至昆仑关之间的小高地；命令迫击炮连、重机枪连利用有利地形设置阵地。

上午8时，日军的队伍走出九塘营地，郑庭笈一声令下，我军迫击炮、机枪、步枪一起开火。日军猝不及防，顿时乱做一团，许多人死于我军枪炮之下。

中村正雄将指挥刀一挥，稳住部队，随即拉开阵势向郑庭笈团阵地发起攻击，就在攻势刚刚展开时，一颗迫击炮弹在距中村10米处爆炸，中村感到腹部一热，知道自己被弹片打中。

军医跑来包扎伤口，42联队长板田元一大佐问中村是否继续前进，中村咬着牙，豆大的汗珠从额头流淌下来，他点点头，示意整个旅团由他指挥，继续前进。

郑庭笈团兵力不满3个营，在日军攻势下渐渐不支，战至11时，忽听身后响起枪声，子弹打得树梢直掉，郑庭笈发现昆仑关上的三木联队会合心切，竟派兵下山接应来了。

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郑庭笈率部撤出战斗。九塘日军以不足两个联队的兵力与三木联队在昆仑关会合。士兵们将重伤的中村抬上昆仑关核心阵地内。

中村睁开眼时，见到昆仑关主阵地内一派惨象。由于子弹所剩无几，许多日军用刺刀削竹子当武器，多数日军衣不遮体，加之困饿交集，一个个形同活鬼。

三木跪在中村的担架旁说：“旅团长如再不来，我就要焚烧军旗了。”

焚烧军旗是日军最严格的战场纪律，其意思一是神圣的军旗是天皇亲自所赐，是天皇和大日本帝国荣誉的象征，决不能落于敌人之手，二是皇军要同军旗共存共亡，焚烧军旗的同时，持这面军旗的军人就要准备以死向天皇效忠。

军医从后面赶上来，立即让三木找地方为中村做手术，三

木找了一处炮弹不易打到的山岩旁一间旧民房，军医用消毒白布稍加遮掩，便为中村做起开腹止血、取弹片的手术来。

傍晚，郑洞国荣誉第1师向罗塘高地发起猛攻，杜聿明组织军属炮兵火力对昆仑关及附近其它高地之敌作压制射击。炮弹带着刺耳的呼啸掠过昆仑关，军医边做手术边庆幸这里还算安全。

天暗下来后，军医命人打着几支手电筒照明继续手术。取出中村腹中银洋大的弹片刚要缝合，事有凑巧，一颗炮弹在这间临时手术室附近爆炸，掀起的石块砸穿房子的草顶，手术台立时落满石块和灰尘。

此时中村处于全麻状态，浑然不觉，军医连声叫骂，不得不一点点冲洗刀口，大大延迟了手术时间。

手术一直到晚上8点30分才做完，军医摸着中村微弱的脉搏，无可奈何地叹息道：“只恐怕治好伤，治不好命了。”

24日夜晚，我军在收复罗塘高地后，以零星炮火向昆仑关等敌人阵地做袭扰射击，中村正雄于凌晨3时醒来，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无力说出，两行眼泪从眼角流淌出来。此时，这个一生奋斗，致力于完成自己做为天皇军人神圣使命的中将军官，到底想说什么呢？

25日早5时18日，中村正雄的脉搏停止跳动。军医用一条手术布单将他遮起来。坂田元一发电报向今村师团长报告中村的死讯。

(六)

12月25日，正当我军步步逼近敌核心阵地，收复昆仑关

近在咫尺时，又发生了一个意外情况：日军盐田台湾旅团的第2联队赶来增援，昆仑关战局再次出现反复。

25日上午，3000多名日军迂回到战场左翼傅仲芳99军92师防守的高山岭、桔子岭一带阵地。激战至中午，我军防线被敌突破。日军以500余人占领我军阵地，另2000余人强行突入我军包围圈与昆仑关之敌会合。

昆仑关之敌本已是苟延残喘，朝不保夕，这时如见救星，死灰复燃。27日，救援军千余人，在空中和地面火力配合下，向昆仑关西南441高地猛烈反扑，守军苦战4小时后伤亡殆尽，阵地落于敌手。

面对这一严重情况，杜聿明决定收缩兵力，加强主攻部队力量。他派叶肇66军的官伟159师接替200师在昆仑关外围的防守，命200师逐次攻占昆仑关东北侧各据点。

441高地为我军右翼的重要支撑点，必须尽快夺回，杜聿明命荣誉第1师担此重任。郑洞国将任务交给了第1团长吴啸亚。

12月29日，1师1团和200师在我优势炮火配合下，同时向441高地和界首高地发动强攻。官兵们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网，不顾重大牺牲，向这两个山峰杀去。

吴啸亚1团将441之敌压至高地南侧，敌我各占据反斜面阵地，相距不足百公尺，正在我军设置工事和掩体时，200余名日军冲了过来，双方在主峰两侧展开激烈肉搏。

郑洞国在441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指挥，透过望远镜，只见漫山翻滚的硝烟中不时有浑身是血的我军士兵在奔跑射击，许多士兵极其猛烈地与日军拼杀。仗打得如此残酷，我军官兵依然士气旺盛，郑洞国非常感动。

29日下午，郑洞国接到杜聿明的电话，200师对界首的攻坚接连受挫，伤亡惨重，已无力再组织攻击，问郑洞国有什么办法。

郑洞国清楚，界首是昆仑东北的险要高地，高度超过昆仑关，不论夺取还是守住昆仑关，控制界首都是至关重要。200师强攻受挫，杜军长心中焦虑是不言而喻的。

考虑片刻之后，郑洞国毅然说：仗打到关键时刻，不得不做最后一搏，我师虽也伤亡惨重，但郑庭笈3团刚归回建制，尚有一定攻坚实力，可调去攻打界首。

杜聿明见郑洞国在成败关头以大局为重，心中感谢，口中称好，命将3团调归200师戴安澜师长指挥，马上投入战斗。

郑洞国打电话将决定通知3团后还不放心，师指挥所离3团指挥所很近，他把郑庭笈叫来，当面交代一番，最后加重语气说：“能否迅速夺取界首，事关全局，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攻克它，如果作战不力，定将以军法论处！”

郑庭笈口气极为坚定地说：“请师长绝对放心，如果拿不下这个阵地，不用军法，我自己杀头！”他庄重地向郑师长行了军礼，转身大步赶回团里了。

迎着黄昏如血的夕阳，第3团官兵顽强地向界首高地发起一次次攻击。一批批怀抱炸药包和集束手榴弹的士兵在接近敌人地堡的途中中弹牺牲。仅一个小时下来，9个步兵连中有7个正副连长伤亡。

为尽快解决战斗，减少伤亡，郑庭笈冒险使用了一个战术。当夜，他挑选了一支突击队，在夜色掩护下，分组悄悄爬上山去，在离敌阵地前沿不远处潜伏起来。

30 日拂晓，郑庭笈联系炮火向界首敌阵地轰击，郑庭笈命炮兵只集中发射两排炮弹，在第二排炮弹爆炸的同时，突击队各小组飞身跃入敌人阵地，在日军还没有离开防炮洞之前，将手榴弹从地堡入口塞了进去。

这个战术具有很大的危险，一旦炮弹在落点和发射时间上发生偏差，就会造成自相伤害，但郑庭笈成功了，突击队如同神兵天降，日军根本来不及反应过来便被堵在地堡和防炮洞内，几声爆炸后，敌火力点被彻底摧毁。

高地上的日军陷于混乱，哇哇叫着端起刺刀冲来上拼命，我突击队员毫不含糊，抡起大刀横劈竖砍。这时后续部队潮水般涌上来，至天大亮时，界首之敌被我全歼。

界首易手，昆仑关顿时失去屏障，我军迅速修复工事，居高临下，鸟瞰昆仑关，轻重机枪，迫击炮打得得心应手。

(七)

界首报捷的同时，441 高地鏖战正苦。30 日昼夜，日军陆空协同反扑 441 及附近几个小高地，1 师 1 团死战不退，伤亡剧增。战至上午 9 时，全团每连平均仅剩一、二十人，连长、排长大部分伤亡，日军乘我疲惫不堪夺走两个山头，我军咬紧牙关，坚持反攻，毙伤敌人百余名，又将阵地抢了回来。

12 月 31 日，杜聿明命令在两天中连克南北同兴、界首东南各高地的邱清泉新 22 师部队超越 200 师阵地，围攻昆仑关。

新 22 师的邓军林团冲在最前面，攻打关口时，喊杀声，

枪炮声在群山之间久久回荡。至午前 11 时，该团分别将昆仑关东、西、北阵地攻克，消灭守敌大部，完全占领了昆仑关。

残敌 200 余人弃关南阵地向九塘溃逃。我军士兵冲入敌核心工事，缴获了一面烧得剩下半面的日军军旗。

桂林行营，12月 31 日深夜。

陈诚、白崇禧接到杜聿明发来的攻克昆仑关的电报，指挥所的参谋人员们情不自禁地发出轻声的欢呼。

陈诚愁眉未展，对白崇禧说：“健生兄，你看今村这老鬼子能让咱们过好这个年吗？”

白崇禧说：“是呵，他自己过不好，还能让咱们过好吗？”

正如陈、白所料，克复昆仑关第二天，1940 年元旦中午 12 时，日军第 5 师团长今村调集 800 多名日军，加上从昆仑关逃出来的 200 多人，向昆仑关发起反扑。

日军攻打昆仑关的战术与我军极其相似，也是先攻克昆仑关周围的高地，算是“英雄所见略同”吧！441 高地因其对昆仑关的支撑作用而首当其冲，千余日军将兵力集中起来，在飞机的配合下，由石桥、上寥、那林三面，向 441 高地围攻过来。

441 高地在前面的战斗中被我军炮火轰得剥掉了一层皮，高地表面的工事早被砸得稀里哗啦，为我军防守带来困难。敌机在高地上空来回盘旋轰炸，防守 441 高地的荣誉第 1 师 1 团补充营的 400 多官兵抗击着天上和地面的双重攻击，忍受着不断增加的伤亡，顽强防守着。

从中午 12 时到下午 4 时，我阵地官兵在敌几个集团冲锋中伤亡殆尽，许多阵亡官兵的尸首无法收拾，伤员也无法及时运下来，剩下的 40 余名官兵被迫退至高地北侧一个保存较

为完好的防炮洞中待援。

441 告危！郑洞国无可奈何，只好将全师唯一的机动部队，2团剩下的300多名官兵拉上去。他将这些兵力编为3个连队，由团长汪波率领，在黄昏时分爬上441高地，与1团剩下的兵力一起，反击敌人的进攻。

整整一个通宵在双方的激战之中渡过，敌人几度已经攻上高地，都被我军硬压了回去，阵地仍掌握在我军手中。拂晓时，日军做短暂休整，没有再往上攻，汪波团长乘此时机查看一下高地各处。

汪波深一脚、浅一脚地环绕高地巡视，晨雾朦胧之中，高地上到处躺满了呈各种姿式、形状的敌我两军的尸体。汪波感到这些尸体仿佛是一群正在睡觉的活人，好象偶尔还能看见他们在翻身，听见打鼾和梦呓。汪波虽身经百战，却还是感到一阵阵毛骨悚然。

元月2日，日军继续以飞机配合步兵向高地猛攻，守军伤亡猛增。战至中午时分，阵地上我军只剩120多人了。敌人将高地两侧山头占领，向主阵地逼了过来。

就这样一分钟、一分钟，一个人、一个人地消耗到下午5时，我军官兵杀红了眼，只要不死就继续拼，阵地仍然在我军手中。日军见屡攻不克，竟然丧心病狂地调来化学分队，施放窒息性毒气，随后再进行强攻。因风向关系，高地西南角阵地中毒最重，30余名官兵窒息而死，阵地上守军越来越少，情况非常危急。

这时，连惯打硬仗，从不叫苦的团长汪波也沉不住气了，连连打电话向郑洞国告急，最后哀声请求说：“师长，我实在顶不住了，弟兄们快拼光了，你就把我们换下去吧！”

师指挥所。参谋长舒适存在师长旁连听到汪波的请求，他以强硬的口气对郑洞国说：“师长，汪团不能撤，阵地一丢麻烦就大了，咱们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摔下这句话，舒适存扭头便走了。他生怕郑洞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做出错误的决定。

郑洞国在汪波和舒适存两面夹击之下一时不知该怎样说。他深深了解汪波，这条铁汉子不到万不得已是决不会提出撤退的，但眼下请示杜军长从他部调兵已来不及，自己已是连老本都赔上了，再也无兵可调，万一 441 高地失守，不但全师数日血战成果付之东流，整个战局也将受到严重影响。

想到这里，郑洞国狠下心，以斩钉截铁不容置否的口气说：“汪团长，现在敌我已战至最后关头，坚持到底就是胜利，你一定要死死顶住，等待增援，没有命令决不准放弃阵地！”

汪波还在电话中支吾，郑洞国厉声命令道：“就是剩下一兵一卒，你也要给我顶住，丢了阵地我砍你的头！”

军令如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汪波横下一条必死的决心，坚定地答了声：“是！”便到阵地督战死守去了。这时敌人的又一轮进攻刚刚结束，阵地上只剩下北侧一角和 30 多个满身是伤的士兵了。

郑洞国扔下电话，走出指挥部的山洞，想去呼吸一下清爽一些的空气，刚迈出洞口，不由愣住了。

只见一支由师部特务连、传令兵、伙夫、卫生员、轻伤员，还有几个根本不是兵的挑夫组成的 180 多人的队伍站在他面前。

更令郑洞国惊异的是，带领这支队伍的军官，竟是他的参谋长舒适存。舒适存全身披挂，一付下级军官随时准备冲

锋陷阵的样子，令郑洞国激动万分，他上前握住舒适存的手，一时不知该说什么，舒适存说：“请师长下命令吧！”

这支队伍利用暮色的掩护，悄悄绕到 441 高地西、南两侧，随之以突然的动作发起猛攻。刚刚静下来的高地顿时枪声大作，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

攻上 441 高地的数百名日军早已疲惫至极，他们根本想不到我军还有能力发动如此猛烈的反击。日军阵地倾刻瓦解，我军猛冲猛杀，日军且战且退，逃下 441 高地，向九塘方向溃退，我军追击两公里后返回 441 高地。

我军新 22 师部队在 31 日夺下昆仑关后的 3 天中赶修工事，补充给养，调整兵力，逐一巩固了周围高地的防守，进攻 441 之敌被击溃之后再也无力组织新的进攻；杜聿明为扩大战果，命新 22 师和 200 师部队向九塘之敌追击。

元月 4 日，两军激战九塘，我军官兵见胜利在望，越发英勇无比，日军仓惶防守了三个小时，损失百余人，再也无力坚持下去，于午前 11 时杀开一条血路向南宁方向溃逃。

就在杜聿明军长下令停止追击，战斗即将结束时，一枚日军迫击炮弹在一直坚持一线指挥的 200 师师长戴安澜身边爆炸。弹片直穿入他的左背，造成重伤。

(八)

元月 5 日清晨，天气晴朗，连日里不绝于耳的枪炮声一朝停止，人们反而感到不太习惯。杜聿明亲自送戴安澜上车，去柳州医院治疗。

戴安澜躺在一副军用担架上，被两名士兵抬出 200 师指

挥部的帐篷。

因为前线条件太差，戴安澜身上的伤口已经开始感染。他浑身滚热，只一夜间，已烧得满嘴水泡。

上车之前，戴安澜将一个笔记本交给杜聿明。汽车开走后，杜聿明打开本子，见厚厚的全是日文，从记载日期可以看出这是本日记，在末页，有戴安澜写得龙飞凤舞的笔迹。

“北宋皇祐四年，大将狄青元夜夺昆仑，吾辈拟于此次元日夺占昆仑关，为中华民族历史再写一个英雄故事！”

杜聿明将这本日记交给随军的日语翻译，嘱他将日记内容翻译出来，便与郑洞国、邱清泉一起，登上昆仑关巡视。

大战后的昆仑关战场一片狼藉。满山遍野树木野草被炮火洗劫得面目全非。两军战死者的遗骸还没有清理完毕，日军尸体被抬入一个大坑中焚烧，一股焦苦与血腥的气味在晨风中飘浮。

昆仑关之战是中日两日精锐部队之间的一场恶战，号称“钢军”的日军第21旅团被我军基本消灭，我军还消灭了台湾旅团第1、第2联队大部及其他日军部队兵佐。整个战役共毙敌4300余名，伤敌计在5000余名。

日军阵亡军官如下：

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

42联队长板田元一大佐；

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

副联队长生田藤一大佐；

第1大队长杵平作中佐；

第2大队长宫本得中佐；

第3大队长森本宫中佐；

.....

而我军在这场大战中，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在担负主要作战任务的第5军，阵亡人数为5293，受伤人数为11065。

这天晚上，第5军军长杜聿明夜不成寐，他披衣下床，俯案挥毫，为在昆仑关之战中阵亡的将士写了一幅挽联。

血花飞舞，苦战兼旬，攻克昆仑寒敌胆；
华表巍峨，扬威万里，待清倭寇慰忠魂。

杜聿明想，等打完仗，一定要在这雄关之上建立一座纪念碑，永远纪念这些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而战死的英烈们。

抗战胜利之后的1946年，杜聿明将军专程返回昆仑关，亲自组织在昆仑关之阳建起烈士陵园，同时建立起一座造型巍峨、气势雄壮的纪念塔，他书写于昆仑关胜利之日的那幅挽联刻于塔旁汉白玉石柱。

杜聿明将军了却一桩心愿，昆仑关永远铭记下英烈的名字。

(尾 声)

我军力克天险，收复昆仑关的消息普天传扬，全国军民为之振奋。大批战利品运至大后方城市巡回展出，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

重庆最高统帅部传令嘉奖并拨资犒赏第5军参战将士。何应钦亲赴桂林，代表党帅部向杜聿明、郑洞国、戴安澜、邱清泉等作战有功人员授勋。

何应钦听到杜聿明等人关于昆仑山作战情况的汇报，尤

其是我军将士英勇顽强，杀敌夺关的英雄事迹，十分感动。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后，蒋介石很感兴趣，指示第5军派人来重庆详细汇报昆仑关战事。

第5军参谋长黄翔将军赴重庆汇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亲自召见，并设象征最高规格和非同寻常关系的家宴款待。

席间，蒋介石多次称赞第5军打得好，是一支英勇顽强的部队。

饭后，黄翔将戴安澜送给杜聿明的那本日文笔记连同翻译为汉文的复本呈给蒋介石。蒋介石见中文复本封面说明：

“日军第5师团21旅团长中村正雄战场日记”

夜阑人静，蒋介石挑灯细看这本日记。蒋介石曾两度赴日本留学，懂得日文。他把原本与译本对照来看，感到颇有意思。中村的最后一则日记深深地吸引着蒋介石，他将原本与译本反复对照，看了数遍，这条写于“1939年12月23日夜”的日记译文如下：

“帝国皇军第5师团第21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钢军’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军更强的军队……”

蒋介石披衣走出卧室，走到这座法式小楼外，在夤夜如水的月华中，漫步沉思良久……

六、印度、缅甸： 大远征



引子

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纷纭繁杂的战事多少使各国的首脑和人民的神经有些麻木，但在 1941 年 12 月 7 日上午，以各种语言向世界广播的美国之音播音员那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仇恨的声音仍然让全世界的听众绷紧了神经。

“今晨 8 点，日本未经宣战，以海军舰载飞机对位于夏威夷群岛珍珠港的美军太平洋舰队进行了突然袭击，美军官兵伤亡严重，太平洋舰队多数舰只、飞机被击毁、击伤，详细的伤亡和损失情况尚在统计中……”

在这次突袭行动开始两小时之后，日本天皇裕仁颁布诏书，对英国和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经过二十余天的酝酿，1942 年元旦，美国、英国、苏联、中国等 26 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同签订了对以德国、意大利、日本为轴心国的世界法西斯阵营采取共同军事行动的宣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由此诞生。

各国代表在划分世界版图上反抗轴心国的作战区域时，于元月 4 日，确定成立包括越南和泰国在内的中国战区，由中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将军为中国战区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兼该战区所驻美军的司令。

偷袭珍珠港获得成功，日军给美军太平洋舰队以毁灭性的打击，一举夺取了在太平洋的制海权，为其占领东南亚国

家和地区打开了海上通道。

从偷袭珍珠港成功之日起，日军陆军以四路大军分头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以及荷属东印度等地，实现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侵略扩张计划。

1942年1月20日，日军由泰国越过泰缅边境，向缅甸发起攻击。直接威胁着对我国抗战至关重要的，被称之为“输血线”的滇缅公路。使我国统帅部大为震惊。

为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国际社会一直在向我国提供着一定数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我国也不惜重金多方购置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由于日军封锁了海上通道和大部分陆上通道，空中运输费用昂贵、运量又小，所以大量物资要经过昆明到仰光的滇缅公路输入我国。

滇缅公路由此成为沟通我国与盟国联系的唯一一条国际补给线。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由于中英的共同利益，两国曾于1941年12月26日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根据协定，一旦发生战事，中国将派军队进入缅甸，与英国军队一起作战，保卫缅甸和滇缅公路的安全。

蒋介石和史迪威为这支拟议中将要入缅参战的部队取了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日军侵缅，英国守军一触即溃，日军长趋直入，2月1日，日军从仰光附近海面登陆，仰光告急，拟议中的中国军队入缅作战成为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2月3日，英国政府正式要求中国政府，迅速派兵入缅。

重庆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由卫立煌为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的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辖第5军、第6军、第66军共10万兵力，从云南开入缅甸，由史迪威将军指挥

作战。

(一)

1942年2月16日，云南省保山县热闹非凡，当地民众自发地排起长长的队伍，敲锣打鼓，为一支军威严整，士气高昂的部队送行。

这支部队便是中国远征军第1路军的先头部队，第5军的200师。当地民众无人不知，这是一支战功卓著，尤其是在昆仑关战役大败日军，名扬天下，全部机械化装备的精锐之师。

时年38岁的200师师长戴安澜此刻心情复杂，能参加远征军出国作战、为国扬威，这使他感到自豪，但想到出国作战艰险重重，他心中又感到不安和沉重。

由缅泰边境和仰光海面侵入缅甸的日军共有4个师团，兵力优势于我军。缅甸属亚热带山岳丛林，自然条件恶劣，给大部队行动和后勤保障带来诸多困难，最令人担忧的是此次出国作战是由英国政府提议，作战期间又要受美军将领指挥，美英各出于本国利益，在远征军的作战部署和兵力使用方面难保不出偏差。所有这些不利因素，使远征军在缅甸的前景令人感到凶多吉少。

戴安澜正想着，汽车驶到由当地民众搭起的“壮行门”前，几位老者恭请戴安澜下车，向他敬壮行水酒。戴安澜心中卷起一阵热浪，他接过酒碗，一饮而尽。

生为堂堂中国军人，又恰逢敌寇犯我国土的战争年代，抗敌报国，血洒沙场理当义无反顾，莫说前程莫测、危机四伏，

纵然是刀山火海，也挡不住我正义之师、英雄之师的脚步！戴安澜见一旁备有纸墨，乃上前提笔蘸墨，不暇思索，龙飞凤舞，一挥而就，老者和官兵们屏息细看后，不由齐声喝彩。

但见白雪的宣纸上写出一首七言绝句：

“窄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澄清宇宙安黎庶，力挽长弓射夕阳。”

进攻缅甸的日军是陆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憲二郎率4个师团16万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海空军配合下，短短两个月便横扫马来半岛，一路上，除了一些没有多少军队的小国，就是无心抵抗的英军，日军所向无敌，气焰极其嚣张。

3月1日，饭田司令官在泰国接到情报，中国远征军已经进入缅甸。他立即召开军事会议，要求在仰光登陆的部队尽快攻克仰光，按原计划分三路由北向南攻占缅甸全境。他命令部队快速展开行动，与中国军队抢时间，将战线尽量向缅甸北部压。

3月1日，戴安澜200师到达缅甸北部的腊戌。腊戌是个风景秀丽的小城，盟军驻缅参谋团就驻在小城西郊。在200师到达这里当天，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已由一班人陪同着来到这里。得知200师到达，蒋立即召见了戴安澜。

见面之后，蒋指着戴的左背问：“昆仑关上那只日本蚊子现在还作怪吗？”

戴安澜听后先是一愣，随即不好意思地笑了。原来他在昆仑关战役胜利前夕，率部追歼日军时被炮弹炸成重伤，何应钦代表统帅部去参战部队受勋时他仍在医院治疗，何专程

去医院向他授勋，并转答了蒋对他的问候，他请何转告蒋，不妨事，不过是让日本蚊子叮了一口。

陪同蒋介石接见戴安澜的第5军军长杜聿明向戴介绍了日军15军部队正在围攻守卫仰光的英缅军，预料仰光不日将被攻克的情况，他命令200师立即启程，赶赴位于仰光北侧180英里的同古，阻击日军北进，掩护远征军后续部队开进。

杜聿明布置完任务后，一直没有插话的蒋介石对戴安澜说：“英军一溃千里，你师孤军深入，我们的后续部队还远在国境之内……”他略停了一下，问戴安澜，“你看同古能守得住吗？”

戴安澜坚定地回答：“这次远征，是我国自唐朝以来首次扬威国外，200师为能担此重任而深感光荣，请委座放心，就是战至一兵一卒，也必死守同古！”

辞别蒋介石和杜聿明后，戴安澜立即回师部组织部队急行南进。3月8日，全师到达同古时，得知仰光已于当日失守，而原来约定与远征军共守同古的英缅军一个旅已撤出同古。戴安澜早知英缅军没有战斗力，根本没有指望他们，忙安排部队昼夜修筑工事，准备迎敌。

攻克仰光之后立即杀奔同古而来的是日军第55师团，该师团是三路中的中路，师团长竹内宽中将已得到我军抢占同古的情报，他不住催促部队加快行军速度，尽早赶到同古，趁远征军立足未稳加以消灭。

(二)

3月18日拂晓，日军搜索队200多人，乘着摩托车沿公

路侦察前进，进入了我军同古防线的前哨阵地皮尤河。

守在这里的部队是 200 师摩托化骑兵团。官兵们埋伏在公路两侧，听着日军摩托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

摩托车队刚刚驰过皮尤河大桥，只听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皮尤河大桥应声塌落。随着爆炸声，我军向日军猛烈开火。

日军受到伏击，昏头转向，乱做一团，混乱中已有百余人倒地毙命，其余的向公路两侧树丛中隐蔽顽抗。缅甸的热带丛林枝叶茂密，一时间双方互不见影，打游击一般的混战起来。

战斗进行了 3 个小时，日军丢弃 120 具尸体，向森林深处逃跑，我军皮尤河伏击战胜利结束。在打扫战场中，从一名日军少尉尸体上搜出一只褐色文件包，见内有军用地图及其他文件，便立刻交到师部。

戴安澜称赞皮尤河前哨战打得好。通过翻译得知这名死去的日军少尉名叫矶部一郎，属 55 师团步兵第 112 联队。文件包中有对我军极为重要的缅甸日军兵力配备要图和记录作战计划的笔记本。

皮尤河前哨战歼敌的消息传开，驻缅英军总司令亚力山大感到又惊奇，又敬佩。他下令改善对远征军的后勤供应，尽可能满足需要。

日军第 5 师团长竹内宽中将得知搜索队遭到伏击，知道中国军队已经在同古做好战斗准备，他下令以两个联队的兵力，于 3 月 20 日向同古发起进攻，同时联络空军配合步兵作战。

3 月 20 日天刚亮，从远处飞来一群日军飞机首先划破了

同古城寂静的清晨。从第一声爆炸起，这座满目苍翠的小城陷入漫漫战火之中。

日本第 55 师团长竹内指挥部队，采取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向同古扑来。第 55 师团没有赶上参加仰光攻城的正面作战，头功被别人拿走，此次进攻同古，竹内使出浑身解数，严密组织攻击，想尽早消灭 200 师，奠定自己在缅甸作战中的英雄地位。

戴安澜十分熟悉日军这套惯用的攻击战术，他指挥部队沉着应战，打退日军一次次集团冲锋和各路同时进攻。战至黄昏，日军仍被挡在外围阵地前面。

20 日战斗中，日军损失 400 多人，在天黑之后退了回去。第 15 军司令官饭田于深夜赶到 55 师团驻地，听了竹内的汇报后虽口中斥责他指挥无方，但心中清楚 200 师决非一般中国军队可比，是一支装备好，士气高，战斗力极强的部队，55 师团不是对手不足为怪。21 日，由饭田亲自组织攻击，他将已跟上来的日军东路 15 师团和西路 33 师团布署在古同两侧，55 师团集中兵力攻打正面，以三个师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对同古再行强敌。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昼夜，200 师面对强攻，毫无惧色，充分发挥战车、火炮等重型武器的威力，尽管伤亡不断增大，但全师官兵仍顽强地将日军阻挡在城外。

一天的攻坚作战毫无进展，饭田十分气恼，心生毒计。

3 月 22 日中午，饭田在命三路日军继续强攻城防的同时，派两个联队的兵力，在缅甸人带领下，从密林中秘密插入 200 师背后，偷袭同古北部的克容机场及铁路线。

担任城北防守的是 200 师工兵团，因其他防线战斗激烈，

该团不断被抽调分队执行爆破，构筑工事等临时任务，团部所辖的兵力只有两个半营。日军从下午3时发起攻击，工兵团拼力死守，由于众寡悬殊，该部伤亡惨重，守至晚9时，克容机场被日军占领。

克容机场和同古以北铁路是200师与后方联系的唯一通道，日军偷袭得手，切断200师退路，同古的形势陡然严峻起来。

22日深夜，戴安澜无法入睡。200师已身陷日军重围，明日必有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他冷静分析了战场形势，考虑好了部队守城的战法，同时下定了拼将一死的决心。

做完这一切，他起身下床，在烛光之下给远在故乡的妻子王荷馨写了一封遗书。

亲爱的荷馨：

余此在奉命固定同古，因上面大计未定，与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心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家战死，事极光荣……

海鸥手启

三月二十二日于同古

戴安澜自名“海鸥”，以激励自己迎风破浪，展翅翱翔。此时写完遗书，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心中反而平静下来。走出营帐，巡视部队宿营地，见军官们大都没有睡下，便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开会。

几分钟之后，军官们陆续到齐。戴安澜向大家介绍了200师目前所处的危险环境，布署23日防守作战的战斗要点，最后，他向军官们讲诉了自己死守同古，不辱使命的决心。

军官们已经知道目前局势的严重，看到师长坚定的决心，

纷纷表示愿同师长一起死拼到底。

为了在激战之中指挥有序，戴安澜从自身做起，指定一旦阵亡之后的代理指挥人员。他指定由副师长高吉人为代理人，如高也遇不测，则由步兵指挥官郑庭笈接替指挥。

这个夜晚，200师从师长到排长、班长，每一级都在郑重宣布自己的代理人。全师官兵都沉浸在誓与同古共存共亡的悲壮气氛之中。

同一天夜晚，设在漂贝的中国远征军指挥部内灯光通明。史迪威与杜聿明双双站在一张巨大的地图之前，就同古作战问题发生激烈争执。

这个被美国总统罗斯福冠以“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中国战区参谋长”、“租借物资总监督”、“同盟国战争委员会美国代表”等一堆头衔的史迪威，在来华任职之前不久，刚刚奇迹般地由负责情报和参谋工作的上校一跃而升为中将。蒋介石对他的尊敬多来是出于中国对于大量美国先进军事装备的需要。而史迪威来华不久便暴露对军事指挥才能方面的薄弱，和在性格方面的偏执。

史迪威的意图是以中国远征军为主力，反攻仰光，将日军全部赶出缅甸，出于这个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考虑，他坚持要200师在同古坚守待援，命驻缅英军侧击日军，援助200师，同时要求目前已经越过中缅边境的廖耀湘新编第22师火速增援同古。

而杜聿明感到史迪威的意见既不切实际，又极其危险。首先是英军战斗力极差，平时有战斗就让空军助阵，但日军登陆不久便将英国驻缅空军基地连同40多架飞机一同摧毁，这

些老爷兵听见日军来了跑得比兔子都快，怎敢指望他们去解救同古之危？其次是如新 22 师仓促增援，很可能会上瘾于使用围城打援战术的日军伏击，将增援 200 师的重任仅寄托于此是很危险的，搞不好将使两支部队俱遭毁灭。目前形势之下，反攻仰光条件根本不具备，将作战总意图定于反攻仰光，对于目前兵力使用和对同古作战的把握是危险的，因此杜聿明力主先将 200 师撤离同古，再做打算。

史迪威以联军参谋长身份压杜聿明服从，杜则坚持不能让 200 师勉强坚持直至全军覆没，二人争执不下，时间在飞快地流逝着。

当一轮新的太阳从山岳丛林的晨雾中蹒跚升起时，激烈的枪炮声已经响彻同古。

(三)

为了拔掉同古这颗钉子，为大军北进扫平道路，日军第 15 军司令官饭田悌二郎集中了所辖 4 个师团中的 3 个师团，将同古城除了沿色当河的一面之外，团团围住。先是飞机大炮轮番狂轰滥炸，接着是几面日军同时猛烈进攻。同古城区在炮火之中已变成一片废墟，街道上横躺竖卧着一棵棵被炸断的大树，昔日美丽安静的小城变得满目狼藉。

饭田司令官在同古南面的一座小山上督战。他不时用望远镜透过树丛向城内张望。不断打电话催促各路部队加快攻击速度，加大攻击强度。在他心目中，200 师这支部队已经被他击败，而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在蹂躏一个失败者，如同猫在耍弄一只被它抓住的老鼠，他要尽情地虐待它，直至它

最后的死亡。

很少有人知道，饭田司令官对 200 师的仇恨还有另外一个特殊的原因。

1939 年冬，中国军队血战昆仑关，由 200 师参加的正面主攻部队苦战十余天，消灭了日军第 5 师团第 21 旅团大部，并将该旅团长中村正雄击毙。

中村正雄是日军很少的死于战场的中将之一，更重要的是他是饭田司令官夫人的胞弟。饭田夫人在国内闻知中村的死讯之后悲伤至极，他给远在国外带兵打仗的丈夫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在这封几处被泪水模糊了字迹的信中，她再三哀求丈夫，“回来吧，不要再打仗了！”饭田气愤地撕碎了信纸，大喊：“报仇！只能是报仇！”

此时，仇敌就在面前。

从 23 日清晨开始，日军发起一次比一次更凶猛的进攻。下午 2 时，一股日军在坦克掩护下攻近我城西阵地。598 团副团长黄景升身先士卒，抱着一挺机枪率领部队将敌人击退，自己不幸中弹殉国。

27 日，攻击 599、600 团阵地的日军施放窒息性毒剂，致使我军许多官兵中毒身亡。戴安澜急调预备队戴防毒面具增援，将敌人打了回去。

28 日，日军 3 个联队从城南森林蜂涌而来，戴安澜一面组织部队顽强压抑敌人攻击，一面下令燃起森林大火阻前进，士兵们用汽油瓶等易燃物品掷入树林中，不多时，火借风势燃烧起来。3 月下旬正值当地旱季，森林干燥易燃，没多时就火光冲天，烧死日军无数。

200 师顽强坚守到第 9 天，打死打伤日军 2000 余人，自己也有很大伤亡。戴安澜多次调整布署，预备队已经全部用于补充伤亡大的阵地。由于伤员不断增加，药品也开始紧张。日军仿佛打不完似的总是整集团的往上冲，攻势不但不减，反而越来越加强了，戴安澜心中非常焦急。

虽然戴安澜在向杜聿明上报情况时并不提一个“撤”字或请求增援，但深知 200 师此刻处境的杜军长依然忧心如焚。他知道，这支孤立无援的部队会默默地打到全部阵亡。他刚刚接到情报，由于日军进攻不顺利，伤亡较大，饭田将在仰光的总预备队 56 师团也调到同古前线，敌我兵力更为悬殊，200 师处境更为危险，杜聿明再也不能忍受史迪威的固执和专断了。

这天深夜，蒋介石在重庆的官邸中收到杜聿明直发给他的密电。

蒋介石披上衣服，独自在卧室外的客厅里来回踱步，陷入沉思。

1942 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年头，政府虽将财力几乎全部用于战争，但仍无法满足庞大的开支，我国迫切需要国际上的援助，而经济大国之中只有美国没有直接陷入战争，可以较多地给予中国以军事和经济上的支持，但美国却借此在亚洲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强行施加自己在各个领域中的影响。史迪威在缅甸独断专行，令人心中窝火，但他又不好撕破脸皮搞僵了关系。

蒋介石苦苦思索，不知该怎么办。这时他想起了戴安澜，想起了这个年轻将军所率领的我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军队，

人，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宝贵、更重要呢？

屋内的老式座钟嗒嗒的声音提醒他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他走到电话机旁。

3月30日清晨，饭田司令官格外高兴，56师团在昨天深夜由仰光赶到同古，比他规定的时间还提前了两个小时，这时已经布署在攻击出发地域。饭田指示早餐时给进攻部队每人发一听缴获英军的牛肉罐头，让士兵们饱吃一顿之后打好同古攻坚的最后一仗。——他要求务必于今天拿下同古，结束这场持续了十余天的战斗。

上午7时，在地面与空中一阵猛烈的轰炸之后，密密麻麻的日军从三面向同古围了过来，在每路攻击部队后面都有大批预备部队紧紧跟随。

防御阵地那边象每次刚刚发起攻击时一样静悄悄的，日军越走越近，对面仍没有开枪，日军胆战心惊，猫着腰慢慢向前逼近……

除了几声零星的爆炸，防御阵地仍没有动静。8时20分，正在疑惑不定的饭田接到56师团参谋长藤原武大佐的电话：同古城空无一人，守军在防线上设置了少量地雷，200师不知去向。

饭田呆若木鸡，久久没有放下电话听筒。

原来，在29日深夜，戴安澜接到杜聿明下达的撤出同古的命令。全师偃旗息鼓，渡过色当河，开往叶达西集结待命。

同古保卫战是中国远征军部队入缅之后第一次大的军事行动。200师官兵顽强坚守了12个昼夜，击毙击伤日军3000

余人，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为远征军后继部队的开进和布署赢得了时间。

战斗中，全师伤亡 2500 余人，受到很大损失。

在接到撤退命令之后，全师 7000 多名官兵，携带着几百台战车、火炮、汽车，百余吨作战物资，从 30 日零点到拂晓 4 点，全部安全、隐蔽地撤出战场，整个撤退行动在继 12 天防守之后，再次体现出这支部队铁的纪律和优良的素质。

饭田在同古消灭 200 师的计划落空之后大为恼怒。他下令 56 师团一部加强中路 55 师团，沿仰光至曼德勒铁路，东西两路沿泰缅边境和伊洛瓦底江，快速向北推进。

杜聿明命令廖耀湘新 22 师摆开兵力，节节阻挡日军前进，以争取时间，使远征军主力在平满纳一带集结，与日军展开会战。

4 月 5 日下午，一辆美式吉普车停在叶达西 200 师驻地。下车的三个人中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将军。几人来到师部，戴安澜经介绍得知这位外国人便是鼎鼎大名的联军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将军。史迪威紧握着戴安澜的手，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你辛苦了，你们打得很英勇。”

在史迪威的要求下，戴安澜集合部队由他讲话。对站在全师官后面前，以标准的美国军礼向这支部队致意。他说：“我代表蒋委员长来慰问你们，你们在同古的防守打得很好，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远征军和同古保卫战……”

4 月 6 日，戴安澜接到通知，蒋介石要在梅苗召见他。杜聿明与他同车前往。戴安澜想起刚出国时曾向蒋保证死守同古，现在同古丢了，他不知该怎样向蒋交待，心中忐忑不安。他将这事向杜聿明说出后，杜哈哈大笑说：“你不会说是杜军

长让你撤的吗？”戴安澜这才知道，撤出同古是蒋介石亲自下的命令。

到梅苗后，蒋介石立即接见了杜聿明和戴安澜。戴详细汇报了同古战斗和撤出的经过，讲了部队在战斗中士气旺盛，作战英勇的事迹，蒋介石听后非常满意。

杜聿明向蒋介石报告了他制定的平满纳会战计划。主要意图为：集中在缅英军和中国远征军主力，将日军吸引至平满纳地区加以消灭。蒋介石表示同意这个计划，并就作战问题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当晚，蒋介石与杜聿明、戴安澜共进晚餐，饭后留他们住下来。蒋特地将戴安澜安排在他隔壁的房间，几人国际国内地聊到深夜。

(四)

就在 200 师休整补充，准备向平满纳转移时，廖耀湘率新 22 师，与向北压来的日军 55 师团和 56 师团一部进行着一场智与勇的争斗。

廖耀湘毕业于黄埔军校，又曾赴法国留学军事指挥，学得一肚子奇谋诡计。此次他率领着 3 个步兵团，1 个炮兵营，一部战车和两支游击队，担任拖延敌人前进时间，诱敌进入平满纳会战区域的任务。

廖耀湘详细分析了任务、敌情和作战条件等诸种因素，决定采取“逐次抵抗”战术。即出没于深山密林之中，不固守阵地，而是牵着敌人的鼻子慢慢走，走到险要地势时就打个伏击，在运动中不断消耗敌人。

新22师在同古以北的公路上等了两天，与北进的日军接上了火，开始了这场特殊的战斗。

缅甸的山区丛林本来地形就复杂。日军时常不知不觉地就走进了新22师的伏击圈，常常是挨了一顿枪炮，受到很大伤亡，却又找不到对手。在日军眼中，茂密的原始森林变得越来越神秘而又恐怖，仿佛随时都会从一棵树后面伸出一支枪口。疲惫和恐惧使日军士气逐渐低落，55师团长竹内宽为此大伤脑筋。

廖耀湘率部牵着数倍于己的日军在深山密林中转了半个多月，他们时隐时现，打打藏藏，竟然取得了歼敌2000多人的重大战果。4月16日，新22师圆满完成任务，进入平满纳会战地域。

日军55师团受到新22师打击，损兵折将，竹内频频向饭田叫苦，饭田无奈，又将18师团的1个联队加强给中路。

在18师团这个联队调往中路这天，伪装成缅甸人，为敌55师团司令部挑水打杂的第5军侦察员马玉山，盗走标有18师团部队到达位置的军用地图，他星夜赶回军部，使我军及时掌握了敌人的动向。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战况不断通过新闻界传向国内外，中外许多家报刊发表文章，赞扬中国军队英勇抗日的精神，戴安澜、廖耀湘两位将军也成为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当远征军各部队陆续进入平满纳作战地区准备会战时，联军统帅部通报了一个意外情况：西线的英缅军第1师和装甲第7旅共7000多兵力，被日军一个1000多人的大队包围于仁安羌以北地区。

这7000多装备精良的英军面对数量仅为他们七分之一

的日军竟然束手无策，连连向驻缅英军总部告急。4月19日，驻缅英军总司令亚力山大在梅苗英军总部召开盟军师长以上高级军官会议，共同研究对策。

会上，有的英国军官提出让被围困的英军投降，自日军进入东亚沿海各小国，英军整师整旅投降的事情屡见不鲜，投降可以保命，这在英国看来已不算是丢脸的事了。

而中国军人却无法接受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场的远征军新编38师师长孙立人拍案而起，说：“不能投降，投降就是同盟国的耻辱！”

亚历山大看着这位年轻师长问：“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要去救！”孙立人说。

“救？谁去？”

“我去！”孙立人坚决地说。

坐在孙立人旁边的杜聿明在桌子下面扯了几下孙立人的衣角，提醒他说话要慎重。但孙立人决心已定，不理睬杜的暗示。

孙立人说：“我保证救出1师和7旅，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你下命令，让他们在48小时内不准投降；二是在2小时内给我准备80辆汽车。”

亚历山大总司令当即用无线电话与被围英军的1师师长通话，这两人用英语叽哩咕噜地说了半天，那个师长怀疑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担心搞得不好结果还不如投降。

孙立人曾在美国留学4年，精通英语，听出他们谈话内容，他接过话筒，用熟练的英语对英1师师长说：“中国军人说话算数，我仗义救你，如救不出你，就死在战斗中！”

孙立人敢立军令状！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当即散会。孙

立人亲率本师孙继光 113 团连夜乘车赶赴仁安羌。

到达英军被围的地域之后，孙立人率人迅速查明了日军的布署。原来日军也知道被他们包围的是在数量和装备上都优势于他们的英国部队，故而不敢轻易发动攻击，就这么相持着。日军只是不明白为什么英军在如此的优势之下不敢进行战斗。

113 团在孙立人师长指挥下，对日军这个大队展开攻势。战斗进行了四个小时，将这股日军击溃。解救出全部被围英军及裹挟在其中的英国传教士和新闻记者等 500 多人。

那些被困多日的英军官兵们此时才恢复了往日的神气和热情。对中国远征军官兵们又是欢呼，又是拥抱，一同被救出的新闻记者们立刻展开采访工作，详细记述了解围战斗过程，并对孙立人、孙继光等军官进行了专访。

通过新闻媒介，中国远征军解救被困英国部队的英勇行为很快便轰动了英伦三岛。英国国会致电中国政府，向远征军表示敬意。英皇乔治十六为新 38 师师长孙立人、113 团团长孙继光及几位参加战斗的营长颁发了被视为英国最高荣誉的 C·G·E 勋章。

(五)

远征军解救英军的行动受到广泛赞扬，尤其受到英国官方赞扬，但驻缅甸的英军部队却毫不以中国军人的英勇精神为榜样。他们不听盟军统帅部调遣，一味向印度方向撤退，致使日军长驱直入到我军西侧背，我军不得不调整兵力在侧后迎敌，拟议之中的平满纳会战由此流产。

由于在几次作战指挥中杜聿明与史迪威意见分歧，杜对史的错误判断和指挥不肯服从，史迪威几次写信、发电报，对蒋介石大发雷霆，并以减少援助相威胁。当初罗斯福要史迪威以“租借物资总监督”之职，就是授予他以物资为要挟的权力。为了缓和矛盾，蒋介石从国内派出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代替因故一直没有到任的卫立煌，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

罗卓英上任之后，不顾杜聿明的反对，屈从史迪威的意见，将远征军三个军的兵力配置在长达300公里的平（平满纳）曼（曼德勒）公路上，兵力高度分散使远征军处于既不能集中兵力对日军发动攻击，又因局部兵力不足不能进行有效防守的被动局面，为日后的失败种下祸根。

长时间的指挥系统混乱和美英将领对中国远征军不负责任的态度，终于酿成远征军的悲剧。

4月19日，史迪威、罗卓英根据英军提供的情报，调200师去乔克巴当，去消灭那里的“大批日军”，200师赶到之后才知道那里根本没有来过任何日军，只有向后撤退的英国军队。

戴安澜气愤地当即用电台向军长杜聿明做了汇报，杜聿明查明这是英军为了欺骗200师去乔克巴当掩护他们撤退而故意制造的假情报。他怒不可遏，四处上告，要求惩办这种犯罪行为的制造者，但史迪威和罗卓英根本不予理睬。蒋介石在国内也鞭长莫及，结果此事不了了之。杜聿明预感到，如这种混乱再继续下去，必将使战局失控，一发而不可收拾。而承受失败与损失的，只能是中国远征军部队。

在这个时期的缅甸战场，经常发生一种奇怪的现象，盟

军统帅部调不动英国军队，一有战斗就派中国军队去打。常常是我军往前线赶时，正遇英军往下撤退。中国士兵们气愤地说：“我们的命怎么就这么不值钱？！”

英军迅速后撤和远征军兵力分散，使日军终于找到了可乘之机。15军司令官饭田决定以三路日军与当面的中国军队纠缠，令做为预备队的56师团直插盟军的缅甸战场的后方咽喉，腊戍、棠吉一带。

4月21日，刚刚赶到乔克巴当的200师接到命令，火速转向棠吉阻截日军。戴安澜得知日军已到棠吉，大为震惊，率全师在刚刚空跑250多公里之后又急行军朝着又是250多公里的棠吉猛赶。

23日午后，200师骑兵团在距棠吉15公里处与日军遭遇。部队不顾疲劳，立即展开战斗队形，一阵猛打猛冲，将敌人打退。向前走至距棠吉9公里处，发现敌人的前进阵地，骑兵团连续作战，又在天黑后攻占了敌前进阵地。

23日深夜，200师部队集中于棠吉市东部和南部，作好了进攻准备。24日拂晓，戴安澜指挥部队猛攻棠吉城防。这时的200师已是近10天没有吃一顿好饭，睡一次好觉了，但官兵们仍十分英勇，战至中午时，已有两个团攻破日军城防阵地，进入市区。整整一个下午中，我军与日军在城区内展开激烈巷战，日军调来的飞机因两军混战在一起而无法投弹与射击。天黑时，我军控制市区大部地域，将日军压在城西。又经过数小时激战，日军无力再战，撤出西门。我军于晚11时全部占领了棠吉。

由于棠吉这个小城对我军在缅甸的地位至关重要，所以战斗结束了后，戴安澜立即组织部队连夜沿城四周加固工事，

整修阵地，准备坚守。但就在这时，戴安澜收到蜀卓英每隔 10 分钟发来一次，一共发来 4 次的急电，电报内容是完全一样的：火速向曼德勒集结，实施“曼德勒会战”计划。

曼德勒是缅甸最大的城市，过去曾是缅甸首都，位于缅甸中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不论是夺取还是防守缅甸，这个大城市都是必争之地。罗卓英来缅甸之后，与史迪威一起制定了一个“曼德勒会战”计划，利用日军必攻曼德勒，集中远征军主力和驻缅英军，与日军大战一场。

这个作战计划本来就是建立在罗卓英、史迪威合理想象和一厢情愿的基础上，从根子上就缺乏根据，当饭田司令官令第 56 师团迂回我军后方之后，这个计划便更加失去了任何意义，这一点做为懂得军事的史迪威和罗卓英，完全是应该知道的，但这两人仍荒唐地坚持原定的“曼德勒会战”计划，强令远征军各部向曼德勒集结。

杜聿明再三向罗卓英讲述 200 师不应放弃棠吉，去搞什么“会战”，一旦棠吉失守，后果将难以想象。罗卓英固执坚持原定计划，并以军法强迫杜聿明执行命令。杜聿明仰天长叹，无法再说。200 师只好放弃棠吉，赶往曼德勒。

被 200 师赶出棠吉的日军一个旅团没有走远，见 200 师撤走，便乘虚重占棠吉，第 2 天又占领了腊戎，缅甸战局就此急转直下。

4 月 29 日，日军 56 师团在占领腊戎、棠吉，切断了远征军的退路之后，掉头向南包抄过来，与北进的三路日军一起，在曼德勒地区对远征军做战役包围。远征军腹背受敌，进退无路，陷于险境。

史迪威、罗卓英这时才如梦初醒，惊慌失措。更加错误

的是，他们不去组织远征军进行有计划，有配合掩护的撤退行动，而是在4月30日令各部队自行撤退。

5月1日，日军第15军司令官饭田憲二郎命令日军各师团分头抑占缅中边境各要地，堵截远征军回撤道路，然后实施各个击破，全歼中国远征军部队。

5月1日至5日，日军占领新维、贵街、畹町、惠通桥等中缅边境路口，并越过边境占领了我国云南省怒江以南部份地区，远征军各部被迫向西与北两个方向的密支那、片马撤退。

5月5日，是一个被中国远征军官兵永远钉在耻辱柱子的日子，联军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丢下十余万远征军部队，只身逃往印度。

这时远征军的军一级指挥部仍掌握本部的大部分部队，但由于失去总部指挥，敌情不明，目的地不清，无法互相协同配合，因而在撤退途中被日军一路拦截追杀，伤亡惨重。

(六)

为了避开日军的追杀，杜聿明决定，率200师和新22师，沿着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小路，走到即科，穿过细摩公路，翻越野人山，向祖国转进。

这是一条布满了死亡陷阱的道路，所谓死亡陷阱，是比日军追杀还要艰难残酷的原始森林，很少有人能够活着走出野人山这座充满了恐怖传说的神密而狰狞的百里大山。为了回到祖国，远征军不得不踏上了这条充满了艰险的行程。

5月18日，200师到达即科地区。部队疲劳至极，正要

埋锅烧饭，忽听枪声大作，原来日军 56 师团已有两个摩托化大队沿细摩公路赶了过来。

戴安澜立即指挥 600 团据守正面，他亲率 599 团从侧翼包抄敌人。双方在密林中混战 4 个小时。战斗中，599 团团长柳树人和 600 团副团长刘杰阵亡，戴安澜胸部和腹部各中一弹。

将敌人打退之后，200 师立即越过摩细公路，钻入原始森林。戴安澜知道自己伤势严重，部队几经大战，早已没有了药品，很难坚持走到目的地，便召开营长以上军官会议。

会上，戴安澜宣布，如果他牺牲了，由副师长高吉人代理师长。他握着高吉人的手说：“困难再大，也一定要把队伍带回祖国去！”

参加会议的军官们看到师长伤得这么重，心情都很沉重，他们表示一定带好部队，翻过野人山，说什么也要回到祖国去。

在潮湿闷热的密林中又走了两天，来到一座树林非常茂密的巨大的山前。缅甸向导指着大山说：这就是野人山。

乘人们在惊叹这座大山的时候，那个向导偷了一袋干粮，离开队伍溜走了。

队伍寻着一条依稀可辨的小路缓慢地向前移动着。5 月中旬，当地进入了雨季，整日淅淅沥沥地下着雨，脚下处处泥泞，参天大树和奇形怪状的古藤遮天蔽日，空气又闷又热，充满着腐烂的气味。

野人山中的蚊子大得出奇，向导曾说这样的蚊子可以把健壮的牛或马咬死吸干。成团的蚊子围着这支本已伤痕累累的队伍追逐叮咬，使人片刻都无法安宁。

只要一靠在树上或躺在地上，数不清的蚂蝗便紧紧盯在人身上、腿上吸血，揪断了它的身子，头还扎在肉里，被蚂蝗叮过的地方不久便开始感染、化脓。远征军的队伍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行走着。从地图上看，离国境线只有一百多公里，可是脚下的道路却越走越艰难。伤员无药可医，伤口发出腐臭，没有受伤的士兵中病号也迅速增加着。

5月26日，是戴安澜负伤的第8天。一路上没有药品和食物，他身上的伤口早已溃烂。凭着原本很强健的体魄支撑到现在，他感到再也支撑不住了。他示意抬担架的士兵将担架放下来。

士兵们见师长已是奄奄一息，急忙找来副师长高吉人和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几位多年来出生入死的战友此时相对无言，只有眼泪流淌。

戴安澜艰难地动着嘴唇，好象有话要说出来，郑庭笈把头凑上去，听到戴安澜用很微弱的声音说：

“让我……看看……祖国……。”

郑庭笈将戴安澜抱着坐起来，掏出指北针对了一下位置，让戴安澜面朝北方，朝着他甘心情愿为之流血牺牲的祖国和家乡的方向。

戴安澜使劲睁大浮肿的眼睛，嘴里喃喃地说：

“反攻……反攻……祖国万岁……”

戴安澜的眼睛久久没有闭上，但郑庭笈已经感觉到他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年仅38岁的少将师长戴安澜壮烈殉国，200师及所有第5军官兵沉浸在悲痛之中。杜聿明在途中染上回归热，终日高烧不退，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这位身经百战、坚毅无比的老

军人不禁失声痛哭。

离野人山的边缘越来越近，但全军早已断粮断药。霍乱、痢疾、回归热等瘟疫大肆流行，大批官兵倒在路边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死亡的阴影笼罩着这支队伍，先是伤员一批批死去，后来身体素质较弱的官兵也染病死去，这些人中有一大批曾在国内抗日战场浴血杀敌，负过伤，立过功的老兵。

一天，郑庭笈去 598 团的队伍看望一位垂危的老兵，他曾在昆仑关战斗中第一个冲上日军阵地，带伤歼敌 20 多名，荣立大功，而此刻他已经危在旦夕了。

郑庭笈曾在 598 团任过团长，此时老兵仍以“团长”相称，他紧抓着郑庭笈的手，哭着说：“不如死在昆仑关上倒也痛快，就这么拖死在野人山上，窝囊呵！死不瞑目呵！”

在走出野人山的最后几天中，官兵们吃野芋头、野芭蕉根，甚至吃毒蛇和老鼠维持生命，一步一步往前挪动，一路上尸体累累，无法掩埋，惨不忍睹。幸存者们死死咬定一个信念：“回祖国去！回家去！”

这条艰苦卓绝的行程夺去远征军大批官兵的生命，仅第 5 军，牺牲在撤退路上的官兵比阵亡的多出一倍。茫茫缅甸热带丛林中，至今流传着中国军人悲壮的故事。

二十万中华儿女，一颗颗报国之心，盟军将领各谋私利致失败，中国军人宝贵生命遭轻抛。十万军魂长眠异土归不得，丧师辱国滔天大罪谁承担？！

历尽磨难，中国远征军各部队于 1942 年 5 月至 7 月陆续到达云南和印度。先期到达云南的部队受到当地民众和国内部队的隆重欢迎。远征军官兵见到祖国亲人，无不失声痛哭。

先期到达云南保山的孙立人 36 师部队返回野人山边缘的缅中边境接应 200 师部队，可怜这支齐装满员、装备精良万余人的精锐之师，至走出野人山时，连伤带病不足 3000。

国内军民沉痛悼念血洒异国的远征军官兵。200 师师长戴安澜的遗骨被运回他的故乡广西全州。沿途群众举行各种仪式，哀悼这位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献身的军人。

1943 年清明，国民政府在全州举行了全国性的追悼戴安澜将军大会。全国各地各界代表上万人前往祭奠。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写了挽联、挽诗。毛泽东题的挽诗是：

“海鸥将军千古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
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
浴血夺同古，驱倭棠吉归。
沙场竟殒命，壮志也不违。”

参加全州追悼大会的人中，有一位军官心情格外沉重，他是戴在黄埔军校时的同期同学、曾与戴安澜在台儿庄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大战中并肩作战，现任第 8 军军长的郑洞国将军。

郑洞国想起昆仑关战斗中，他与戴安澜同任第 5 军的师长，两师密切配合，攻克日军据守的昆仑关天险。日军旅团长中村正雄就是被郑洞国荣誉第 1 师郑庭笈第 2 团击毙的。战后戴找到郑，说什么也要将郑庭笈调整到 200 师……郑洞国欲哭无泪，思绪万千。

昔日手足情似海，如今生死两茫茫。安澜兄杀身成仁，流芳千古，我们这些活着的军人还要把仗打下去，完成烈士们

的未竟之志，把日寇赶出中国……

日军占领缅甸之后，唯一的国际通道缅甸路被切断。盟国给予我国的军事援助只能靠空中运输，而且还要绕开缅甸，飞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所运物资少得可怜，而且由于这条航线气候恶劣，使许多运输机迷失航向，葬身冰谷。

(七)

历史在艰难的步履中走到了1943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出现了重大转机。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聚歼德军30万，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成功，打垮了号称“沙漠之狐”的德军元帅隆美尔。德国的失利使美国和英国有精力转而在亚洲大陆对付日本。

为了重新打通交通线，增强中国的抗日实力，使整个反法西斯阵线各战场更好地配合作战，在中国军队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不久，中、美、英三国首脑再次会商，研究反攻缅甸的问题。

1942年7月18日，史迪威代表美国政府向蒋介石提交了关于反攻缅甸、打通中印陆上交通线的备忘录，表明了支援中国的立场，并对具体的军事作战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做为反攻缅甸的准备工作之一，蒋介石接受了美国的建议，让撤到印度的远征军队暂不回国，由美军派教官在云南和印度两地训练中国军队。

训练工作由史迪威总负责。他在开训第一天对官兵训话时说：“不要怕日本的飞机大炮，美国有更多的飞机大炮给你们，盟国一定能战胜日本。”

从1942年秋季到1943年冬季，共有一万多名军官和三万多名士兵接受美军教官进行的正规训练。在这段时间内，驻印度的我第5、第6两个军按美国陆军的编制和装备进行了整编。

1943年1月，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讨论反攻缅甸问题，决定于43年冬季，由驻在印度和云南的中国远征军为主的盟国军队在缅北发动攻势。

1943年2月的一天，正在故乡湖南石门探亲的第8军军长郑洞国接到急电，命他即刻去重庆接受蒋介石召见。郑洞国乘竹筏、倒客轮昼夜兼程，一路上猜测委员长此时紧急召见他会有什么新使命将临。

到重庆见到蒋介石时正是傍晚，蒋请郑一起吃晚饭，边吃边谈。席间，蒋介石见郑洞国有些拘紧，便亲自为他夹菜，说：“赵国大将廉颇一餐可食一斗酒、十斤肉，郑军长惯于征战，也该能吃饭哟。”用餐的只有蒋郑二人和两名侍从，蒋介石的热情反而使郑洞国更加不好意思。

饭后，两人来到小客厅里，蒋介石神情严肃地对郑洞国说：

“想让你担负一项重要任务，去印度，任驻印新编第1军军长。”

郑洞国没有马上回答。他心中迅速翻腾着他所知道的关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一切，想起了与他情同手足、多次交肩抗日的同学戴安澜。

郑洞国极其郑重地点了点头。

第一次入缅作战失败之后，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加深，史

将作战指挥方面的责任推给中国将领。他为远征军司令罗卓英列了“十大罪状。”因怕影响美国援华，蒋介石忍气吞声，将罗卓英调回国内了事。

郑洞国走马上任，担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总指挥由史迪威兼任），兼新1军军长。驻印军由新1军和新5军组成，是经过整训并全部换为美式装备的部队。

在盟军统帅部制定了驻印军反攻缅甸的路线之后，由中国军队两个工兵团和美军一个工兵团联合修筑由印度多雷进入缅甸的公路。这条公路穿越重山峻岭，翻过野人山区，两国士兵既要紧张施工，又要躲避日军视线，还要忍受恶劣的自然条件，工作极为艰苦。

1943年9月，公路修到缅甸境内的南洋河附近。10月，雨季结束，以中国驻印军为主，配合美、英军各一部的盟军部队正式开始了对缅甸的反攻作战。

(八)

反攻作战于10月20日打响。新1军主力，孙立人新38师和廖耀湘新22师越过印缅边境，兵分两路，向胡康河谷开进，去包抄驻扎在孟缓的日军第18师团。

第18师团是由日军最精锐的皇家近卫师团改名出征的，装备好，战斗力强。师团长田中新一接到中国远征军进攻的情报后，立即命令部队组织防守。

新38师以112团2营为前卫，向日军第18师团左翼新平洋侦察前进。担任尖兵的5连进入一片林间空地时突然受到日军伏击，双方展开激战。后续部队听到枪声火速赶来时，

见战斗已经结束。这个连除几名重伤员外，连长江晓垣以下全部牺牲。112团团长陈鸣人命令部队抓紧构筑工事，与日军对峙。

第二天白天，双方互相进行炮击和袭扰。当晚，日军500余人潜过我军阵地，偷袭了团指挥所，陈鸣人率手枪排奋力突出日军包围。脱险后得知，团部中的美军中校联络官因躲在树洞中没有参加突围而被日军俘虏。

出师不利，孙立人十分气愤。10月24日，他分兵三种对日军发起攻击，自己亲赴担任正面攻击的114团督战。

日军利用大树、山洞等复杂地物筑起了许多坚固工事，我军新装备的大威力火器发挥了优势。我军采取炸、烧等办法，将敌人阵地一层层剥开，逐步向前推进。

经一周苦战，新38师攻克拉加苏高地，肃清了日军右翼，两天后又攻克新平洋，扫平了其右翼。11月3日，史迪威亲赴前线，指挥新22师从正面，新38师从两翼，向孟缓敌18师团主力发起猛攻。

日军据守孟缓拼命顽抗，我军连续攻击6天不克，史迪威将胡素然30师和美式重炮团调上来参战。当大口径火炮将日军的工事连同几人合抱的大树夷为平地时，战场形势立即改观，远征军3个主力师如虎添翼，锐不可当。

史迪威的最大兴趣是手持望远镜直接观看战斗进程。在进攻孟缓战斗打得最激烈时，他在前沿发出感慨：

“战争，就是钢铁与精神的消耗。美国的先进武器，加上中国士兵的勇敢，世界上还有什么军队比这更加强大呢？”

中日这两支都自认为是精锐的部队互不相让，斗智斗勇，难见分晓。直打到12月底，我军收复孟缓以北的大龙河西岸

地区，与日军孟缓阵地隔河相对。元旦刚过，新22、新38两师再次结孟缓之敌发起进攻。

孙立人师长蓄着胡须在第一线部队督战，一次史迪威在师里视察时称赞孙蓄须时很有男性魅力，孙立人说：“中国军人不留胡须，我是留须励志，不打下孟缓不剃胡须！”

1月17日，我军在正面和侧翼猛攻孟缓的同时，孙立人果断指挥113团出敌不意，穿插孟缓以南，将敌退路切断，形成合围之势。

这时史迪威也灵感突发，组织强大火力对敌人阵地实施逐一摧毁，步步占领的战术，使我军迅速逼近了敌人的核心阵地。

此时在核心阵地指挥防御的日军第18师团长田中新一连连接到外围阵地被攻克的报告，炮弹落点越来越近，部队伤亡不断增大，他知道大势已去。他向参谋长河口大佐下达了一道命令，重伤员全部自杀，其他人由河口率领，向孟缓以南的原始森林突围。

不一会，周围几个工事中传来一片哭喊和枪声，田中知道这是河口派人“帮助”重伤员们“为天皇尽忠”了。河口来报告说，重伤员全部自杀，700余人的突围队伍已组织完毕，请师团长夹在其中冲出去。田中挥挥手说：“不必了，你们去吧。”河口以为师团长要自杀，也就没再管他。

在河口参谋长率部突围遭到远征军部队的截杀时，田中新一少将穿上一件从死人身上剥下的缅甸人服装，包上头布，爬到外围阵地的一个工事中，装成死人躲过打扫战场的中国士兵的眼睛，在深夜混出了孟缓，在原始森林中走了三天三

夜，死里逃生回到第 33 军指挥部。

我新 1 军攻克孟缓，取得全歼敌第 18 师团的重大战果。驻缅日军得知赫赫有名的皇家近卫师团被全歼，士气受到很大打击。

(九)

1944 年 5 月，卫立煌将军再次出任驻云南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他率领第 20 集团军、第 11 集团军共 10 万兵马，利用日军重兵在印度英帕尔进攻受挫的时机，向占领云南怒江以南的日军第 56 师团发动攻势。

卫立煌曾在对日作战中战功卓著，是著名的“五虎将”之一。忻口大战后，连日军华北方面军最高司令香月清司也赞叹他是“支那猛虎”。卫立煌上任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远征军司令部由昆明附近的楚雄搬到离怒江前线仅 70 公里的保山县马玉堂。在制定了周密的反攻计划并呈报蒋介石批准后，他下令第 20 集团军于 5 月 11 日拂晓强渡怒江。

渡江部队与日军展开激战。12 日，我军以不可阻挡之势，从惠通桥、三江口、攀枝花等地渡过怒江。13 日攻占平戛，14 日收复大塘子。因为是在我国国土作战，官兵倍加英勇，民众大力相助，所到之处，日军无不惨败而逃。

就在卫立煌立马横刀的大幅照片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中外震惊远征军批攻战绩时，一个更为大胆的进攻计划在卫立煌心中酝酿成熟。

卫立煌通观缅甸战局，提出变更布署，出敌不意，迅速攻占腾冲、龙陵，与我驻印军会师缅北，一举打通中印公路。

他将这个作战方案呈报蒋介石，蒋说：“敌前变更部署，关系重大，谁能负责？”卫立煌坚定地回答：“我愿负责”。蒋介石当即拍板同意。

此时，在缅北战场，郑洞国指挥新1军、新5军，在美国空军协同下，攻向缅北日军腹地密支那。

美国人的想象力总是十分丰富。美军准将梅里尔指挥由远征军两个团和美军一个营组成的突击队，在没有道路的原始森林中，用砍刀劈开古藤荒草向前行进。秘密行军二十多天，于5月15日到达密支那机场。

突击队以突然，猛烈的攻击直扑机场守敌。日军以为神兵天降，猝不及防，被中美突击队员消灭大半，其余的逃进密支那城内。我军占领机场后，立即用无线电台与后方机场联络。

1小时后，一个40多架飞机组成的美军运输机群载着大批部队和作战物资在密支那机场降落。这次成功的突袭如在敌人心脏砸进一颗钉子，使我军的缅北战场大大跃进了一步。

6月4日，卫立煌率部力克腊孟，向腾冲、松山、龙陵之敌持续进攻。我军歼灭腾冲守敌148联队，该联队长藏重康美大佐被我远征军霍揆章第20集团军部队击毙。

1944年8月初，缅甸战场形势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郑洞国指挥部队包围攻打缅北重镇密支那。这时雨季未过，大雨滂沱，山洪泛滥。士兵们终日浑身透湿，有时站在泥水齐腰的战壕里打仗，条件十分艰苦。郑洞国坚持在一线督战，大大鼓舞了官兵的士气。苦战20多天，终于收复了密支那这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城镇。我军歼敌2000余人，敌56步兵团长水上源藏自杀，残敌200余人逃往莫八。

我军冲入密支那城内时，到处可见日军尸体。在清理战场时，从一个山洞里搜出几名重伤员和二十多名朝鲜籍日军“慰安妇”。

攻克密支那后，中印间的空中运输线可以直线飞行，而不必再绕飞充满危险的喜马拉雅山驼峰航线，这是远征军对中国后期抗战的一个特殊贡献。

1944年下半年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势头已成为强弩之末，国内政治、经济危机不断加剧，前线官兵、物资供应不足，日军士气低落，在缅甸战场也随之连吃败仗。

在我军于9月7日同时攻克松山和腾冲之后，日军退守龙陵。10月29日，我200师、87师、88师和36师从四面完成对龙陵之敌的包围。经两日激战，日军在城内焚烧枪支弹药和作战物资，准备突围。

11月2日，日军113联队长松井秀活大佐率残部400余人向芒市突围，在我军一路截杀下，只有80多人突了出去，龙陵遂被我军攻克。5日我军追至芒市，激战3昼夜，突破城西防线，敌人弃城逃往遮放。

远征军郑洞国与卫立煌两支部队一路斩关夺隘，节节胜利，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日军将缅北兵力收缩在莫八、腊戌等几个要地，据险死守，等待大本营的指示。

(十)

远在重庆黄山官邸别墅的蒋介石每天通过电报了解缅甸战况，电报中有各指挥部发来的每日战报，也有将领们直接发给他反映战场情况的密报。蒋介石已是多次听到将领们对

史迪威的不满，说他固执己见，时常拿远征军部队去死打硬拼，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

蒋与史的矛盾由来已久，除了个人性格间的差异，其中还有由于两国不同利益而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冲突。蒋介石的怒火在暗中不断升温，终于在 11 月的一天，他以“不善于盟军合作”为由，状告美国总统罗斯福，坚持要求撤换史迪威。

蒋介石对史迪威一惯忍气吞声，此时他选准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反击日军节节胜利，正准备以中国为基地进攻日本本土的关键时刻，为不与蒋介石闹翻，影响了美国进攻日本本土，罗斯福只好将史迪威调回国内。

12 月 7 日清晨，史迪威怀着满腹委屈和遗憾，在重庆机场登上去美国的飞机，离开了征年近 3 年，即将看到胜利的缅甸战场。

蒋介石、宋美龄及几位军政要员去机场送行。局外人难以知道，在蒋与史礼节性的告别中，隐藏着的更深的含义。

12 月 15 日，郑洞国率部在激战一个月后攻克莫八，致使滇西日军腹背受敌。

1945 年 1 月 15 日，孙立人率部攻克南坎，将日军压致中缅边境的最后一个据点——芒友。

1 月 22 日，孙立人在芒友城下联络上自云南杀来的远征军卫立煌部的周福成 53 军，两部相约克城会师。

1 月 23 日，两支远征军部队满怀会师的激动心情待命出击。当约定的上午 7 时 40 分到达，新 1 军军长孙立人和 53 军军长周福成同时下达攻击命令，只听得漫山遍野杀声震天。

经过激烈拼杀，位于中缅边境缅甸一侧的小镇芒友于 1

月 27 日被我军攻克。日军被歼 2600 余人，仅有 100 多人趁夜弃枪渡水逃脱。至此，我国云南境内的日军被全部肃清，中印公路胜利打通。

两军胜利会师，互相都如见了久别的亲人，尤其是驻印军官兵，自 1942 年出国之后一直没有回国，此时已到了家门口，见到祖国亲人，心情格外激动。

1945 年 1 月 28 日，这是每一名中国远征军官兵至死都不会忘记的日子。这一天，在中缅边境城市畹町举行了盛大会师典礼和通车典礼。

反攻缅甸作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取重大胜利的军事行动之一。自 1943 年 10 月至 1945 年 1 月，中国远征军历经大小战斗上千次，取得歼敌 48500 人的重大战果。

在 15 个月的作战中，远征军战胜了凶残疯狂的敌人和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在战斗中，驻印和驻滇两支部队共有 60000 多名官兵伤亡，中国军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付出巨大的牺牲。

中国远征军走过了由失败到胜利的路程。中国和日本两大民族间这场长达八年的战争，终于以反抗侵略和压迫的中国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了。所有战死在这场战争中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们，可以瞑目了。为了祖国而远征异域，浴血沙场，葬身他乡的军人们，可以瞑目了。不论战争过去多少年，故乡、祖国和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记住他们的名字。中国远征军，这不仅仅是一支部队的名称，它永远象征着为了民族的利益而浴血拼搏的中国军人那九死不泯的壮丽军魂。

后记

战争是无法再现的。尽管我们在近四年时间中尽其所能搜寻资料,访问亲历者及请教专家,但随着工作进程,我们越来越感到,要完整地反映这场战争,尤其是反映凸现在这场大灾难中中华民族的精神蕴涵是极困难的。对由于我们的功力和客观上的原因而没能表现出的事件、人物和事迹,我们常怀着深深的歉疚。

在诸多遗憾中,我们仍将这个数年努力的小小结果奉献给读者,如果它能够引起一些对于那场战争和我们民族命运的思索,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满足了。

作者